毛泽东选集

第七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毛 泽 东 选 集

第 七 卷

一九七六年 · 北京

毛泽东

出版说明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根据中共中央出版毛选和毛泽东全集的决定〔1〕，编辑部编辑了这部《毛泽东选集》第七卷〔文化大革命时期〕。

过去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第五卷和第六卷，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著作。第七卷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所起草、批阅的文件与批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新时期中，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贯原则，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艰辛的探索之路上，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带领着中国走向独立自主，让中国人民真正地翻身做了主人，并带领中国人民积极地进行社会主义探索，为之后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但是，人无完人，社会主义探索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个时期，在林彪等人的煽动下，年近古稀的毛泽东也曾做出例如“中国要继续革命下去”的错误决策。准许了进行无产阶级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尽管主席的本意、发起的目的是好的。但是，在工作进行当中，林彪、王洪文、张春桥、康达等人，做出种种不正当措施，其意在扰乱国内秩序，以达到自己篡权的卑劣目的，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但也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毛泽东选集》第七卷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重要著作。收入选集的是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著作，有一部分发表在中央出版的文件上，有一部分没有正式发表过，包括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文件、手稿和讲话的正式记录，讲话记录在编辑时作了必要的技术性的整理，但著作均未作较大的改动。

编者卷首语

(第六、七卷)

毛泽东选集是一套选编中共缔造人之一、中共重要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始人之一、中央第一届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手迹、批示的文件汇编。

毛泽东选集自解放前开始出版，现已出版五卷，包含了 1950 年之前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

毛泽东逝世后，中共中央曾计划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之后的著作，但由于“两个凡是”错误理论的推翻和紧接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胜利。毛泽东的这些文件并未公开出版。

一位网名“静火”的国际友人对毛泽东思想颇感兴趣，遂搜寻来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著作并整理成原稿。根据他的观点加以注释。编者就是在此基础上对原稿进行了润色，排版后编纂成了毛泽东选集第 6、7 卷。

本书注释中原有许多错误思想和理论，均是署名“静火”的国际友人所写。编者已最大限度地加以改正。但对于原来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注释中的引文并未作较大的改动。

本书所选著作是在探索时期（如大跃进、文革）所作，故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注释的引文中有一部分错误的思想，现加以说明。望读者不要接受、传播这些思想，而仅仅作为研究使用。

在成书前，编者已认真审阅文稿，但由于水平有限，加以时间仓促，书中错误和疏忽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给予纠正。

编者 ： LFX

2018 年 7 月 10 日 于 中国

卷首文——文化大革命

（引自 360 百科）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又称“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文化浩劫”或“文化灭绝”，是指 1966 年 5 月 16 日至 1976 年 10 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被广泛认为是自 1949 年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

目录	1 基本简介	4 发展过程	7 相关人物	
	2 社会背景	5 文革后期	8 历史评价	
	3 文革爆发	6 文革影响	9 文艺作品	

基本简介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又称“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文化浩劫”或“文化灭绝”）。指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在

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

这场重大政治运动被广泛认为是自 1949 年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据此毛泽东提出的所谓“四个存在”理论——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革自 1966 年 5 月 16 日以后开始，结束于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和怀仁堂事变四人帮被捕后。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活动性质均在由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于 1981 年 6 月 27 日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正式否定决议认为毛泽东应负上主要责任。该决议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社会背景

大跃进

1952 年斯大林发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从理论上全面阐述和规划了计划经济模式。

1953 年 4 月 1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指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了。 这个五年计划的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即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

为了完成这种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斯大林同志关于工业化的理论学习苏联建设的宝贵经验。 ”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规定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的一年半时间内都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

1954 年 5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学习苏联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指出：“为编制和实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应当学习苏联编制各个五年计划的经验特别是学习苏联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 1955 年 7 月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盘采用了斯大林主义的方式、措施和理论框架。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引起了国际共运严重的思想混乱。毛泽东提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

1957 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很尖锐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

10 月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开展反右运动。12 月 7 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宣布仿照苏联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

1958 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

1958 年 6 月 19 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提出两年把粮食亩产提高到 1000 斤到 1500 斤。同日毛泽东对薄一波说：干脆今年钢产量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要求 1958 年钢产量在 1957 年 535 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6 月 21 日毛泽东批发了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报告》。《报告》认为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 3000 万吨 1962 年将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

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

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会后为了追求钢的产量比 1957 年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全国几千万人一齐上阵土法洋法同时上马掀起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

从 8 月到 10 月全国 74 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 26000 多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958 年 11 月 30 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 30 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毛泽东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1960 年 3 月 6 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稿。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对城市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二是城市人民公社的性质；三是对不愿参加公社的人不要动员要继续等待；四是关于组织城市人民公社的活动不要宣传。3 月 8 日毛泽东在刘少奇指示稿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批示希望“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1960 年 3 月 9 日中共中央批示城市人民公社化。

大跃进口号提出后农业产量也要翻一番。但大跃进最后却是彻底的失败，工业陷入瘫痪。除了钢铁之外其他工业产量都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全国各地虚报产量

（浮夸风盛行）而且炼出的多半是废铁令刚有起色的经济陷入混乱。九千万农民被召入炼钢厂导致农业发展滞后加上各地争相虚报粮食产量导致农民的口粮都被作为增产上缴最终导致全国大饥荒。1959 年 11 月中共中央指出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主要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不客气的赫鲁晓夫

1960 年 6 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讲了一大堆十分难听的话说搞你们大跃进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你们那么爱斯大林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赫鲁晓夫批评毛泽东不懂现代战争，动辄就算中国有多少人有多少民兵，丝毫不了解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那些人不过是一堆肉。他还指责毛泽东总是宣扬不怕战争，说什么死个几亿人还有几亿人照样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被认为是疯子”。赫鲁晓夫威胁说：“如果你们紧紧踩着我们的脚跟，我们也将采取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如果你们认为我们脱离了马列主义那就各走各的路吧。”

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政府通过其驻华使馆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苏联专家和顾问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将被召回去他们的祖国。”此后随着苏联撤回援华专家、撕毁援建合同中苏两党走向了公开的大论战。1963 年 9 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指出：“苏共第二十

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以及《关于斯大林问题》“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引用斯大林文集的教条指责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所谓“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49 年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废除了中华民国的公民课和军事训练根据老解放区农民教育的经验仿造苏联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制度设置了政治理论课和时事政治课改班导师制为苏联的班主任制（Классныйруководитель）建立了班主任、辅导员和共青团的政治思想工作制度教导处设主任 1 名。从接收旧学校之日起上级党委和政府就十分重视给学校派遣和发展中共党员以逐步确立党对学校的领导。这正规化、制度化的政治思想教育在中小学生中进行阶级仇恨、政治斗争、敌我界限、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为中小学生和教师参与文革埋下了伏笔。

1934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制度暂行条例》中规定：“每班设主任教员一人一班学生在四十名以上者得增设助教员一人”。班主任制正式确立于 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发《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中学暂行规程（草

案）》规定：“小学各班采取教师责任制各设班主任一人”；“中学采取校长责任制”、中学每班设班主任一人由校长就各班教员中选聘在教导主任(政教主任)领导下开展工作。

1952 年在“三反”运动中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在高等学校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初步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加强了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培养在学校中“建立有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在各高等学校内部则形成了党委领导、宣传部、系总支、团委、工会、学生会以及政治辅导员、班主任的思想政治工作管理系统负责全面管理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辅导员、班主任工作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线按照党委的部署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961 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指示：“政治辅导员或班主任从专职的党政干部、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其他青年教师中挑选有一定政治工作经验的人担任。” 1966 年 3 月 21 日人民日报发表《突出政治做好班主任的工作》指出：“班主任的工作是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去教育新一代的工作。好的班主任能起革命带路人的作用同时也是带动其他教师实现革命化的骨干力量。”“要做一个好的班主任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既能教书又能教人既能言教又能身教自己革命化并且引导学生走革命化的道路。”

1960年2月5日全国学联委员会向全国学生第十七届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我们同学应当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重大的政治任务下决心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掀起一个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1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青年学生的光荣任务》指出：“我国青年学生的光荣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积极响应毛主席“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努力培养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作一个共产主义的好学生。”“每个青年学生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1964年中宣部、教育部颁布《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指出：“政治理论课必须从思想上和理论上积极参加这一场阶级斗争……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最根本的任务把毛主席著作作为最基本的教材。”强调“教师队伍必须革命化”“各地党委宣传部和高等学校、中等学校的党组织加强对政治理论课的领导”。1964年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出通知：采用《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作为高中政治课代用教材。共青团批示必须把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团的全部工作中的第一位。1960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各民主党派、工商界、知识界中间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

中共1962年召开的夏季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宣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并立即被第十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所接受发起了针对农村干部

和党组织的整风运动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 年底到 1965 年 1 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林彪开始了一场把人民解放军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运动。总政治部在 1964 年 5 月出版了第一版《毛主席语录》。林彪宣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天才地、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人民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66 年 5 月 7 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在指示中还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此后班主任制度被取消采取排、连、营的建制实行军事化组建民兵营。1967 年 10 月 25 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1967 年 10 月 26 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全国广大革命师生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立即复课闹革命》宣扬：

一定更加刻苦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狠狠地斗私批修集中力量搞好本学校的斗批改彻底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学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全国各地许多大中小学的红卫兵小将、革命教师和革命干部在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的时候认为复课闹革命和搞好学校的斗批改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每个革命师生都必须以“斗私批修”为纲狠斗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以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责任感彻底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学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四清运动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1959 年 4 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1959 年 7 月 2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庐山召开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对彭德怀等人的决议。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 1958 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

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彭德怀

7 月 14 日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给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 月 23 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经权衡党内具有压倒性趋势的肯定彭德怀的意见认为信件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8 月 2 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明确宣布现在已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问题。从次日开始各组分别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和周小舟开始批判。

8 月 10 日下午胡乔木作了长篇发言内容是批判所谓“斯大林晚年”这是彭、张谈话一个重要把柄。胡乔木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

胡乔木引述恩格斯《论权威》中的相关文字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是党和人民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这显然是指要维护毛泽东权威而言的。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被罢官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五省干部开始学习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三年自然灾害

1959 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当时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结束后被称为“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之中。

1961 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指出在 1960 年全国人民继续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 1958 年和 1959 年伟大跃进的基础上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1962 年 1 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刘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西楼会议

七千人大会以后，2 月 21 日至 23 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 1962 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

刘少奇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1962 年 7 月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1967 年 2 月 3 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1962 年 8 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申阶级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在 9 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文革爆发

1966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原五人小组上报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批准的《二月提纲》也被废除。“五一六通知”发布和“二月提纲”被撤销往往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 1967 年 5 月 17 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 17 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

发展过程

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 1969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二阶段：从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 1973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三阶段：从 1973 年 8 月中共十大召开到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粉碎。

文革舆论准备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 年 11 月 10 日在毛泽东的授意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 1960 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1]。《评》文认为该剧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当时负责中共文化宣传工作的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 1966 年 2 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同时林彪则通过解除罗瑞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一事基本掌握了军队的主导权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斗争做好了保障。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公报通过了《关于在全国青年中更好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

1966 年 5 月 4 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 5 月 9 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文革爆发

1966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原五人小组上报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批准的

《二月提纲》也被废除。“五一六通知”发布和“二月提纲”被撤销往往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 1967 年 5 月 17 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 17 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 会议同时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不过对于他们犯下的错误的通告同样也是机密文件并不公开。

学校教材

5 月 18 日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开始在全国各地实施及倡导个人崇拜。1966 年教育部、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教育战线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六六—九六七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

党的喉舌

由于原来负责北京市、中共文化宣传、解放军、中央文书等重要职务的四人被撤职其下的大批党员干部也受到牵连而林彪、康生等人则开始逐渐获得实权。康生改组了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被打倒。5 月 18 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

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造反狂潮一泻千里

10 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 10 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

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一月革命

1967 年 1 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 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这种抵制和抗争，或表现为对批判、造反持消极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或表现为对武斗、破坏持抗议立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

1967 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这年 1 月 19 日、20 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江青、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在激烈的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奋起抨击江青等人。2 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

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 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这些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经过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 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蒙冤刘少奇

1968 年 10 月 13 日至 31 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

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2]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 1512 人。当时，全国有党员 2200 万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从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而对于党应该怎样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予提及。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林彪集团覆灭

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还包含“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

1970 年 8 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9 月 13 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措施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问题。党中央决定撤销由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毛泽东亲自过问对一些领导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为“二月逆流”平反。

1973 年 3 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 12 月，毛泽东提出要给被打倒的贺龙、罗瑞卿和 1968 年因受林彪、江青诬陷而被撤销领导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恢复名誉，承认自己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做自我批评。这些行动为加快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各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创造了条件。[3]

纠正极左思潮

“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针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提出整顿企业的措施，恢复被破坏的各种规章制度；通过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等措施，解决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大大突破指标的问题，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他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的压力，努力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

在农村，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

定。在科学教育工作中，周恩来要求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并提议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他还抓了落实党的文化、民族、统战等政策的工作。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是 1967 年 2 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纠“左”整顿。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各方面工作都有明显起色。可是，在毛泽东看来，批判极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的。他认定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而不是批判极左。这样，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努力被迫中断。林彪事件后，党的一些重大的组织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载有林彪为接班人等内容的党章和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党的十大于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举行。当时全国有 2800 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 1249 人。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左”倾指导方针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后果日益明显。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但这时，也解放了一批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有些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举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稼祥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批林批孔”运动

1974 年 1 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乱社会的图谋有所察觉，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的问题。这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

同年 10 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四人帮”认为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阴谋活动，企图由他们出面“组阁”。

这时，毛泽东提议由已在 1973 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四人帮”极为不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遭到邓小平坚决抵制。事后，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毛泽东当

即批评了王洪文。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批评“四人帮”，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进一步提出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对江青的“组阁”企图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全面整顿

1975 年 1 月 13 日至 17 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这是饱受“文化大革命”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4]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

1975 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泽东曾在 1974 年 10 月至 12 月

的几次谈话中，提出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1975 年 11 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会混乱。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感到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

粉碎江青集团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 1976 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

这种不满像火山熔岩一样不可压抑的迅速喷发，是由“四人帮”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而引起的。

1976 年 1 月 8 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

天安门事件

自 3 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首都人民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4 月 4 日清明节这一天，聚集了 200 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花山诗海”中慷慨陈词，深切怀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迫害周恩来、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出现了一人振臂，万人应和，震天动地的感人场面。当时在广场上争相传抄、凝聚着爱和恨的那些诗词、传单，庄严地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心声。当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天安门广场的事态被定为反革命事件。

4 月 5 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就这样被压了下去。尽管如此，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一是决定在周恩来逝世后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随着邓小平的被撤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1976 年 7 月 6 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5]

7 月 28 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

9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

10 月 6 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文革后期

华国锋上台

文革的正式结束则是在 197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会议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华国锋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

华国锋当权后虽然成功击溃了四人帮但是由于他的权力来源只是毛泽东的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东兴等毛泽东晚年的卫士支持面对着邓小平这一批元老华国锋的经验、政策、革命历史也比不上邓小平故华国锋忧心会被这些元老夺去大权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泽东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10 月 10 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复工作。还有传闻说在政治局会议上常委之一（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华叶二人）的国防部长叶剑英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否则他也辞职。叶是华国锋逮捕四人帮时的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再加上他在军队中的权威令华不得不屈服。1977 年 7 月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8 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为副主席。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宣布文革结束

中共十一大 华国锋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 仍以肯定的态度对待文革。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 ‘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因此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斗争为纲。

拨乱反正

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开展了对文革的清理运动对文革中积极参与的人进行了抓捕审判。但是期间亦有打击面过大、冤假错案及选择性办案的情况。

邓小平掌权

1975 年 1 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78 年 5 月邓小平把握机会由他最亲密的战友、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负责在《光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创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他们巧妙地利用毛泽东的语录来为自己造势当时凡是支持该文实用主义论点的都是邓小平的支持者而党内大部分人确实接受了该观点 (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华国锋和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 。7 月 1 日建党节时邓小平成功地公开了毛泽东 1962 年为“大跃进”

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泽东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两个凡是”。到了 9 月邓小平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了。

1978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会上还重新评估了 1976 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为其平反。1979 年 1 月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指出康生对毛泽东的四个存在理论进行了篡改强调党的历史不等于就是路线斗争的历史。

1980 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的另一亲信赵紫阳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9 月全国人大召开华国锋迫于形势辞去国务院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至此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对四人帮的审判

1980 年 11 月由江华担任庭长的特别法庭开始并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国也开始广泛讨论重新评估毛泽东的功过是非。1981 年 1 月最后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人分别被判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江青后来在保外就医期间在寓所内自杀。文革中的受害者陆续平反这个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胡耀邦。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

文革影响

影响巨大。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遗产，大部分毁于一旦。造成了宝贵遗产的遗失，并且无法挽回。使国家政权遭到削弱，民主与法制遭到践踏，严重摧残了教育、文化和科学事业，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拉大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文革遗毒

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当时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全国铁路系统就承受了极大压力总共运载了 1100 万人次。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武斗时期被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迹则更是难以统计。

叶剑英 1978 年 12 月 13 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死了 2000 万人浪费了 8000 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 年 12 月 20 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 5000 亿浪费和减收共计 13000 亿人民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76 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 (关于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人持质疑态度认为是政府故意推卸责任的托辞) 非正常死亡在 5755 万人以上 (其中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

议争议的范围从 3000 万至 8000 万不等）经济损失 14200 亿元。近 30 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总的损失是中国前 30 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而“红卫兵”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红卫兵所带来的破坏不仅是对于中国历史文物及伦理道德的摧残他们也影响了人民生活及社会秩序交通、生产为之大乱。他们在各地互相串连彼此交换经验并免费供应食宿分别建立了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组织”。为了“破四旧”他们闯入了知识份子、富人及官员们的家中焚书、羞辱甚至毒打杀死屋主；学校也为他们所占据教师成为他们批斗的对象甚至被打成“牛鬼蛇神”；寺院、宫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等也成为红卫兵的破坏对象。红卫兵在文革期间所造成的破坏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恐怖灾难。

人道主义灾难

文革中非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级行政、司法和临时运动组织完全不必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程序和原则而判决处决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医疗服务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杀的。有些人的死刑没有经过审判往往是一个人说了算（例如：张志新）。中国大陆政府至今没有公开这一数目。由于文革期间各国家职能机构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可能这一总数早已无准确记录、统计的可能。同时文革期间中国基本对境外完全封闭而国内正常信息的传递也陷于瘫痪所以国内外非政府机构也无法做出可信的计算。国外科学家依靠在国内出

版的县志资料计算 1966 年到 1971 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有 50 万到 200 万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

文化教育

1966 年清华大学校门被拉倒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中国各级、各大教育机构基本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知名学者往往不堪羞辱选择自杀。

1968 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1970 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工农兵大学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改变教育系统即将激进的思维强加到各大院校中。工农兵学员虽然文化水平低，但是由于其政治立场和后台往往可以

随意批判学术权威，他们中还有不少人编写政治思想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教材等供中小学使用。

青年与知识分子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一些年轻的学生因不能适应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繁重的劳动因病或自然灾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结束后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则永远地留在了那里。部分知识青年在农村真正地“落户”，有的还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面。

但是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知识青年下乡对农村开发建设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知识青年受的教育不多。对农村的建设作用也不大，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农村依旧贫穷落后，其农村建设也不如邻近的日韩和台湾。

中华文化传统

毛泽东思想在文革中成为中国的主导政治理论截止到 1967 年 12 月已经出版《毛主席语录》3.5 亿册这对在中国扫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泽东热爱法家思想不爱儒家因此在 1966 年兴起了“兴法批儒”运动。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任何修正主义倾向都会受到批评和批判全国盛行“造反有理”的口号法律完全受到漠视。

全国大量文物受砸毁古迹被破坏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出身成分论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成为文艺歌颂的主角但是劳动人民除外的资本主义家或者那些学者都遭到了抄家批判他们的孩子上学都会遭到歧视辱骂。

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大量的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工作者被迫下乡甚至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批孔扬秦直接对准了中华文化自汉朝后的主流儒家文化。

民族与宗教

沙甸事件

文革期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完全丧失回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受到迫害。1975 年发生的沙甸事件中发生了整村武装反抗事件后遭到镇压。红卫兵曾前往扎什伦布寺的佛塔将在该寺曾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骨挖出肢解抛弃后被藏人找回。

科技经济

文革期间中国亦取得了一系列科学技术和基础建设的成就：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红旗”高级轿车、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成昆铁路建成通车、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第一台离子注入机、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集成电路数控机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台天文测时、测纬光电高仪华北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刘家峡水电站、葛洲坝的建成、杂交水稻、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不过对于此成就大部分学者及人民抱持反对态度。例如：有参与核武器研发的科研人员就透露核武器的科研工作绝大部分事实上在文革发生前就已经完成并非是文革期间的成就。除此在经济成长方面除了文革表面经济数据远远低于全世界之外文革后高度经济成长也相对显示文革期间的衰败。

大量文物古迹严重损毁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有大量文物被焚毁古迹等也遭到摧毁破坏给中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文革中的“破四旧”活动将中国城市与乡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古迹和遗产当成封资修的东西彻底破坏和毁尽。就连和平解放的古北京城的大量古迹也惨遭破坏。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

日本文化界发表“反对文化大革命”宣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曾经居住于中国东北十数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等数百位作家、艺术家联名发动抗议盼望中国当局能保护中国历代文物免遭破坏；受鼓动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向防暴警察扔自制的燃烧弹；

香港在文革期间爆发多次由共产党领导的激进左派工人罢工运动之后演化成六七武装暴动；

法国在 1968 年发生全国性罢工动乱工人、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游行；

美国学生佩带红袖章示威；

澳大利亚大学汉语系的学生自制红卫兵袖章卖钱生意兴隆。“造反有理”这句口号被全世界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使用；

中华民国政府于 1966 年 11 月以复兴文化之名义开展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抵制文化大革命并组成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总统蒋中正则多次发表谴责说话甚至已经指示中华民国国防部令五十万国军备战战斗机天天升空演习准备反攻大陆据说蒋也以前黄埔军校校长身份与学生林彪保持信函连络；后因美国拒绝提供台湾作战战略物资补给趁大陆“文革”来“反攻大陆”作战之举方停。

相关人物

江青，山东诸城人，1915 年出生，1991 年逝世。 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	陈伯达 （1904～1989），原名陈建相，字仲顺，福建泉州惠安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	纪登奎 （1923 年 3 月 17 日 - 1988 年 7 月 13 日），山西省武乡县人。1938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德（1913～1995）：河北丰润人。1932 年参加反帝大同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		
陈锡联 （1915 年 1 月 4 日 - 1999 年 6 月 1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名陈锡廉…	叶群（1917–1971），原名叶静宜，福建闽侯 (今属福州市）人。林彪元帅夫人，国民…	谭厚兰 （1937—1982）湖南人，女。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58 年…	王力，原名王光宾[1]，1921 年 8 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 （今江苏省淮安市），14 岁…		
关锋 （1919年7月—2	安子文（1909—198	曹轶欧 （1903 年 1 月—	张平化（1907-2001），		

005 年 6 月 7 日），文革期间的中国政治家。本名周玉峰，山东省庆…	0），1909 年 9 月生，陕西省绥德县双湖峪镇人，原名安志瀚，字浩…	1989 年），原名曹蕙芬、曹淑英，曾用名林康、林娜，北京市大…	原名张楚材，出生于炎陵（原酃县）石洲乡。1927 年 11 月加…		
穆欣（1920~2010.09.03）河南省扶沟县下坡村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	张耀祠（1916—2010），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曾…	赛福鼎艾则孜 赛福鼎·艾则孜（1915-2003）维吾尔族。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	黄永胜 (1910 年 11 月 17 日——1983 年 4 月 26 日)，原名黄叙钱，湖北咸宁人。中国人民解…		

历史评价负面评价

当前主流媒体及中国与世界各国学者对于文革主要持负面评价。

对于文化大革命现在中国官方自从 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始终采取否定的态度。其长期正式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文革爆发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对国内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功绩使他的声望达到高峰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逐渐脱离实际而个人专断凌驾于中央之上使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严重破坏。

文化的倒退

多数中国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经济文化停滞甚至倒退，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同程度的承受了这场不幸。由于文革是由毛泽东策划、发起和基本控制的毛泽东应为这场灾难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还有一些人认为文革本质上是毛泽东等人依靠支持群众夺回丧失的权力而发起的政治运动，毛泽东正是包括江青在内的文革中坚的后台人物，他在文革爆发初期不断对当时的党中央施加压力，引致文化大革命一发不可收拾。

经济

文革对中国的经济破坏是灾难性的。毛泽东曾经的战友林彪的心腹就曾经私下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外交

在外交方面中国政府因文革的进行与外国关系陷于紧张（如火烧英国代办处）中国驻外人员在外国宣扬文革并输出革命还有与苏联的诸多紧张冲突让当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问题最多和最不受欢迎的国家与很多国家的外交关系更降到冰点。

教育

在文革时期文化教育被轻视、不用考试是当时教育的特点。学生生活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学习对象有《毛泽东语录》、最新指示、《毛选》）和停课闹革命、街头运动（这种运动很适合精力过剩的年轻人）等内容教育质量极低。高校招生人数减少 10 万人。

传统文化

在文革大量文物遭到破坏。中华文化很多传统的仪式和习俗信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彻底在中国大陆消失。有些中华文化的传统习俗甚至只在同受中华文化影响下的台湾、港澳、日本和韩国有所完整的保留下来

此外文化大革命后军队长期战力受到严重损毁造成军队“红而不专”（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欠缺军事知识技能）和训练不足与沟通不良的结果使后期的中越战争所造成严重的死伤就是一例。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国便出现了以《班主任》、《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流行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从1978 年开始撰写的《随想录》中对于文革也进行了反思。并且在此后不断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在 2005 年春节广东省澄海市塔山风景区上、民间组织的文革纪念馆 正式开放但直至 4 月 17 日经《汕头都市报》报导后才引起注意。

蒋介石：**“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在日记中还写道：“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寒光在以后多次引证了这个论据。**

在台湾不论蓝绿统独均对文化大革命抱持负面的观感，成为发展两岸关系的阻碍之一。文化大革命甚至消减台湾人的反日情绪。而红卫兵一词在台湾也属于极为负面的名词之一，在台湾曾有人发生争执而骂对方是红卫兵，被告上法院而遭到检察官以公然侮辱罪起诉。

正面评价（编者十分不赞成这种评价）

近来有少数极左派人士（例如静火）尤其毛派为文革翻案认为“文革”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普遍解放的时刻”是“反官僚化”和“反等级化”的产物是中国人民的“黄金十年”。

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大运动暴露出了许多重要问题有些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1 领导人如何退出如何交接班。2 领导人要联系群众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反对干部脱离群众毛泽东最后的失误就在脱离了群众。3 群众如何发出声音如何监督。人大的作用有限。

毛主席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点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圣火。他首先粉碎了对神仙皇帝的迷信再后来号召无产阶级起来把革命的矛头对准了当权的官僚主义最后亲手捣破了对林彪的迷信甚至对自己的迷信。他用自身的实践教育了无产阶级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正如国际歌中所唱无产阶级只能靠自己的双手砸碎任何反动的压迫的阻力解放自己。

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1942 - 1945)	土地改革运动(1947 - 1952)	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 - 1953)	三反五反运动(1951)	反右运动(1957 - 1958)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	大跃进(1958 - 1960)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	四清运动(196	学雷锋活动(1963)

动(1958)		966)	3-196 6)	
农业学大寨(1963 - 1976)	工业学大庆(1963 - 1976)	文化大革命(1966 - 1976)	上山下乡(1955 - 1978)	一打三反运动(1970)
“批林批孔”运动(1974 - 1975)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5 - 1977)	五讲四美三热爱(1980)	三讲(1998 - 2000)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0)
科学发展观(2003)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4)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5 - 2006)	社会主义荣辱观(2006)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3)

参考资料：

- **1．中国共产党简史 ．[2015-3-19]**
- **2．1966 年身处逆境刘少奇批文革：这不是搞马列主义 ．[2015-3-19]**
- **3．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2015-3-19]**

- **4．中国共产党简史（二）　．[2015-3-19]**
- **5．第七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2015-3-19]**
- **6．邓小平"文革"文稿首次披露——纪念邓小平诞辰 110 周　．[2014-8-19]**

目　　录

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二）

目录

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二） 6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3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21

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35

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五·七指示* 39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 42

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 6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64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64

二、主流和曲折 64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65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65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66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66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67

八、干部问题 67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68

十、教学改革 68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69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69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69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70

十五、部队 70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70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72
对四位外国专家的大字报的批语* 73
一、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 74
二、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 74
三、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 74
四、允许并鼓励我们密切地结合工农群众。 74
五、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74
六、我们的孩子和中国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 74
七、生活待遇和同级的工作人员一样。 74
八、取消特殊化。 74
驻外机关也要革命化* 75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77
斗争要文明些，坚持文斗，不用武斗* 91
对刘少奇到学校做公开检查的批示* 93
对《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 94
论夺权* 99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102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106
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 110
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117
批评“二月逆流”〔1〕* 127
论革命的“三结合”* 133

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136
是义和团侵略了帝国主义了吗？*.....137
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141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143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149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155
在听了氢弹会议汇报后的讲话*.....158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161
接见刚果〔布〕〔1〕总理努马扎莱的谈话.....165
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167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电报*.....172
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和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174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76
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要和工农兵结合.....178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180
二、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181
三、为什么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成长快、贡献大呢？.....182
四、从工厂看教育革命的方向.....184
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赤脚医生就是好*.....187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191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194
对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196
关于战备疏散的指示*.....207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的电报*.....210
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212

与黎笋的谈话*.....220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226
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228
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230
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231
我的一点意见*.....232
与斯诺的谈话－关于文化大革命*.....235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244
对外宣传工作不可强加于人*.....254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259
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272
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273
对反革命不要杀，保留活证据*.....280
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中国方面的声明*.....282
一、美军撤出南朝鲜；.....284
二、南北方军队均裁减至十万人以下；.....284
三、废除韩美、韩日条约，确立民族自主权；.....284
四、举行南北大选，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284
五、保障政治活动自由；.....284
六、作为过渡性措施，实施南北联邦制；.....284
七、广泛进行南北经济、文化、人员交流；.....284
八、召开南北政治协商会议。.....284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285

祝贺越南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286
接见基辛格时的谈话*〔1〕.....289
启用邓小平*.....305
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314
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谈话*.....315
同英国前首相希思的谈话*.....319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326
对在押国民党战犯、党政军特人员一律释放*.....345
关于《水浒》的评论*.....348
中美关系会一点点好起来*.....350
祝贺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救国战争取得胜利*.....363
对天安门事件的指示*.....369
后事交代*.....376

书籍在版　　内部发行

社会主义探索时期

关于农业机械化－备战备荒为人民*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就农业机械化问题致刘少奇的信

少奇同志：

三月十一日信〔1〕收到。小计委〔2〕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五、七、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

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

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

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

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3〕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似以余秋里、林乎加〔4〕二同志去为宜。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话，似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也只有大约七十人左右去到那里开一个七天至十天的现场会。是否可行，亦请斟酌。

注释

〔1〕指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文件和主席的批语，已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并发给包括计委、经委在内的各有关部委及华北局有关同志研究。在有各在京副总理参加的中央常委会上谈了这个问题，大家意见，要小计委就这个问题对有关各方面情况先摸一摸，提出一个方案，中央再来讨论，并要提交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加以讨论，以使各地方的努力更加符合实际。周恩来同志已要小计委派人到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他们提出的方案，先在湖北进行试验。刘少奇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

〔2〕小计委，是一九六五年初毛泽东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一个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

针任务等。后来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由小计委实际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

〔3〕见《论语·颜渊》。

〔4〕余秋里〔一九一四——一九九九〕，江西吉安人，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小计委负责人。林乎加，一九一六年生，山东长岛人，当时是小计委成员。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学校一律要实行半工半读*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1〕一文的批语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学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

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2〕，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3〕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

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

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注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一六八号上。这期摘要登载的《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抽调一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分别到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北京分公司试行在工厂办学、到北京市海淀区温泉公社试行半农半读的情况。毛泽东的批语当时没有印发。

〔2〕“四清”运动，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3〕这是晚唐诗人章碣写的七绝《焚书坑》。原诗是：“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里指不读书的刘邦和项羽就能打下天下。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关于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

苏联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了。苏联是在内外皆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打，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1〕。

〔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还发不发贺电？〕

（毛泽东回答道）发还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二〕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改变了过去苏区的政策。这个政策是灵的，正确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2〕，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

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自然科学史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范老是帝王派，对帝王派将相很感兴趣，反对青年研究历史，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3〕。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4〕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现在全国二十八个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还有你那个北京刊物《前线》〔5〕，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6〕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区注意一下，报纸、文艺各方面都要管。

尹达这篇文章〔7〕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各报都应当转载。尹达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8〕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吴晗、翦伯赞，不要剥夺他的吃饭权。不要怕触犯了罗尔纲〔9〕、翦伯赞等人

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

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写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写等于学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听、写为主。至于写史，到工作时再说。不要只读死东西，不搞应用。我们解放军的军长、师长，对宋朝、明朝、尧舜不知道，同样打胜仗。读《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他那样打仗的。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戚本禹〔10〕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还为他出全集呢！

〔林彪：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

把新生力量，如学生、助教、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立起来。改了就好，不改也不要紧。还是尹达讲得对。他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

〔朱德：打倒那些权威。陈伯达：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

〔陈伯达：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你死，他就夭折了。〕

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三〕工业体制问题

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在南京，我和江渭清〔12〕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斗争武器。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归市，扯不清。

〔刘少奇：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员太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

现在要做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

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

〔周恩来：要搞机械化。〕

先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鸣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

〔周恩来：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

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

〔彭真：上海用机器支援农村，由非法变合法。〕

非法要承认合法，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变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派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13〕好。英国女皇、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

〔彭真：办托拉斯〔14〕，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上就是工业党。〕

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15〕。

……

什么军区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没有什么经验，过去三个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只生产精神。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中央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个人、一粒粮、一颗子弹，只有来源于你们的实践经验，根据你们打胜仗打败仗的经验，出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16〕，这样不行。

〔周恩来：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

飞机厂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要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老产品带新产品。〕

〔林彪：老带新，这是中国的道路。〕

这好象抗战时期带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

〔彭真：小钢厂有四千个，给中央统光了。〕

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

〔彭真：明年搞个办法。〕

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

〔周恩来：现在搞农业机械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

那就叫八机部的陈正人〔17〕去当厂长嘛！

有的对农民实在挖得苦，江西一担粮收税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

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统死。

〔刘少奇：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

你用战争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么？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面无权管。

〔陶铸：中央也无权呀！〕

现在我们允许闹独立性。你对官僚主义就闹嘛！要象戚本禹等人那样闹独立性，对错误的东西闹独立性，你宣传部长不要压嘛！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众运动，让学生鸣放。我赞成挖他们的墙角，包括挖部长的墙角。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角。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学生读过的明史，吴晗没有读过呢！俞平伯〔18〕一点学问也没有。

〔林彪：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

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

〔林彪：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

〔林彪：这些人只想专政。〕

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判得好，把大是大非讲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谓“谴责小说”是反动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专政。他们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

把农业机械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注释

〔1〕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领导人，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三日出生于古巴东方省比兰镇。他一九五○年毕业于哈瓦那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卡斯特罗领导发动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在法庭上发表了举世闻名的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一九五五年，他流亡美国、墨西哥，在墨期间筹划“七·二六运动”。卡斯特罗一九五六年回到古巴，在马埃斯特拉山区创建起义军和根据地。一九五九年一月，他率领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出任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卡斯特罗一九六二年起担任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一九六五年该党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后，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豺狼当道”典出《后汉书·张纲传》，东汉末年，外戚诸梁姻族满朝，大将军梁冀专权。朝廷派遣张纲等八人分道巡按各州郡，纠察收审贪官污吏。张纲衔命出洛阳，叹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遂将车轮埋于都亭，起草弹劾梁冀的奏章。意即：祸国大盗正在那儿当道呢！何必去抓小偷啊！

中苏论战时，古巴保持中立，其实，卡斯特罗在内心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不满，对苏联国内的经济改革看不惯，认为是革命的蜕化，在这些问题上他

和毛泽东倒是完全一致。古巴的另一个领导人格瓦拉甚至公开说中国的人民公社为古巴和第三世界树立了榜样。但古巴经济严重依赖于苏联〔古巴这个当时仅七百万人口的小国最多时从苏联获得的收益相当于每年人均四百美元〕，不得不最终站到了苏联一边，卡斯特罗一九六五年三月发表演讲点名批评中共是“修正主义者”，两党关系中断，两国间也恶感日盛。

毛泽东起初主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认为苏联才是危险的“豺狼”，而像古巴不过是“狐狸”，应该“分化瓦解、多多争取”，此后便认为古巴也变成了“豺狼”，后公开予以批判。

二○○七年，卡斯特罗在其口述新书《我的生活》中说到：“我真希望跟毛泽东结识，但因为中苏当时矛盾和分歧而变得不可能。在世界最伟大的政治战略家中，在古往今来所有的军事领袖中，你一定不能漏掉毛泽东。”

〔2〕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范文澜，著名历史学家，时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两人同为国学名家。

〔3〕一九五八年，史学界爆发了以“厚今薄古”为口号的“史学革命”，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成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传统的旧史学被整个地翻了案，几千年来被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终于被再颠倒过来了。劳动人民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人，农民起义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帝王将相统治阶级则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如过去被旧史咒骂的发匪拳乱，在新史中是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旧史中被尊为“完人”

的曾国藩之流，则被冠以“反革命刽子手的真面目”。范文澜为二保论者〔即保“王朝体系”，保“帝王将相”〕。范老在一篇未刊稿中指出：所谓“二保论”，一是按中国历史上朝代作为顺序编写历史；二是中国历史各朝代的统治者，政权代表的皇帝、大臣、名将等，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有人主张打破王朝体系，我不赞成，因为王朝体系打不破，也没有法子打破。”但范文澜也支持“厚今薄古”，曾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4〕吴晗是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曾编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言道“老百姓应指望清官”。翦伯赞，历史学家，时任北大副校长，反对姚文元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

〔5〕《前线》，北京市委刊物。此处的“你”指彭真，时任北京市委书记。

〔6〕廖沫沙，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曾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有鬼无害论》。

〔7〕尹达，原名刘火翟，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时任考古研究所所长。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转载《红旗》一九六六年第三期他的文章《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尹达自注文章作于一九六四年八月。文章说：

“史学长期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资料，经过剥削阶级史学家的加工、整理、选择、淘汰、删节和阐释，就必然注入其阶级偏见，字里行间无不充满强烈的阶级性。”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研究和改写全部历史，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批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进行史学革命，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史学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千百万人民群众中彻底清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的问题。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种潜在力量，只有彻底进行史学革命，才能把它清除。”

〔8〕赵毅敏，原名刘焜，一九六一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关系更加恶化。一九六二年意大利共产党召开党代会，为了配合苏共压制中国共产党，只邀请一位代表与会。赵毅敏受命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人煽起的反华合唱，赵毅敏孤身一人，据理抗争，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尊严和荣誉。毛泽东写下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诗句，其中的“英雄”有指他的意思。

〔9〕罗尔纲，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曾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忠王李秀成投降实为苦肉缓兵之计》，认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是假投降曾国藩。李秀成被清军俘获后，五、六天时间内写了三万多字的“自述”，后人命名《忠王李秀成自述》，其中多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希望他们收降部众，“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屈节求生，向曾国藩表示愿意招降太平军余部，所写笔供中有“收复军部，而酬高厚”之语，被俘十七天后，曾国藩还是把他杀了。

〔10〕戚本禹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了翦伯赞“超阶级”的“历史主义”观点，文章说：

“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贫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

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趴在历史故纸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们去宣扬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

戚本禹在一九六三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文章根据李秀成自述，提出，李秀成“形容自己是‘骑在虎背，不得下骑’”，“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艰苦朴素的作风”。“忠王府是个未完的工程，几千个工人长期建筑了三年多，到苏州陷落时仍未竣工”，“李鸿章见了忠王府也不禁叹道：‘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同一时代，同一种历史条件，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种人宁死不屈，慷慨赴义，另一种人投降变节，屈膝媚敌”，断定李秀成是真投降，“认贼作父”，《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做了摘要转载，毛泽东看了戚的文章后，专门调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写下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11〕姚文元，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污蔑说：“吴晗身为明史专家却不惜歪曲历史史实编造出一个完美形象的假海瑞，剧中的‘退田’和‘平冤狱’都不是史实，历史上的‘退田’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保护了一些中小地主

和富农，而剧中却说成是保护贫雇农，历史上退休内阁首辅徐阶的儿子徐瑛只被判处充军，也不是海瑞判的，而剧中却说海瑞‘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身为共产党员不去提倡阶级斗争，却去鼓吹‘清官救民’的封建论调，把剧中的贫雇农说成是只会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向海瑞叩头高呼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很明显，吴晗是用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改造了这个人物：“海瑞不过是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

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2〕江渭清，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3〕“虚君共和”，毛泽东认为中央高度集权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并提出了“虚君共和”的构想.这一构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彻底贯彻,建构了中国计划体制中的中央高度集权,形成地方政府成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体制,从而使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别于苏联模式。

〔14〕托拉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建议试办托拉斯〔垄断企业〕，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煤炭工业部向中央提出在徐州成立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试办托拉斯，四月三十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我国试办的

第一个托拉斯企业正式成立。一九六四年六月，国家经委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了《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草稿〕》，获得批准，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共全国试办了十六个全国性和区域性托拉斯，但试办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主要有三大方面：全国或跨地区的托拉斯与地方的矛盾，托拉斯内部统一经营与的所属企业分级管理的矛盾，托拉斯同原有经济管理体制的矛盾。

〔15〕二十三条，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6〕南粮北调，北方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等省区及北京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但这些地区无一例外地都要调入粮食，江浙、两广、两湖一带南方自然条件好,粮食生产充足。国家长期实行南粮北调政策，进口的粮食也主要是接济这些地区。尽管如此，这里农民的口粮和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北方最严重的问题是灾害频发，其中尤以旱灾最为严重。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国务院全面部署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以此作为扭转南粮北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以后几年，每年以三十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这是在华北平原上一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国家在计划中给予资金补助，并提供设备材料，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文革中，华北大地上打了近二百万眼机电井，

一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农业生产条件，加上化肥工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扭转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南粮北调局面。

北煤南调，我国煤炭资源多集中在山西、陕西及内蒙古西部，而用煤“大户”则集中在华东、华南地区。从而形成了北煤南调的格局。

〔17〕陈正人，时任第八机械工业部〔原农业机械部，一九六五年一月改称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

〔18〕俞平伯，著名红学家，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解放前二十年代即已成名，一九二三年俞平伯出版《红楼梦辩》，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毛泽东对《红楼梦》不仅喜欢，而且颇有研究，也堪称是一位红学家，对于《红楼梦》，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评判，俞平伯用实用主义哲学进行研究，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描写了很精细的历史、有丰富的社会史料，俞平伯认为《红楼梦》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性质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高的。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评*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同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一〕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的谈话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

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1〕。

《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2〕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二〕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的谈话

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定〔3〕，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4〕？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

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5〕要解散。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去年九月〔6〕，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四〕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的讲话

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7〕。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的很广泛，涉及面很宽。朝里有人，比如中央宣传都、中央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

在党中央各部门，包括大区、名省市，朝里是否那么干净？我不相信。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四〕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的讲话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8〕，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问题就大了。

注释

〔1〕农村工作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于一九五三年二月组建，一九六二年被撤销。三年困难时期后，为走出困境，中央上层在农村工作上存在两个方向，毛泽东坚决主张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农村工作部部长〕则坚持分田到户和包产，陈云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面见毛泽东，提出“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八年”，对此毛泽东没有相信，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后，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北戴河中心小组会议上，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

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

毛泽东认为，农村个体小农经济，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必须同步；否则，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将面临绝大的困难。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也不是不能增产，但“增产有限”。而且势必引发贫富两极分化。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井冈山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所以，他坚决反对恢复到个体经济。邓子恢未向中央请示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多次作报告阐述和传播包产到户主张，不仅工作犯错，而且违反组织纪律，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撤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决定》。

〔2〕邓拓，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拒绝在北京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邓拓一九五七年曾主持《人民日报》工作，反对鸣放，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毛泽东当面批评了他，“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后被调离《人民日报》，邓拓怀恨在心，在与胡绩伟一次谈话中，攻击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讲过的话，可以翻脸不认账”，这种思想反映在《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等《前线》的杂文中。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代表了西方的观点，其中也指出，“邓拓——另一个曾撰文影射毛的领导的北京市官员。”

〔3〕关于阶级斗争的决定，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

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4〕打招呼，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杨永直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彭真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5〕五人小组，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中共中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副组长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成员有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个“五人小组”起初并没有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一直只称为“五人小组”。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时，才出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名词。

〔6〕去年九月，中共中央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十月十日，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了话，提出要战备。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又说，如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7〕三家村，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日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由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轮流撰稿，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村”〕，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统一署名“吴南星”。

〔8〕西风落叶下长安，唐朝诗人贾岛在《忆江上吴处士》中有一名句，“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写过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这里指修正主义者处于萧条凄凉的境地，我们进攻的号角就要吹响了，“飞鸣镝”。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定修改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的主要部分

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王明〔2〕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3〕，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4〕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依靠和希望。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敌人一定会从各方面破坏它，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企图对它进行思想腐蚀。而有的人却在毛主席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事实上，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抓壮丁》〔5〕这样的坏影片。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同时，我们自己培养的真正过得硬的创作人材还比较少；创作思想问题还很多；组织上也还有些不纯。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解决。

四、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明确地规定部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军队中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文艺骨干；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资产阶级有反动的所谓“创新独白”，我们要标新立异，我们的标新立异是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反动派的棍子。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自卑感，而应当有自豪感。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6〕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古典文艺，甚至美国电影，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人民生活，只有人民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从来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我们人民解放军开头也是弱小的，终于转弱为强，战胜了美蒋反动派。面对着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和光荣的任务，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但是，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对创作中的困难，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蔑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功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时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不这样，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忽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也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南海长城》〔7〕一定要拍好。《万水千山》〔8〕一定要改好。并通过这些创作，培养锻炼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队伍。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就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至于抓创作的干部，对待文艺创作，应该经常记住这样两点：第一，要善于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第二，要善于分析这些意见，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完全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基调还好，要指出其缺点错误，把它改好。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我们不要怕群众，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群众会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另外，也可以提高群众的鉴别能力。摄制一部电影要花费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把坏片子藏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放映，从而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又可以弥补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做到思想、经济双丰收呢？影片《兵临城下》〔9〕演了好久，也没有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可以写篇文章批评一下。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的庸俗捧场。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功夫〔10〕；当然也要写一些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较长的文章。反对用名词术语吓人。只有这样，才能缴掉那些所谓“文艺批评家”的械。《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要开辟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文艺评论专栏，对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热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点；对坏作品，要进行原则性的批评。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人是认识问题，他们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文艺

评论要成为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没有正确的文艺评论，就不可能繁荣创作。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11〕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12〕，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军队是否可以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有分析的、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国内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做。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塑造典型，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其实，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这就需要我们的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不要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选择题材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调查研究，才能选对、选准。编剧要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等人员也

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的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我们的经验比较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根据地，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缺点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现在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才能真正学得懂、学得通、学到手。要长期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提高阶级觉悟，改造思想，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注释

〔1〕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由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等参加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同志多次修改。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又经毛泽东多处修改的《纪要》全文。

〔2〕王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领导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3〕《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文章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毛选第二卷，文章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写于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作为附件随纪要一起转发，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曾刊发，内容不长：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章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章提出“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

〔4〕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5〕《抓壮丁》，国民党反动派打着抗日的招牌，在四川农村抓壮丁。某师管区负责抓壮了的卢队长，借机对老百姓敲诈勒索，奸污妇女，无恶不作。地头蛇王保长也贪赃在法，乘机大发横财。佃农姜国富为使独生子不被抓壮丁，用变卖家产的钱托地主李老栓向王保长求情。谁知李老栓为使自己的二娃子免抓壮

丁，竟用姜国富的钱买通王保长将姜的独生子抓去当替身，无依无靠的姜国富无处伸冤，被逼自尽。贪得无厌的王保长又侵吞了李老栓大娃子寄给家里的一笔钱，还欺侮李老栓的儿媳妇三嫂子，由此引起一场狗咬狗的争斗。李老栓的大娃子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上副官后回乡拉队伍，他封官许愿，与卢队长、王保长达成默契，要他们抓更多的壮丁，然后委任卢队长为营长、王保长为连长。虽然结尾处，受尽欺压的农民终于起来造反，以武装斗争维护自己的生存权，但本剧把佃农等一些群众也进行了丑化，从剧中看不出一点光明，整个中华民族被描写成了一团漆黑。

〔6〕“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争，指一九三六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先由上海文学界地下党领导周扬提出，并由此开展了国防文学运动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活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由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到上海和鲁迅、胡风等商量后由胡风撰文提出的。受到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作家的指责而发生论争。鲁迅撰文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批评了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左翼领导人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这是左翼文学界在新形势下围绕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发生的论争。

鲁迅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的提法，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鲁迅进一步强调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

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头昏，浑乱。”并苦口婆心地跟徐懋庸那帮人作了解释：“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

在这里，鲁迅正确地说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关系，而且针对左翼文学队伍中有的人忽视、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意义。鲁迅同时认为，“国防文学”是“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这个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的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

国防文学明显存在着右的错误和宗派主义倾向。他们否认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不提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的。各派的斗土，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他们以是否赞成国防文学作为加入联合战线的条件，宣称凡是反对、阻碍或曲解国防文学的，都是其敌人，并错误地把当时的文艺划分为国防文艺和汉奸文艺。在民族矛盾急遽上升的历史转折关头，“国防文学”的某些倡导者还

不能充分认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辩证关系，暴露出若干“左”的或右的不正确观点。

三十年代中期的这场争论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但当时却形成了几乎对垒的形势。周扬等人把持的《光明》、《文学界》等刊物主要发表“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夜莺》、《现实文学》等刊物则主要发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拥护“国防文学”口号的作家，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作家，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其间双方发表的论战文章，竟有四百八十篇之多！出现了“一条战线，两个阵容”的不正常的状况。

〔7〕《南海长城》，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和江青观看了热门话剧《南海长城》，并予以充分肯定。该剧讲述了一九六二年国庆节前夕，大陆沿海大南港民兵连长区英才，率领甜女等守岛民兵，消灭了国民党派遣特务入侵骚扰的故事。同年八月，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将这台话剧搬上银幕，特选派本厂实力派导演严寄洲执导，同时，还聘请江青为艺术顾问。由于创作思想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在影片筹拍和外景摄制阶段，严寄洲常常与江青发生激烈的争论，致使影片创作进程迟缓。一九七五年十月，《南海长城》重拍摄制组成立，根据新的文艺原则“三突出”标准拍摄，由刘晓庆主演，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拍摄完成，国庆后公映了。

〔8〕《万水千山》新中国第一部长征题材的电影，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于一九五九年摄制。由孙谦、成荫根据陈其通同名话剧改编。影片反映了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斗生活，表现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经受了严

酷的战争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种种考验，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任务。影片以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真实地再现了当年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腊子口战役等雄伟壮观的战斗场景，以高亢激越的笔调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本版电影只反映了一方面军，没有反映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毛泽东曾批评：“写了分裂主义，只写了一方面军，不写二、四方面军。草地一场，凄惨低沉，一个教导员还死了。”一九七七年严寄洲担任导演重拍了此片，增加了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内容,是一部完整的红军长征史。

〔9〕《兵临城下》，解放战争时期，孤守东北某城的国民党军队处于东北民主联军的包围之中。为了争取国民党非嫡系部队三六九师师长赵崇武起义，民主联军释放了被俘的赵崇武的亲信团长郑汉臣夫妇，并答应代为寻找他俩失散的孩子。郑汉臣深受感动。但他回到城里后，受到国民党嫡系部队二○三师的参谋长钱孝正的怀疑，使他十分反感。不久，郑太太被二○三师某连长所辱。消息传来，郑汉臣怒不可遏，欲与二○三师拼命，被赵崇武制止。民主联军姜部长以为郑汉臣送孩子为由，乔装前往三六九师驻地，力劝赵崇武认清形势，弃旧图新。赵崇武虽有起义之意，却无决心。这时，国民党军胡高参亲临孤城督战，当晚，钱孝正命令部下包围郑汉臣的家，准备逮捕姜部长和郑汉臣。但姜部长早已转移至赵崇武家，并连夜化装出城。胡高参命令三六九师担任突围主攻任务，二○三师执行破坏工厂和水电站计划。但三六九师突围时遭到民主联军迎头痛击，赵崇武负伤。民主联军向城内步步进逼，赵崇武深知大势已去，又看到蒋介石命令突

围后将他铲除的密电，决定率部起义。他们逮捕了胡高参，击毙了钱孝正，二○三师被迫投降，孤城宣告解放。

〔10〕二百米内的硬功夫，当时，我军在单兵战术训练上，重点放在培养战士的勇敢精神上，在二百米内掌握射击、投弹、刺杀三大基本技术。这里指具有勇敢战斗精神的文学作品。

〔11〕丘赫拉依，苏联导演，曾导演《第四十一》，剧中描写了红军女战士爱上了白匪俘虏，当白匪军来救这个俘虏时，红军女战士还是枪杀了俘虏，用来展示人性的复杂。

〔12〕肖洛霍夫，前苏联著名作家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代表团时的谈话节选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

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

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

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2〕、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注释

〔1〕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曾任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斯大林生前吹捧斯大林是自己的“生身父亲”，斯大林去世后发布秘密报告，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全盘否定斯大林，并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

斯大林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三十年，是公认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他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

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来说，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指导帮助了中国、朝鲜、越南、东欧等多个国家的革命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就等于取得政权，就等于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修正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详见由毛泽东同志主持编写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2〕罗瑞卿，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会议，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叶剑英、聂荣臻、谢富治、萧克、杨成武、刘志坚等相继发言，批判了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对待、不尊重各元帅、个人独断”的错误，最后，毛泽东提出：“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林、向党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了批判，三月十八日，罗瑞卿从办公三楼跳下，摔断了腿，毛泽东听说后，骂了句“没出息”。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通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错误时，是这样说的：“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几十个人，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此时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就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他的这种行动，是对抗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对抗同志们的批评。”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中央工作组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报告，由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转发全党，指出罗的错误有：

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

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他对林彪同志、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叶剑英、徐向前和已故的罗荣桓同志，妄加议论、攻击和诽谤。”

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

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罗瑞卿迫不及待地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当时他跑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干部问题时，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房门外在走廊里还叫嚷说：“不要挡路”。”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这是毛泽东通知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

林彪〔1〕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2〕；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3〕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注释

〔1〕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

〔2〕社教四清，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大庆油田，大跃进时期，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在松嫩平原上一个叫大同的小镇附近，发现了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当时正值国庆十周年之际，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欧阳钦提议将大同改为大庆，将大庆油田作为一份特殊的厚礼献给成立十周年的新中国。一九六○年三月，大庆油田投入开发建设。大庆油区的发现和开发，证实了陆相地层能够生油并能形成大油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石油地质学理论，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对中国工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新华社播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首次向世界宣告：“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中国石油工业彻底甩掉了“贫油”的帽子，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文革时期，大庆人发扬“铁人精神”，石油

产量逐年提高，到一九七六年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首次突破五千万吨大关，进入世界特大型油田的行列，此后，年产五千万万吨的纪录，大庆人奇迹般地保持了二十七年。到二○○九年，五十年间，大庆油田生产原油超过二十亿吨，占同期全国原油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为建立我国现代石油工业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百年中国科学史上，让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有两大事件，一是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一是发现了大庆油田。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党内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1〕，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2〕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

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

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的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

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

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3〕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4〕，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注释

〔1〕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机构，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中共中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副组长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成员有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个“五人小组”起初并没有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一直只称为“五人小组”。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时，才出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名词。

〔2〕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

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3〕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曾任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斯大林生前吹捧斯大林是自己的“生身父亲”，斯大林去世后发布秘密报告，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全盘否定斯大林，并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

斯大林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三十年，是公认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他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来说，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指导帮助了中国、朝鲜、越南、东欧等多个国家的革命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就等于取得政权，就等于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修正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详见由毛泽东同志主持编写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4〕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指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

毛主席早就觉察到吴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问彭真同志，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同志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这件事直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以前，彭真同志对康生等同志都没有说过。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指名攻击毛主席。他还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还用“错误人人有份”的口号来打击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

两天后，陆定一同志也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大反斯大林。

十一月十日

上海市委根据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加紧推备了批判吴晗的文章。《文汇报》于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指出，《海瑞罢官》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毒草。

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都转载了姚文。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各报刊，在十八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彭真同志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姚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同志曾两次询问《文汇报》负责同志，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上海市委因北京各报都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姚文印成单行本。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二十九日，才复电同意。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有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同志参加。彭真同志一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同志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狂妄地露骨地反对毛主席。

十一月二十九日

《文汇报》发表一个版的读者来信，要求开展《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

《解放军报》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转载姚文。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十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按照彭真同志的意见，只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且强调“即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没有表示支持姚文元同志文章。按语的最后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这是周恩来同志加的。

十二月二日

《光明日报》转载姚文，比《北京日报》迟了三天。这是根据姚溱同志转达的彭真同志的意见，说不能同时转载，以免震动太大。

十二月六日

《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报道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登载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按发表先后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登在前面。彭真同志对此极为不满。

十二月八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评了以翦伯赞、吴晗为代表的反动的历史观，但没有指名。

十二月十二日

《北京日报》、《前线》发表邓拓的文章，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沦”》，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篇文章是在彭真同志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同志亲自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

十二月十四日

彭真同志在国际饭店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时，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直接向吴晗示意，给他撑腰，要他坚持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

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同志谈话中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同志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掩盖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

十二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要求单独同毛主席谈话。谈话后，彭真同志故意造谣，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造谣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彭真同志造的这个谣，在许多场合散布过。

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上海市委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情况，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同志未置可否。他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彭真同志讲了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说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彭真同志批评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篇，应当把《北京日报》的按语放头一篇。彭真同志还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

《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篇文章是假检讨，真反攻。他为了辩解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提出了《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一文的基础上写的，而《论海瑞》是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这就自己暴露了自己的要害。《北京日报》急忙发表，却不加按语，实际上是对吴晗的支持。这是彭真同志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还要《人民日报》转载。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篇文章关于“清官”问题的观点是很错误的。

十二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转载了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这个按语没有一句话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实质。这是彭真同志决定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彭真同志召集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同志三十多人参加的会议。首先由胡绳同志传达毛主席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他在传达时，有意隐瞒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康生同志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彭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彭真同志讲话强调要所谓“放”，说扯得越宽越好。他批评《解放军报》的按语中指出吴晗《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妨碍了放”。他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他还攻击上海，说他们只批评《海瑞罢官》，而对《海瑞上疏》不作检讨。实际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已经批评到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的创作，是周扬同志亲自向上海京剧院布置的。

陆定一同志在会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他还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他还在其他场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陆定一同志的基本观点，同彭真同志是一致的。

一月六日

上海市委发出《关于讨论〈海瑞官罢〉问题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场大辩论，加强领导。八日，召集全市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要求发动全党、工农兵群众参加讨论，从大辩论中提高认识，培养队伍。

一月八日

姚溱同志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动态》八十八期刊登的庆云〔即关锋〕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送给彭真同志，为彭真同志整关锋同志提供材料。

一月九日

彭真同志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故意隐瞒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部分。

一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刊登思彤〔即王若水〕的文章，题为《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这篇文章提到要害是罢官，提到庐山会议。这篇文章发表几天以后，许立群同志责问，为什么要讲庐山会议和要害问题？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

关锋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写成。都送给了中宣部，一直被他们压着。

一月十七日

许立群同志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编辑部的同志开会。他在会上说，根据彭真同志的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他强调要“放”，把“放”同讲要害问题对立起来。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要同时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

在这个会上，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的同志说，根据市委的意见，他们不打算再发表批评吴晗的文章，只准备将来转载带结论性的文章。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

戚本禹同志打电话问许立群同志，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立群同志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关锋、戚本禹同志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送给彭真同志审查，彭真同志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一月三十一日

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马上把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送给他。许立群同志立即送去了。

二月二日

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开始进行座谈。

二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

会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

一种以彭真同志为代表，他们大肆攻击关锋等左派同志。彭真同志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他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彭真同志还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和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同志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同志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象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同志在会上又大反斯大林一通。

另一种意见以康生同志为代表，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批判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针对吴晗，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来谈。康生同志批评许立群同志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

会后，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起草“汇报提纲”。

二月四日

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根据彭真同志自己的意见，在钓鱼台关起门来制造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许进去，谁也不让知道，连对同住在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吴冷西两位同志也严密封锁，不透露一点消息。

二月五日

政治局常委开会。临开会前，彭真同志把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送给常委。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在会上，叫不是“五人小组”成员的许立群同志口头汇报情况，彭真同志插了一些话，没有读“提纲”，没有提出“提纲”中的关键问题请常委讨论，也没有说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给全党。

二月八日

彭真等同志向毛主席汇报。彭真同志采取了欺骗常委的同样手法，叫许立群同志向毛主席汇报，然后彭真同志说了一些话。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的意见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毛主席一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这次，毛主席又当面问了彭真同志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彭真同志事后却故意歪曲，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同志否定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他认为这些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他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毛主席明确地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这里也就戳穿了彭真同志假造说毛主席主张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当彭真同志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的时候，毛主席立刻反驳，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同志攻击关锋同志的杂文时，毛主席明确地顶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毛主席是不赞成这个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但是，彭真同志根本不理睬毛主席的指示，滥用职权，搞了一个中央的批语，把

这个“提纲’变成了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给毛主席审阅，而彭真同志竟然用欺骗手法，打电话告诉常委同志，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彭真同志对上海市委的同志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上海市委的同志提出：“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还需要研究。十三日，彭真同志指定胡绳同志同张春桥同志谈话。胡绳同志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并且硬说是毛主席的意见。胡绳同志说，这是彭真同志要他这样讲的。

二月十八日

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同志传达“汇报提纲”。他们根本不传达毛主席反对他们收集左派材料、反对对左派进行“整风”、反对他们要仓促做政治结论的指示，讲了一套同毛主席指示完全对立的错误意见。他们继续包庇吴晗，不准讲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不难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他们对抗毛主席的保护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继续打击左派，把锋芒针对着左派。

传达后分组讨论，邓拓被指定为第一小组的召集人。

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听传达的同志正在讨论的时候，彭真同志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到三线参观去了。许立群同志在临走前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三月一日

在许立群同志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中，吹嘘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并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月二日

《红旗》发表尹达同志的文章，题为《必须把文学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

北京市委叫吴晗当了四清工作队员，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怕暴露吴晗，化名为“老李”。

三月十一日

许立群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同志请示“学阀”是否有所指，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打电话，就说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在讲这两点的时候，彭真同志又怒气冲冲地说，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

三月十二日

《光明日报》发表穆欣同志的文章，题目是《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又四个月。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讲话中指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三月二十五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题目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同康生同志谈了两次话，然后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了一次话，批评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提出，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对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订电话的问题，毛主席要彭真同志向上海市委道歉。

三月三十日

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报中央和毛主席审批。

三月三十一日

康生同志向周恩来同志和彭真同志详细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同志说，他没有包庇吴晗，只是主张“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一下。他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

四月一日

彭真同志在深夜向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同志打了两次电话，不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向上海市委道歉，而是编造一套谎言，抵赖和掩饰自己的错误，推卸责任。

四月二日

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

彭真同志向毛主席作了简单空洞的表示，没有任何具体内容，只说“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错误和缺点”。他强调所谓“这一方面”，就是说，他在“这一方面”以外的各方面都是正确的。

《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威本禹同志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三日

总政治部刘志坚同志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于三月三十一日，代中央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起草了一个批语。这个批语送给彭真同志后，刘志坚同志感到太一般化，于四月三日又代中央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重要性，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方向等重要内容。新的批语于四月四日送给彭真同志，被他压下了，没有采用。

四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开北京币委常委会，掩饰自己的错误，继续包庇邓拓，布置对抗中央。

四月五日

彭真同志召集十几个人开会，他在会上说：他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他说，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他还说，他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出几个吴晗来，结果是幻想。他还提出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又说，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同志的文章，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也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七日

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在全国创作会议上作报告，在中央尚未正式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前，全面地剽窃了《纪要》的内容，并且作了严重的歪曲，为所谓三十年代的错误的文艺路线辩护。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然后，彭真同志作了几句形式主义的表态，夸耀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实际上却继续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康生同志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同志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同志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日

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注：中央的第一次批语已经撤销，另换了一个新的批语〕。

四月十日到十五日

彭真同志连续召集北京市委常委开会，匆匆忙忙地要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所谓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用假积极来掩护他们包庇坏人的错误。

彭真同志背着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给北京市委的同志传阅，这是违背党的纪律的。

四月十六日

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同志的错误，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

四月十六日

在彭真同志直接指挥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语。这个毫无自我批评、别有用心的按语，内容和分寸，都是彭真同志具体规定，并且由他最后定稿，下令在十六日见报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当天广播了这个按语。当晚新华总社通知撤销。

四月十八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四月十九日

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

〔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

〔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四月二十四日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上通过了中央的《通知》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五月四日

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同志的错误问题。

五月九日

《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同志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同志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

《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一批材料：《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五月十日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三家村“》。

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

五月十一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五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林杰同志的文章：《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五月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的决定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

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作法是正确的，哪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的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

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 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对四位外国专家的大字报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林彪、总理、陈毅、陶铸、伯达〔1〕五同志：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2〕，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注释

〔1〕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总理，指周恩来。陈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陶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伯达，即陈伯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2〕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调查组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抄录的阳早等四位美国专家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

美国：阳早、史克、寒春、汤反帝

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待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

五无：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

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思想，是修正主义思想，这是剥削阶级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呢？

一、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

二、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三、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

四、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待遇。我们决心要成为真正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

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绝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因此我们要求：

一、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

二、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

三、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

四、允许并鼓励我们密切地结合工农群众。

五、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六、我们的孩子和中国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

七、生活待遇和同级的工作人员一样。

八、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驻外机关也要革命化*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上的批语

退陈毅〔1〕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2〕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注释

〔1〕陈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

〔2〕指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上登载的一位奥地利人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与这期简报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共青团中央机关文革筹委会、临时书记处九月八日印发的《一坦桑尼亚群众来信对我外事活动中的资产阶级思

想作风提出尖锐批评》的材料，批评我驻坦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毛泽东的批语写在第九号简报上。奥地利来信全文：

亲爱的同志们：

读到关于红卫兵支持你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为的报导等，我们非常赞赏。以你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智慧为基础的这一历史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致力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但是我们认为有些更必要提醒你们注意，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在维也纳的商务代表的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极不相称的。从他们衣着看来，很难〔即使不说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同蒋介石走狗区别开来。精制的白绸衬衫和高价西服同先进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是很不相称的。这些代表不仅占有一辆，而且是两辆“列尔来得——奔驰”牌汽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标志〕难道具有必要吗？由于这一明显对比而引起了维也纳人的窃窃私语和嘲讽，使我们听了很痛苦。这样的资产阶级行为不仅损害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且对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我们尊敬地并且迫切地要求你们把这种事到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致以同志的敬礼

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维也纳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一〕十月二十四日的讲话

你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看了李雪峰〔1〕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搞串连，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害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

伍修权〔2〕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你们思想搞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3〕，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

〔刘澜涛〔4〕：红卫兵到处抢档案，查我们的历史问题，搞得大过火了。〕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澜涛：回去看看再说。〕

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

〔问李井泉〔5〕〕：你们四川那个廖志高〔6〕现在怎么样啊？

〔李井泉：开始不大通，全会后一段时间比较好了，从历史上看，他还是一贯正确的。〕

什么一贯正确？群众起来后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但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

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7〕。

依我看，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8〕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9〕，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问李先念〔10〕〕你们今天会开得怎样？

〔李先念：财经学院说，他们明天要开声讨会。我要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明天我要出国。〕

你要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

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11〕。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12〕不成熟，在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只是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陶铸：大权旁落。〕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可他们不但不自觉，反而和我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13〕。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议就好了，可是他〔刘少奇〕偏要自行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就是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14〕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他们要办的事情我马上答应，后来，四个人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是不来。武昌会议〔15〕我不满意，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16〕，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17〕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皖南事变、百团大战〕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分一线、二线后，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

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18〕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

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独秀、王明、李立三没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

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其涵〔19〕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还在嘛！洛甫〔20〕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固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

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如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去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21〕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

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

〔康生说：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二〕十月二十五日的插话

邓小平〔虽然〕耳朵聋，〔但〕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当头的占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真正四类干部〔22〕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

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23〕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三〕十月二十五日的讲话

讲几句话，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就是搞一、二线。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作了改变，这是一件事。以前，我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许多事让别人去搞，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有些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所以，我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他们。

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

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大家同意了。再嘛是过于信任别人了。这件事引起警惕，还是在制定二十三条〔24〕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几件事，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

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说过决定〔25〕通过了不一定能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现在经过两个月了，有了经验，好一点了。这次会议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大家发言都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经中央同志讲话，交流经验，就比较顺了，思想就通了一些。运动只搞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

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开始搞民主革命，谁也不知道怎么个革法，斗争怎么斗争法，以后才摸出一些经验。路也是一步一步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总结经验，搞了二十八年嘛。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嘛，所以就不能要求同志们都就那么理解。去年批判吴晗的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是个别抓，抓不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一、二、三、四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五•一六〕“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引起注意，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赶快总结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为什么两个月之后又开这个会？就是总结经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以后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

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召开十几天会，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以为所有都能讲清楚。有人说，“原则通了，碰到具体问题处理不好。”原来我想不通，原则问题搞通了，具体问题还不好处理？现在看来还是有点道理，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作好。上次开会回去，有些地方没有来得及很好开会，十个书记有七、八个接待红卫兵，一冲就冲乱了，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也没有准备回答问题，还以为几十分钟讲一讲，表示欢迎就可以了。人家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被动了。这个被动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所以我对这次会议信心增强了。不知你们怎么样？如果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护现状，让一派红卫兵对立，拉另一派红卫兵保驾，就搞不好。我看会改变，情况会好转。

当然不能过多地要求中央局、省、地、县广大干部全部都那么豁然贯通。不一定，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但是我相信多数讲得通的。

上面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讲历史，讲十七年历史，一线二线不统一，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第二件事，五个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点起来的，时间很仓促。与二十八年民主革命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来，时间是很短的，只有五个月。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不通！你们过去只搞工业、农业、交通，就是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你们外交部也一样，军委也一样。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要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

这次会议发的简报不少，我几乎全部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不好过，你们着急，我也着急，不能怪同志们，因为时间太短。有的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糊里糊涂犯了错误，可以原谅，也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时间太短，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我看十七天会议以后会好一些。

注释

〔1〕李雪峰，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2〕伍修权，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3〕江渭清，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刘少奇视察江苏，问江渭清对王光美向参加省委四届扩大会议的同志所作的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有什么看法？江渭清说：“从江苏的实际出发,符合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刘少奇说：“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

江渭清说：“不盲目执行。”第二天，两人就这个问题再次发生“顶撞”，刘少奇发了脾气。

江渭清于九月八日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了封信,报告了江苏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检讨了省委办公厅通知要各地市、县委学习江渭清的一篇讲话,是个严重的错误,并承担了自己的领导责任。九月三十日,刘少奇给江渭清去信批评江渭清“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指出：“你们必须重新了解本省情况,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才能进行当前的革命斗争。”十月二十日,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

毛泽东是支持江渭清的，十二月，毛泽东当着江渭清和刘少奇的面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

〔4〕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兼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并担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

〔5〕李井泉，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6〕廖志高，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7〕《阿Q正传》，鲁迅的代表作，其中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一起参加革命，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8〕上次会，指八届十一中全会。

〔9〕一张大字报，指的是聂元梓等人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一个红卫兵，指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

对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一个大串连，指毛泽东主席曾在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一千三百多万。

〔10〕李先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

〔11〕一二线，一九五三年底，中央常委分一线二线，毛泽东为二线，其余常委为一线，刘少奇主持常委会，八大时，中央设立书记处，邓小平任总书记，一九五九年，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分一线二线后，中央日常事务由一线领导处理，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

〔12〕马林科夫，斯大林指定的接班人，斯大林死后，一度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但很快就被赫鲁晓夫篡了权。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五五年二月，改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站部部长。一九五七年六月被撤职。

〔13〕土地会议，一九四七年夏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上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土改方针，错误地实行所谓‘搬石头’的极左做法，提出一套排斥一切干部的做法。

天津讲话，一九四九年春天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

山西合作社，指刘少奇于一九五一年七月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关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一九五一年二月,山西省委决定试办初级合作社，但华北局认为山西在合作社问题上“冒”了，“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不宜推广”，刘少奇在听了华北局报告后，

原则意见与华北局一致，山西省委不同意这种看法,决定进行申述，“认为七届二中全会已经明确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是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之一,我们试办这种初级社,不存在违背《共同纲领》精神的问题。”五月七日,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公开批评了山西省委的做法。他说：“山西省委在农村里边要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苏联叫共耕社〕,这种合作社也是初步的。”“这种合作社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用这一种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存在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七月三日,刘少奇批转山西省委报告,批语比较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感到没有办法了,长治地委第一书记王谦王谦等人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全面介绍了长治地区试办农业初级社的情况，毛主席详细了解了各方面意见后，表示,他不能支持华北局,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十个试办初级社当年的粮食生产和其他经济的发展,都获得了历史上空前的丰收。四十多年后,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也详细谈到这件事情。他说：“少奇同志关于山西省委报告的处

理,是有缺点的。我的处理也是有缺点的。”针对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批评,具体分析了当时处理不当和一些提法不妥的问题同时做了深刻的反思。

否定调查研究，一九六四年六月，刘少奇提出：“现在调查研究，按毛主席的办法不行了，现在的办法，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目前，我们这种工作方法，层层听汇报，或者看报表，不行了。这种领导工作、领导革命的方法不行了。我们现在这种靠会议、报表的领导方法，一定要亡国。”

大捧王光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刘少奇派遣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四清”工作组副组长，在刘的直接指示下创立了所谓的“桃园经验”。然后，王光美又在刘的安排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接着刘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报告，传播他们夫妇共同树立的“桃园经验”，以此作为全国“四清”运动的样板。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九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九月一日，“桃园经验”便作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样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绍到全国各级党政机关。

〔14〕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当时都任国务院副总理。

〔15〕武昌会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一线领导提出了严厉批评，批评了高指标、浮夸风、穷过渡、做假等现象，要求将指标调下来，但阻力很大。

〔16〕北京开会，中共中央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二六日至二月二日，在北京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刘少奇主持出议，制定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中心内容是“钢产量达到二千万吨，是必须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的。”

〔17〕项英与皖南事变，项英同志是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实质是最高领导人。项英对于党中央早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便已决定的新四军在执行中央向东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时，始终抱着将信将疑、既执行又打折扣的错误态度，而是总想实施他自己的向南发展的想法。

皖南事变前，毛泽东电令新四军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底前完成北移，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还是有困难不能北渡，请求指示，毛泽东代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等人，严厉批评道：“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项英对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在转移途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在战场上竟然开了七个小时的紧急会议，得不出结论，使新四军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最后决定部队重新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到达茂林后，又擅自行动，一度脱离军部，军长叶挺和副书记饶漱石联名发报给中央，

报告项英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踪不明”。事变后，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凌晨，项英等十余人躲藏在蜜峰洞的山洞，由于携带作为新四军军费的金条，在夜里熟睡时被叛徒刘厚总杀害。一九五二年八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项英在皖南事变前后，对中央指示消极应对，犯了独立王国错误，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负有重要责任。

彭德怀与百团大战，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的彭德怀的准备发动百团大战的《战役预备命令》上报中央军委，出于全面考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一直没有批准，彭德怀这样说：“……未等到军委批准，就提早发起了战斗。”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共作战二千一百余次，歼日伪军五万余人。

〔18〕陆定一，原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错误如下：

“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已查明，严慰冰在一九六〇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间，连续写了几十封匿名信，即后文“大量的材料”：“大量的材料证明，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在严慰冰的卧室内书桌上放着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页底稿和寄给叶群同志的信封，时间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陆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达六年之久，在写的时候，陆定一几乎全都在家。当陆定一被告之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诳说严患有神经偏执症为严开脱。”

“陆定一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骂成‘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

“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陆定一的立场和观点，是同彭真完全一致的，陆定一垄断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打击左派，包庇右派”。

二○○六年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对严案也有提及：“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这件事，我原来一点也不知道。叶群固然很坏，但我觉得严慰冰同志采取这种方式实在不好，有问题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嘛！而且，她反对叶群可又要把这事往别人头上栽，这不是挑拨吗？她在有的匿名信上署名'王光’，信里说'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还把发信地址故意写作'按院胡同’。按院胡同是我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这不是有意让人以为写信人是王光美吗？我原先完全蒙在鼓里，好几年都不知道，一直到破案，才大吃一惊。”

杨尚昆，原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关于杨尚昆的问题，文件定性为：“〔一〕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二〕他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三〕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四〕他还有其他严重错误。”

一九六一年四月，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南下调查研究。毛泽东专列停在长沙车站,一名通信兵在站台上见到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口音开玩笑,而其所说正是毛泽东在车厢和张玉凤说的话。毛泽东立即盘问该通信兵，得知是罗瑞卿布置。而罗瑞卿则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决议要求他在车厢安装窃听

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泽东的指示以便贯彻执行，罗瑞卿并出示了政治局的决议文件。

这样录音不经过毛泽东本人允许，连生活隐私录音都录下来，就是窃听。

〔19〕陈奇涵〔一八九七－一九八一〕，号圣涯，江西省兴国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七大”正式代表。

〔20〕洛甫，指张闻天。

〔21〕李宗仁，〔一八九一年八月十三日－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字德邻，民国时期军事家、爱国将领。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总负责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回国定居。

〔22〕四类干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将干部分成四类，〔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类干部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22〕刘建勋，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在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三天后，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表态支持郑州大学造反学生党言川等“少数派”，并号召“炮打司令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中文系学生王相海等十四位学生贴出了《请问学校领导，对文化

大革命究竟抱什么态度？》的大字报，批评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批学术权威，把郑大运动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样子”。当天夜里，郑州大学党委召开会议准备组织反击。在全校性的反击开始中，王相海等少数学生被戴上“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小右派”、“牛鬼蛇神”等帽子被围攻、批斗，六月六日凌晨，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八月六日，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党言川去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河南和郑州大学文革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二同学也去到北京。三人联名发表《致北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系统地向首都人民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接待站作了汇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刘建勋在北京接见党言川等三位同学，明确地讲：“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在郑州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纪登奎宣读了刘建勋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革命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他们回校后召开的“赴京情况汇报会”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郑大部分同学认为“校文革”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而自动酝酿成立联委会，起来闹革命，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大字报共十条，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党言川等少数派，而且按照十六条精神号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

〔24〕二十三条，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5〕指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斗争要文明些，坚持文斗，不用武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给周恩来同志的一封信和指示

〔一〕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信

恩来〔1〕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做法不好。这种做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二〕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的指示

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要高风格。北京街头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那有那么多的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搞喷气式飞机照相片，登报贴在大街上被外国记者搞走了。现在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水平太低。

八月初，也没这凶嘛，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他们〔2〕将来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

他们认为这样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上的问题摆出来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适。

主要是政治上斗臭。

注释

〔1〕恩来，周恩来，时任国务院总理。

〔2〕他们，指有可能翻案的“走资主义当权派。”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对刘少奇到学校做公开检查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刘少奇信〔１〕上的批语

总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２〕。

注释

〔１〕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说：“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一月七日四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阅信后，写了这个批语。

〔２〕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凌晨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要求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的计划。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对《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央文革小组就这两个报社夺权〔1〕问题的谈话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号造了反，《解放日报》六号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2〕，《人民日报》可转载，电台可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纸，依我说封了好，但报还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搞一场革命，定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种》的社论。我不同意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3〕，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4〕，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

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住那里吃饭，许多事宣传部、文化部都管不了，你〔5〕我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白一九二〇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与各种人，左、中、右都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样干净，我向来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他们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岗位上让群众监督。

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青年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

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是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注释

〔1〕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该报发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文汇报》；一月六日，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在该报发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解放日报》。

〔2〕指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造反组织在《文汇报》发表《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一月九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全文如下：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几个月来所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们在胜利的战歌声中，跨进了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也就是说，一九六七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线崩溃彻底瓦解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的一年。

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在批判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并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我们上海市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阻力，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不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生产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滑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亲身经历的事实越来越多地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了，生产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

可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十分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千方百计地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他们的阴谋手段大致表现如下：

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是真的要“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最

近，更有一小撮反动的家伙在阴谋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对这样一些反动的家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加惩办，决不能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

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我们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我们上海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城市，它在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中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是，最近在很多工厂中出现部分或者大部分的赤卫队员停止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现象，这就直接违反了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顶着这股逆流，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负责精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顶起了全厂的生产，有力地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企图用破坏生产来打击革命的大阴谋。这样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全体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都要向他们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有志气，有决心，有力量，一定能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工人赤卫队的广大的要革命的阶级兄弟们！“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是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方针，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方针。拥护不拥护、执行不执行这个方针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你们受他们煽动而离开生产岗位，究竟是对谁有利呢？你们这样做到底是使谁高兴、使谁心痛呢？我们希望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

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再受骗了，赶快觉悟过来，回到生产岗位上来，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一定会热情地欢迎你们回来，和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搞好生产，我们一定不会责怪你们，因为我们都是阶级亲兄弟，因为你们中绝大部分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人，是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蒙蔽的革命群众。

全市一切革命学生和革命的机关干部们！让我们和广大革命工人紧紧结合在一起，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广泛地开展宣传和斗争，更坚决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新反扑，将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光芒照耀下，展望未来，革命前程灿烂辉煌。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并肩战斗，乘胜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3〕吴冷西，一九五七年六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被夺权后，由唐平铸接任。

〔4〕《人民日报》在大跃进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浮夸和错误的文章，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说：“到了〔一九五八〕五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六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一九五八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5〕指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组长。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论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就夺权问题的一系列指示

〔一〕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

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

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

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二〕谢富治〔1〕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对公安干部传达的指示

接管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了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了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谢富治：我们老一点的同志，对这个运动不理解，从开始就不理解，到现在还不理解，转不过弯来。〕

转不过弯来靠边站，但给饭吃。

〔三〕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对张春桥〔2〕上海来电请示夺权问题的答复

如果权落在右派手里，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

〔四〕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上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人，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二、老干部的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地在这次运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要立新功，要立新劳。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坚决支持左派，之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下，搞好工作。

三、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该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四、夺权前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要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五〕为《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所加的话〔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

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字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应当争取教育的。但是，这些反动组织的一小撮头头，却处心积虑地炮打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暗害革命群众，收买职工，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破坏和抢劫国家财产。他们趁火打劫，妄想变天。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这种反动组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一旦被群众识破，就会立即土崩瓦解，一小撮头头就会被群众揪出来。

注释

〔1〕谢富治，时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张春桥，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1〕上的批语

林彪〔2〕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3〕。请酌处。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4〕，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注释

〔1〕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党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并中央军委报告说，“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廿二日到廿三日，在合肥召开十五万到二十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廿一日十四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

〔2〕林彪，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

〔3〕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军委八条命令》，全文如下：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4〕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并转各级党委、人委、军区、军分区：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我军全体指战员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这一指示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毛泽东：什么时候谢胡〔1〕同志到中国来的呀？

周恩来：去年五月。

毛泽东：去年五月我就向他讲这个问题，究竟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也说，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

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一九六二年，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比如十七年来，就有和高岗、饶漱石〔2〕的斗争，他们一个集团，我们把他整下去了，这是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然后是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3〕这个集团整下去了。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4〕，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卡：受毛泽东同志指示写的？

毛泽东：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决定〔5〕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卫。

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

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比如象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把罗瑞卿的问题处理了，那是前年十二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是去年五月。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六月一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八月。你们有人不是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6〕吗？谁人去见的呀？

卡：什图拉同志。

毛泽东：她在去年五月二十五号写了一张大字报，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到六月一号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这一下大字报就满天飞了！

巴：大字报就发出信号。

毛泽东：也不是我写的，是聂元梓她们七个人写的。红卫兵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两处搞起来的，他们有一篇材料给我看到了。到了八月一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就大搞起来了。八月十八号我接见了红卫兵几十万人。接着八月上旬到八月中旬就开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候我自己才写了一张二百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某些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学生，反对无产阶级，搞白色恐怖。这才揭露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7〕不听。一个《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人民日报》是夺了两次权的，第一次是去年六月一号；第二次是最近一月份。过去我公开声明，我说，《人民日报》我不看。当着《人民日报》总编辑也说，我不看你的报纸。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人，大概可以分这么几部分：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赞成；实际上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赞成的，分到农民手里，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党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当了干部，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甚至更高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中央委员，这么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收容下来的国民党的这些人，其中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了，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人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解放以后他们进了学校，甚至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这些人也不是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等等，顶多有百分之五。那么，七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三千五百万人。他们也分散，分到各个乡村、各个城市、各个街道。如果三千五百万人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军了。

巴：尽管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军队。

毛泽东：他们是灭亡的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万人里顶多有几十万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农村、各学校、各机关。所以，大字报一出来，群众运动一出来，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吓得要死。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也搞得很乱，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

么搞。有人建议保留一个 Teacher，我是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 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你们都进过大学吧？

卡：一个都没有。

毛泽东：马克思是大学生，列宁是大学生，斯大林读了中学，我也是只读了中学。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科、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如果不进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险，这些人将来就是修正主义。搞文学的不能写小说，不能写诗；学哲学的不能写哲学文章，也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学政治的、学法律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没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书。还有学经济的，修正主义分子可多了。但是，现在看来有些希望，斗得厉害。

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从去年，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比较乐观些了。

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毛泽东：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讲。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卡：不搞斗争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毛泽东：就是吆！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原封未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陈丕显〔8〕不是派去的吗？以后选举的。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和他们讲过话呢，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的分化。在去年

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

卡：去过。

毛泽东：“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

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9〕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打倒肖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10〕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肖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但是，有一条真理永远是真理，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

巴：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泽东：虽然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一点缺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

巴：工作上可以犯错误，可以改呀。

毛泽东：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11〕。

注释

〔1〕谢胡，时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巴卢库，时任阿尔巴尼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博，时任阿尔巴尼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什图拉时任阿尔巴尼亚中央委员。

〔2〕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和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相互勾结，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一九五五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将他们开除出党。

〔3〕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揭发和批判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同志的错误，他们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

点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企图向党要权。”实质上这些观点是大错特错的。

〔4〕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了吴晗的《海瑞罢官》。

〔5〕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内容如下：

新华社三日讯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6〕聂元梓，北京大学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7〕指刘少奇，时任国家主席。

〔8〕曹荻秋文革前原任上海市市长，陈丕显原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一月风暴”中被夺权打倒。一九三二年曹荻秋在上海被捕，五年后履行一定手续后被释放，在文革中被定为叛徒。一九三〇年陈丕显被敌人俘虏，与他同时被俘的涂应达审讯后被敌人杀害,而匪军营长却收陈丕显当了义子,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

〔9〕蒯大富，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的“领袖”。

〔10〕杨勇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1〕陈胜、吴广，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接见张春桥姚文元时的谈话纪要

〔一〕

二月至四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见眉目。

上海的工作总的方向是很好的。

上海的工人在安亭事件〔1〕的时候，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两千人吗？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人啦！说明上海的工人发动得比较成功。

〔二〕

你们那个时候学生都不是到了码头吗？现在那些学生是否还在码头上啊？

〔张、姚答：“还在”。〕

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有真结合，现在才是真结合了。

〔三〕

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2〕

〔四〕

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问题也不大，内蒙古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有百分之五十三是革命群众，百分之二十七是部队，百分之二十是机关干部。上海应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3〕胜利了，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要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4〕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单位，连副科长都不要。这种副科长都不要的人，这种人搞不了几天的。〔5〕

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中农占的数量很大。城市里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以至于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只要我们善于领导，他们也是会跟着我们走的。我们要相信大多数。

一个大学生，领导一个市，刚刚毕业，有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学校很复杂，你是一个刚刚毕业或还没有毕业的人，学校情况很复杂。照我看，当一个系主任也不行。系主任总要有一点学问吧！你这个学问还没有学完，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搞个系主任，我们已经培养了一批助教，讲师，原来的领导干部，总要选些人出来。这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恐怕周谷城〔6〕不行了吧！周谷城再教书不行了吧！

〔五〕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国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名称，是一个词，好象校长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

名称不宜改得太多。还有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是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如现在有人不喜欢那个“长”啊，都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有点象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子，王莽皇帝下诏书都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那么下诏书他就要写上，譬如咸阳是陕西一个县，改成祁酉，诏书里就写上“祁酉即咸阳”，把老名称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主要经验是巴黎公社、苏维埃。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咱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改名字了。

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国号问题。是否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来这个问题，紧跟着改。不但出来这个问题，如大小都要改，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

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问题？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入在那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那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7〕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党呢？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里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这是十六条〔8〕所规定的。

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啊！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啊？你们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想几个办法，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仍用“人民公社”，这个办法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不是很孤立吗？现在又不可以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一登，全国都要叫。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上面的问题，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承认不承认的问题。第三个办法，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了。可以早一些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些时候吧！你们怎么样？能不能说得通啊？。

注释

〔1〕安亭事件，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上海市委拒绝承认其合法性，十日，王洪文率领数千人要上北京告状，被市委限令停在上海安亭火车站，于是他们卧轨拦车。张春桥代表中央去处理“安亭事件”，认为“工总司”是“革命行动”，并要求市委“检查错误”。

十一月九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三十厂〔王秀珍〕、三十一厂〔黄金海〕、上海良工阀门厂〔陈阿大〕、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等十七家工厂造反组织组成的“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会议受到冲击。会前他们曾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其组织、上海市长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提供宣传工具”，却得到“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三不”答复。

“工总司”十日率队赴京告状。潘国平率一千人登上去北京的特快列车，王洪文率一千人登上驶往郑州的 69 次特快〔运行中被改为 602 次慢车〕。先后受阻于南京和安亭。当日中午 12 点他们将 14 次特快列车拦阻于安亭站，希望中央解决问题。事件当即令北京高度关注，外国媒体亦广为报道。

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上海副市长李干成十一日到安亭劝说。同时陈伯达发来电报：“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张春桥十一日深夜乘专机抵沪，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允诺回上海解决他们提出的各项要求。十二日下午大部分造反队员回沪。

十三日上午张春桥与工总司会谈前，参加的上海市委常委会再次重申“三不”决定。下午张春桥即在工总司“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并被印成传单全市散发。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获悉消息后迅速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十六日毛泽东说“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可以先斩后奏。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

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2〕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本段时解释到：

照我们的理解，主席说，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十七年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昨天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里面说了这个意思。就是十七年来，在政治上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不是刘、邓路线占了统治地位。这十七年来，我们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不能说十七年来，我们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或者是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不能做这样的估计。对于主席这句话，前半段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是肯定的，那末后面这半段又是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要革命呢？为什么要革命呢？毛主席说，那许多问题好解释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就要革命！毛主席的这句话是辩证法的。他先总结了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说还要革命。为什么要革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专政中间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是资产阶级的，被篡夺了，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那么一小撮人篡夺了，所以说需要革命。〔口号〕有些地方，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彻底改善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口号是个反动的口号！为什么要彻底改善？就是，实际上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本主义专政。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改善嘛。正确的说法，只能够是

部分的改善，这是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个问题。为什么说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呢？事实是如此。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为什么要自己发动这一场革命，是因为我们国家已经统一了十七年了，这十七年比较稳定，大家都很满意，觉得中国至少一百多年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很不稳定；那么现在呢？经过民主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国家稳定了，统一了。凡是事情总是这样，统一、稳定有它好的方面，但是也带来了问题。就是在这种稳定中间，实际上也不稳定。而且有一部分政权、党权、财权、文权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毛主席发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能够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能够使得我们的祖国——社会主义祖国不变颜色。我们感觉到，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思想，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譬如说，现在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从这一句话，主席常常是这样，他把许多复杂的事物，最后归结成一句话，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能够启发我们去想各种问题。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当前夺权斗争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句话，我们就看不到发动这一切革命的必要性，也看不到这场斗争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很好地懂得了主席这一句话的意思，那么，我们就能正确地按照主席的思想来办事。〔口号〕这是关于夺权里边，我想传达的第一点。

〔3〕一月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造反派夺取当地党政机关权力的浪潮席卷中国各地。一月四日，上海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的权，五日，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在一月六日又联合召开了“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大会”，八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十日，黑龙江造反派组成省级机关接管委员会，夺了省级机关的权。一月十四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已于十二日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该通告于同月二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刊出，该报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一月十六日，哈尔滨军工学院等二十三个单位的“红色造反者”在哈军工集会，宣布成立“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发表夺取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公告”。一月十七日，湖南长沙市造反派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一月十八日，全国财贸系统造反派举行“反对经济主义”誓师大会；新华社于二十一日以“把财贸系统的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为题加以报道。同日，聂元梓部署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连夜派出大批人员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及北京市人委各部夺权。一月十九日，文化部被造反派夺权。同日，首都出版系统造反派向全国出版系统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书，其中第一条就是“立即夺取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夺取每一个出版阵地”；新华社二十一日全文播发此呼吁书，《人民日报》二十二日转载时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我们掌”。一月二十一日，广东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及广州市委、市人委的权，次日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夺权通告。同日，徐州市两大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总部”和“八一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宣布接管市委、市人委和公检法一切权力。一月三十一日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篇社论说：“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

〔4〕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本段时解释到：

在这次谈话时候毛主席反复的讲了“打倒一切”和“怀疑一切”这个问题。“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这个口号相当的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我们革命派内部有了影响，这种思想不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思想，但是影响了我们，影响了我们一部分同志，因为在这个，这个我们理解呢，说是文化大革命里面看到的那些人哪，那种顽固劲哪，就使人发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到处都是坏人，所以因此呢，当别人宣传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时候，自己也觉得有道理，觉得有道理，其实啊，同志们，这种口号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根本不能成立，你说打倒一切嘛，那提出这口号的人，他自己就不打倒他自己，他怎么打倒一切呢，他才不打倒一切呢，他还是打倒一部分，说怀疑一切，是他真的怀疑一切吗？他也不怀疑他自己，他不怀疑他，这个口号对不对，那么应该首先怀疑怀疑我这个“怀疑一切”，对不对啊，他也不怀疑的，实际上他也是怀疑一部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事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只能是这个阶级，两个阶级对垒，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那能那么打倒一切呀，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呀，那是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这一种口号啊，今天阻碍着我们的大联合，特别阻碍我们的三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坐下来真正解决，三结合是搞不起来的，那么你看到的这个人也要怀疑，那个人

也要怀疑，这个人要打倒，那个人也要打倒，那你还有什么三结合呢？这些打倒一切的人，怀疑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被人家怀疑，被人家打倒，一定是走到反面，这一点毛主席说得非常确切，他说：“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

〔5〕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本段时解释到：

就是中央气象局有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啊，到我们这里讲。说我们一到上海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一和哪一个造反派谈话，我们问，你们那个造反派怎么样啊，他说我们那个造反派很好，一个科长都没有，〔笑声〕就表示他这个组织最纯洁啦，我们一说这些话主席就说啦，说：“我们这还有一个单位呀连付科长也不要”。那个单位三十多个付科长，也不是个很大的单位，一个都不要，明明的有很多同志是很好的，也不要，这个都不作阶级分析呀，而是根据职务，从担任的职务，那一级职务以上，这那里是阶级呢？阶级，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当权派有无产阶级当权派，有资产阶级当权派，科长，有赞成毛主席，拥护毛主席跟着毛主席走的，也有反对毛主席的，应该是这样分嘛。

〔6〕周谷城，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原任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

〔7〕一贯道，一个会道门组织，一九五〇年被取缔。

〔8〕十六条，指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批评“二月逆流”〔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2〕、薄一波〔3〕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注释

〔1〕**二月逆流**是指在1967年1月19日至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因陈、叶、徐、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谭、二李为当时的副总理，因此又被称为"三老四帅"或"四帅三副")，对"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坚决的斗争，当时被诬称为"**二月逆流**"，实际上，它是一场正义凛然的"**二月抗争**"。

〔2〕余秋里，时任江苏省委书记

〔3〕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一九三六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的薄一波等人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调查报告这样写道：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张良云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论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月、十月〕

〔一〕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论革命的“三结合”〔1〕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二〕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关于“三相信、三依靠”的指示〔2〕

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

一、依靠群众。这一条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机关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作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哪一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从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与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

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一条，组织性纪律性强，动作快。如沈阳军区的支左、支工、支农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动作很慢。

三、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三〕一九六七年五一前后—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3〕

一、我们这些干部是经过长期锻炼的，还是要有些人站出来。现在的情况是：站出来就打。我们的事情总是要有人挂帅的。红卫兵能挂帅吗？今天上台，明天就会被打倒，原因是政治上不成熟。现在我们要做很多工作，使那些主要干部站出来，哪怕是黎元洪〔4〕式的人物也是好的，出来两年也好。红卫兵不行，没有经过锻炼，这样大的事情，信不过他们。

二、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是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让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委书记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三、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要爱护干部，要支持革命领导干部出来，革命小将现在叫他们挂帅还不行，有个培养的过程，但小将是可爱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作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

全国应该有更多的第一把手站出来。

〔四〕〔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5〕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五〕〔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6〕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干”，用群众性方法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起年三月七日《论革命的“三结合”》一文中所写的两段话〔一九六七年第五期《红旗》杂志社论〕。

〔2〕这是毛泽东在听了“林彪三月二十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后的指示。

〔3〕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的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4〕黎元洪，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

〔5〕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发出了《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毛泽东起草了本段。

〔6〕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会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谈话节录。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

〔一九六七年三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

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是义和团侵略了帝国主义了吗？*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1〕一文所加的一段话

究竟是中国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

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注释

〔1〕戚本禹，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他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第五次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这是去年看了《清宫秘史》影片以后写的，最近改了一下，送呈主席一阅。目前，可否联系这部电影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请主席考虑。”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定的中央军委命令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作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过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节录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本质，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1〕原青海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件作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注释

〔1〕赵永夫，制造了一九六七年“二·二三”惨案。当时，赵永夫是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将青海省革命造反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于二月二十三日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的严重事件。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谈话的主要部分

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1〕上曾经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负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已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2〕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3〕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讯号。这个信号一出来后，遭到了彭真等人坚决反对。因为敌人是特别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所以我在中央常委会主持制定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个通知中央已明显的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

不通的，李井泉〔4〕就不通，刘澜涛〔5〕就不通。伯达同志找过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自己。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一九六六年十、十一、十二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挑开了党内的矛盾。由对这一路线的批判，启发了许多革命派的革命激情。这里边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这是符合革命发展规律的。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骨干，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全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工农兵是具体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是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好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

“一月风暴”〔6〕就是上海工人搞起来的，随后全国工农兵起来了。广大工农一起来，才较彻底地冲垮了资产阶级那一套，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不得不退居到从属的地位，不是吗？工人一起来就冲垮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为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7〕以后，可算做第四

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的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北京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打的比较少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看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还得改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现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的改造世界现，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现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现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

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

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做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但既然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做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的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从自己话里说出去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个培养问题，不能在他们犯有某种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样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乱用。“革”与“保”全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对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远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只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顽固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做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以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的反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注释

〔1〕七千人大会，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七千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十二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不少与会者认为会议对反对官僚主义和发扬党内民主重视不够，要求给他们讲话的机会。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在一月三十日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和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会议遂开成了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与会者对各省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了批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作了自我批评。

〔2〕江青，四人帮之一。

〔3〕红色城市，指北京。

〔4〕李井泉，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5〕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兼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并担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

〔6〕一月风暴，又称“一月革命”。1967 年 1 月初，上海《文汇报》被造反派夺权，揭开了所谓"一月风暴"的序幕。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于 1 月 8 日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取代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1 月 8 日，毛泽东高度赞扬《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毛泽东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

"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制造了矛头直接指向上海市委的中断铁路运输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1967 年 1 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到上海策划夺权。1 月 4 日，夺了《文汇报》的权，5 日，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6 日，张春桥、姚文元等借全市各造反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市府领导人。会后，市委、市府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权力落到张、姚等人手里。毛泽东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表示支持。8 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

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2 月 5 日，张、姚等经过策划，成立了所谓"上海人民公社"，23 日，改称为"革命委员会"。1967 年 1 月份上海的夺权，被张、姚等人称为"一月革命"。

从此，在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之风，大动乱的局面更加严重。

〔7〕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五月十一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定的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论述

〔一〕〔1〕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二〕〔2〕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

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注释

〔1〕本段是毛泽东同志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修改的文字。《伟大的历史文件》是《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公开发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而写的编辑部文章。

〔2〕本段是毛泽东同志审定的《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文字。《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发表的文章。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在听了氢弹会议汇报后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听取氢弹工作汇报后的两次谈话

〔一〕〔一九六七午六月十八日〕

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就不要失掉原则。昨天氢弹公报〔1〕，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

〔二〕〔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

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两年零八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了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注释

〔1〕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全文如下：

毛泽东主席早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就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凯歌声中，我们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毛主席的这一英明预言和伟大号召已经实现了，在两年八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五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

这次氢弹试验的成功，是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又一个飞跃，标志着我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人民为此而自豪，全世界革命人民也将为此而感到骄傲。我们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欢呼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辉煌成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从事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和一切有关人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他们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反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修正主义路线，抓革命，促生产，群策群力，大力协同，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各种困难，闯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保证了这次氢弹试验的圆满成功。

毛主席说：“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的革命职工和科学技术人员，遵循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加速发展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和实现我国国防现代化，建立新的更加伟大的功勋。

中国有了原子弹，有了导弹，现在又有了氢弹，这就大长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威风。中国氢弹试验的成功，进一步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核垄断地位，沉重地打击了它们的核讹诈政策。中国氢弹试验的成功，对于正在英勇地进行抗美救国战争的越南人民，对于正在反抗美英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以色列侵略的阿拉伯人民，对于全世界一切革命的人民，都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核武器。我们再一次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说的话，从来是算数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一道，共同努力，坚持斗争，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而奋斗。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谈话纪要

〔一〕关于形势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大，都参加了辩论。

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二〕关于大联合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三〕关于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

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1〕，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四〕关于向坏人专政的问题

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五〕关于干部问题

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六〕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

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七〕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

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斑，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七〕关于红卫兵和造反派

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功勋。

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注释

〔1〕张闻天（1900 年 8 月 30 日 - 1976 年 7 月 1 日），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曾长期使用化名洛甫。江苏南汇县（今上海浦东新区）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前往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是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1930 年回国，1933 年 1 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遵义会议中被推举为党内最高负责人，和毛泽东、周恩来形成

名为“三人团”的领导核心，主要著作编为《张闻天选集》。1937 年 7 月 27 日，毛泽东、张闻天强调红军改编原则。1976 年 7 月 1 日病逝。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接见刚果〔布〕〔1〕总理努马扎莱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

努马：我看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

毛泽东：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

努马：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

毛泽东：有那么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教育。

努马：你们的干部很谦虚。

毛泽东：非谦虚不可，否则群众斗他们。

努马：你们的干部与我们的干部有很大的区别。

毛泽东：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官大了，薪水多了，坐小汽车了。大官还得有人做，大官没人做还得了！薪水多一点，房子好一点，坐汽车也可以，但不要摆架子，和工农群众平等相待。不要动不动就训人、骂人。有的大队书记，薪水不多，房子不好，没坐小汽车，官也不大，就是官架子不小。运动一开始，结果把他们吓了一跳。

努马：外国讲中国很乱，我们怎么没看到？

毛泽东：乱一点，你们可以到处走走，乱了以后就不乱了。不闹够就不行。这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再乱一年。

努马：什么叫越乱越好呢？

毛泽东：不乱胜负不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除安徽省外都好。到中国得一条经验。湖南煤矿动刀动枪了。生产几万吨下降到几吨，现在已产二万吨。

努马：这样的矛盾，怎么解决得这么好呢？

毛泽东：后台揪出来了，群众打够了，这时中央讲几句话就行了。有人吹中国怎么好，不要听那一套，非洲人架子小，所以我们希望你们来。欧洲、亚洲就不行。我只要求你〔指干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

努马：我们也开始反官架子。

毛泽东：我不建议你们也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建军四十周年，建国十八年，打了二十二年，拥有打了几十年仗的解放军，所以搞文化大革命。

努马：我们不搞文化大革命，但我们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世界意义。

毛泽东：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改变国家部分机构，包括军队。恩克鲁玛〔2〕那次来，没有料到推翻他政权的就是他的军队。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

努马：我们家里还有人，但我尽量早点回去。

注释

〔1〕一八八四年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将刚果河以东地区划为比属殖民地，即今扎伊尔，以西地区划为法属殖民地，即现在的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五日，刚果获得完全独立，定国名为刚果共和国。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刚两国建交。

〔2〕加纳政治家，主张非洲统一和完全独立。加纳独立运动领袖， 加纳共和国首任总理和总统（1960 年—1966 年）。1909 年 9 月 21 日出生，1972

年 4 月 27 日卒于布加勒斯特。1935 年赴美留学，担任美（国）加（拿大）非洲留学生联合会主席。1945 年离美赴英从事法律研究，出任西非学生联合会副主席。他参加了 1945 年第五届泛非大会。后被选为泛非大会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同时，他在伦敦建立西非国民大会秘书处，任秘书长，主持出版<新非洲月刊>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谈话

今天还是谈九大和整党问题。

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可否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

各地对整党问题，有些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

不少地方的意见还没有反映上来，因为那里还乱着。

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

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

过去，一是听话〔做驯服工具〕，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一个支部书记说了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同

大家研究，不商量，不向大家征求意见。支部作决议是要征求党员意见的，一次不够，再征求，要让党员讲意见，征求一次不够再征求。但是过去有很多地方不是这样，是个死党，一塘死水。

过去青年人入团可困难啦，比入党更困难。党团组织被一些人把持着。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支部书记就象个皇帝。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1〕就是这样，他把持全大队的党、政、财大权，搞贪污，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只有沙石峪是这样？我就不信。

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2〕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有些人二三十岁，年岁不大，暮气却很大，到处住休养所，小病大养，无病也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一冲，病没有了，坐喷气式飞机，反而治好了他的病。现在到医院去的很少了，起了很大的变化。才不要都听医生的话，我多少年没量血压了，前几天发烧三十八度五，医生要听心脏，我不让听，吃两片药就好了。当然，有的人是真有病，如心脏病，要治。

我把李大夫放下去支工，可有点意思。他们到北京针织厂。去的时候我就交代了几条，一是先做调查研究，当群众的小学生；二是不轻易表态；三是推动工人群众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实行大联合。跑到一个地方就哇刺、哇刺干什么？那个厂有两派，斗得很厉害，开始两派都说他们搞阴谋，但他们顶住了，一直做调查研究。后来我说了几句话，就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救了他们，否则，人家要赶他们走。现在两派联合起来了。那个厂一个派一千二百多人，一派八百多人。八百人的一派说一千二百人的那派保得厉害。两派争位置，结果人多的一派采取高姿态，问题反而解决了，一派六个，一派七个，无派的出二人，共十五个人组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还有一些人去化工厂，这个厂比较复杂、知识分子多，去的人被围攻。人家出了一条标语，我们去的人乱加评论，讲错了话，结果被人家抓住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张本〔3〕这个人，谁知道她历史有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搞出了很多问题，当然一次搞不干净，但搞出了不少。

我赞成康生同志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观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

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

怎样整党，你们拟出几条办法，也是征询意见性质，十一月能够发下去〔6〕，十二月再发一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说要恢复组织生活，他们又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

这样的人都不要，就太多了，但要做检讨。有的人，不想当党员，就算了嘛。

接受新党员，要经过群众议一下。

党纲要修改。我在看联共党史，他们建党，建了几次。也不要象联共的党纲，写得太长。从政治经济学、商品二重性一直到剩余价值，写得很长，烦琐得很。我们党纲不要写得太长，长了看的人就很少。党纲写成一本书，工人怎么看？农民怎么看？横直是废话，会一散，就完了。我们的党纲，就是党章上开头的那个总纲。

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

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做陈独秀、瞿秋白的驯服工具就是不行。八七会议我们反陈独秀时，就没有做陈独秀的驯服工具。

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不行。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就讲了三个前提。如果你是革命的，政治路线正确，人家自然就会服从。打了胜仗以后，战士都高兴，对领导上不讲闲话，打了败仗，闲话就多。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最好，打开锦州的时候，那么多苹果一个没动，这纪律就是建立在为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解放军战士也有个别犯纪律的，不是绝对的。

现在报上都讲好的，内部情况报导困难多，才不要相信。我就不相信天下都黑了。

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经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4〕，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5〕，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两件事：

关于九大，第一批反映材料综合一下，通报下去。

关于整党，整个什么样的党，老党员怎样一分为二，新党员入党，恢复组织生活又不要恢复老样子，这些问题怎么办，搞几条办法出来。

废除级别问题，也要谈一谈。

注释

〔1〕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沙石峪位于中国河北省遵化市东南部，张贵顺，一九一四年生于遵化娘娘庄，后落户到沙石峪。一九四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沙石峪村党支部书记近二十年。

〔2〕陈老总，指陈毅。陈毅(1901 年 8 月 26 日-1972 年 1 月 6 日)，男，名世俊，字仲弘，四川乐至人，中国共产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新四军老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十大元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共中

央军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中共第七、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革期间，与四人帮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1968 年，下放石家庄。1972 年去世。

1977 年其遗作专集《陈毅诗词选集》出版。

〔3〕张本，原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主任。

〔3〕十条，指前十条。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4〕后十条，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电文

阮友寿〔1〕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战斗中的越南南方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你们打得好！你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打得走投无路，狼狈不堪，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

你们的胜利又一次表明，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越南人民在伟大领袖胡志明〔2〕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抗美救国战争，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的日子不长了。但是，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他们必然要采取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种种手段，来挽救自己的灭亡。而革命人民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也必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革命人民的前进。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深信，越南人民坚持持久战争，一定能够把美国侵略者从越南赶出去。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兄弟的越南南方人民和全体越南人民可以相信，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在我们两国人民坚强的战斗团结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注释

〔1〕阮友寿，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2〕胡志明，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和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

〔一九六八年二月、三月、八月〕

〔一〕〔一九六八年二月〕〔1〕

大办学习斑。用学习班的方法斗私批修，提高认识，解决问题，狠抓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应该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就是好。应该总结经验，应该解放大批革命干部，干部只要不是三反分子、走资派、投敌叛变分子、特务分子，而是在运动中犯了路线错误认真检查，认识错误就可以三结合。在三结和中应该注意成份，但不能唯成份论，不要把坏人也结合进来。三结合要体现老、中、少，光小娃娃不行。

一般大学的革命委员会，解放军不结合进去，特殊情况下要结合，须经过市革命委员会批准。要警惕坏人，防止破坏。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应该爱护她，尊重她，帮助她，保卫她，维护她的无产阶级权威，严防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不是“三支两军”〔2〕工作的完成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的无产阶级权威。

〔二〕〔一九六八年二月〕〔3〕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三〕〔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4〕

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工人为主体的、有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步骤地进入学校及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清理阶级队伍，促进教育革命，认真搞好斗、批、改，就是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而来的一个革命的创举。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对党内的指示。

〔2〕“三支两军”，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支左”。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即“三支两军”。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向全军各部队提出。“三支两军”是指：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此后，以一月二十三日发布“支左”决议为起点，解放军“三支两军”便逐步在全国各地展开。

〔3〕《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两段话。

〔4〕这是毛泽东对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送审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修改。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1〕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注释

〔1〕美国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Jr.〕，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生于美国亚特兰大，一九五四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毕业后，他在蒙哥马利城任牧师，并开始参加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活动。

一九五六，马丁·路德·金领导蒙哥马利城黑人成功抵制了当地公共汽车歧视黑人的行为。当时全城五万名黑人都拒绝乘坐公共汽车，斗争坚持了三百八十五天，最终使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在交通工具上实施种族隔离为非法。一九五七年，他参与建立了黑人牧师组织——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并担任首任主席。

一九六三年八月，马丁·路德·金组织了美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自由进军”运动，率领二十多万名黑人向首都华盛顿进军，为全美国的黑人争取人权。八月二十八日，他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发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的正义呼声。迫于巨大的压力，美国总统约翰逊于一九六四年签署了民权法案。同年，马丁·路德·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马丁·路德·金在支持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清洁工人罢工斗争中被种族主义分子暗杀，年仅三十九岁。他的遇害引发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黑人抗暴斗争浪潮，席卷全美一百二十五个城市。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一要和工农兵结合

〔一九六八年七、八、九月〕

〔一〕〔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1〕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二〕〔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2〕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三〕〔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3〕

此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送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调查报告，现在本刊发表。我们请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予以注意，对你们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给以调查，陆续送给中央，我们将择要予以发表。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对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

〔四〕〔一九六八年九月八日〕〔4〕

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五〕〔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5〕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的路线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报告的按语，“七·二一指示”，

〔5〕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赤脚医生就是好*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一份调查报告〔1〕的修改和批示

〔一〕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

〔二〕

赤脚医生就是好。

注释

〔1〕一九六八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同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和九月十四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都全文转载，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

“赤脚医生”这个名字，是在农民中自行叫起来的，因为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种水稻的，只能赤脚下水田，所以赤脚就是劳动的意思，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

这篇调查报告最后指出：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道路，可以看到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的一些问题。江镇公社的贫下中农体会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必须搞好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认为：

“〔一〕医学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贫下中农谈起公社里两个同时担任“赤脚医生”的青年：一个后来被保送到嘉定半农半医医专学习〔高中毕业

才能入学〕。这所学校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抓的重点，向学生灌输了大量修正主义毒素。三年下来，这位“赤脚医生”成了白面书生，平时回家跟贫下中农都不大说话了。她不愿回本公社工作，更不愿回本大队当“赤脚医生”了。另一个只念过两年半书，经过三年的斗争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她更加热爱贫下中农，热爱农村医务工作，说：“我药箱里药用少了，比家里米缺了还着急。”在医疗技术上，后者也超过了前者。贫下中农感慨地说：“教育不革命，就算是我伲送去的囡，也要出修正主义！”他们认为，医学教育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把“老三篇”和《实践论》、《矛盾论》作为必修课；要贯彻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学生应该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进行学习。

〔二〕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应是“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毛主席最近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贫下中农认为，“赤脚医生”在农村里滚上二、三年，再进医学院校学习，这个办法好。贫下中农高兴地说：“以后医学院校招生，我伲要把‘赤脚医生’送去，学几年后再回来为我伲服务。”江镇公社在各生产队选拔了一百四十四名不脱产的卫生员，主要由“赤脚医生”带训。带出来以后，“赤脚医生”多了，就可以抽出一部分人去医学院校学习一、二年或二、三年。

〔三〕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贫下中农认为，当前，医学最主要的是普及，也要提高，但必须沿着工农兵所需要的方向去提高。那些为极少数城市老爷太太服务的所谓“提高”，必须彻底批判。贫下中农还认为：“赤脚医生”中除了一部分进入学校学习外，绝大部分都应当坚持扎根农村，可以采用卫生院医生

和“赤脚医生”上下定期对调的办法，加以提高。这样做，既有利于原来的医疗卫生队伍的改造，又有利于在实践中提高‘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的兴起是与当时在全国普遍开展的农村合作医疗密不可分的，赤脚医生是合作医疗的忠实实践者。新中国合作医疗的典型是一个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长阳土家山寨创造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了。覃祥官主动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在大队卫生室当起了记工分、吃农村口粮的“赤脚医生”。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五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看病吃药就不要钱了。覃祥官首创的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毛泽东亲笔批示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该制度在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推广，惠及亿万农民。

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改善中国人民健康水平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中国的平均寿命高于很多收入水准比中国高的国家，人民平均寿命的增长幅度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其他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有感于这样伟大的成就，在一九七八年召开的阿马阿塔会议上，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推崇为世界范围内基层卫生推动计划的模范。此外，中国独特的医疗卫生体系创建，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医疗改革，启发那些改革者们发展适合自己的医疗卫生制度，而不是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制度。

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一日，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来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有钟南山、巴德年、李连达、高润霖、程书

钧、王红阳、刘志红，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有杨雄里和强伯勤，他们由巴德年为代表做了《加快覆盖城乡居民医疗保健制度的建设及早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联合发言：

“我代表长期工作在医药卫生战线上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九位院士委员作联合发言。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卫生事业得到空前发展，许多传染病得到控制，性病被杜绝，人均寿命、婴幼儿死亡率等指标都有了明显改善。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 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世界 22%人口的卫生保健问题。而到了 2000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 191 个国家进行评价时，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排在第 144 位，而卫生公平性竟排在第 188 位，列倒数第 4 位。

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淡忘了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忽略了“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理念。90 年代我国政府向世界宣布的到 2000 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承诺，没有兑现。（但是，2016 年，我们做到了）

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卫生投入列入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科目，姑且不说发达国家用于医药卫生开支均占 GDP 的 10%以上，就连巴西也为 7.9%，印度为 6.1%，赞比亚为 5.8%，中国只为 2.7%。而且，中国政府的卫生投入在整个医药卫生总支出的比例，也逐年减少。

多年来，我国某些部门以“中国国情”为由，宣称中国不会走国外全民医疗的老路，要走一条自己的“改革路”，走的结果是走到了第 188 位，走到了老百姓极不满意、无法承受的地步。”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1〕一文的批语

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注释

〔1〕《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这个材料最初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文革情况汇编》第六二八期上发表。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上山下乡运动〔1〕的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注释

〔1〕“上山下乡”一词，源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拟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提到，“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对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十一日、二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主要讲话

〔一〕〔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开幕式上的讲话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四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1〕，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2〕，湖北的代表陈潭秋〔3〕，湖南的代表何叔衡〔4〕，上海的代表李汉俊〔5〕，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6〕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7〕，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8〕、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9〕。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10〕，恩来同志、伯承同志〔11〕参加了。

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12〕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13〕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14〕呀，什么彭真、薄一波〔15〕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

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就开始了，但我们没有宣布，土改以后才逐步宣布。土地改革彻底？就不那么彻底。有的是和平土改。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

在几年内，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指出了，但是没有经常讲，所以广大干部不知道，所以这一次又来了二次革命，叫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开始的，叫不叫大革命？以后历史学家去做。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名称叫什么都可以。主要是针对上层建筑、机关、学校、工厂，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恐怕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

〔三〕〔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闭幕式上的讲话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16〕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

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

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

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17〕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

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18〕跟王效禹〔19〕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

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20〕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21〕，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

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谢富治〔22〕。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

而拥护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啰。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23〕同志，你那

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

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是起来。自从王、关、戚〔24〕，杨、余、傅〔25〕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

注释

〔1〕董老，指董必武，一九二一年七月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中共九大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2〕王尽美、邓恩铭，一九二一年七月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山东的中共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王尽美一九二五年八日因病逝世。邓恩铭一九二八年底被捕，一九三一年四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3〕陈潭秋，一九二一年七月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九年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一九四二年九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逮捕，一九四三年九月被秘密杀害。

〔4〕何叔衡，一九二一年七月以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转赴上海途中被敌人包围，突围时壮烈牺牲。

〔5〕李汉俊，一九二一年七月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自动脱党。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蒋介石的背叛行为进行了愤怒声讨。七月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十二月被桂系军阀杀害于汉口。

〔6〕陈公博，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代主席等职。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逃往日本，后被押解回国。一九四六年四月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六月被处决。

周佛海，一九二一年七月以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等职。一九四五年九月被国民党军统局软禁，一九四六年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下特赦令，改为无期徒刑。一九四八年二月病死狱中。

张国焘，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危害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

刘仁静，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党。建国后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从事翻译工作。一九八七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同年八月因车祸去世。

〔7〕李达，一九二一年七月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随后脱离党组织。此后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并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治协委员。同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六年八月逝世。

〔8〕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有三十多人。

〔9〕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日在武汉举行，出席代表八十多人。

〔10〕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各地代表共一百四十二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八十四人。

〔11〕恩来，即周恩来。伯承，即刘伯承，出席中共九大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12〕瞿秋白，一九二七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九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一九三四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

李立三，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六七年六月逝世。

王明，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在中共七大上，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做工作，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一月去苏联后，长期进行反对中共中央的活动。一九七四年病死在莫斯科。

〔13〕张闻天（1900 年 8 月 30 日 - 1976 年 7 月 1 日），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曾长期使用化名洛甫。江苏南汇县（今上海浦东新区）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前往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是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1930 年回国，1933 年 1 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遵义会议中被推举为党内最高负责人，和毛泽东、周恩来形成名为“三人团”的领导核心，主要著作编为《张闻天选集》。1937 年 7 月 27 日，毛泽东、张闻天强调红军改编原则。1976 年 7 月 1 日病逝。

王稼祥，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后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后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一九七四年一月逝世。

〔14〕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5〕彭真，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顺直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二九年被捕。一九三五年刑满出狱。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八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建国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等职。

薄一波（1908—2007），原名薄书存，山西蒋村人，1925 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 12 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山西，天津等地从事兵运等工作，3 次入狱，1946 年起，担任军队领导工作。建国后，历任华北局第 1 书记，军区政委，财政部部长，国务院第 3 办公室主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

薄一波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不懈奋斗的一生。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具有独立地开创新局面的胆略和才干。他善于团结各种革命力量与各方面的同志、各种同盟者一起工作。他一贯维护中央领导，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维护团结，遵守纪律，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廉洁奉公。他作风务实，细致勤勉，密切联系群众。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 8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矢志不移、坚忍不拔、荣辱不惊，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尽心竭力，鞠躬尽瘁，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他的卓著功勋和崇高品格，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敬重和爱戴。

〔16〕恩来，即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7〕指林彪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代表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

〔18〕杨得志，时任山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

〔19〕王效禹，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一政委。

〔20〕许世友，时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

〔21〕“八·二七”、“红总”，是当时南京的两个“群众造反组织”。

〔22〕谢富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

〔23〕皮定钧，时任福建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24〕指的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

〔25〕杨，指杨成武，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指余立金，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傅，指傅崇碧，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撤销了他们三人的职务，隔离审查。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关于战备疏散的指示*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针对苏联对我核战争威胁〔1〕下关于战备疏散的指示

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去。

注释

〔1〕“文革”初期，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加剧，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凌晨，苏军边防军六十余人在六辆装甲车的掩护下，从珍宝岛北端侵入，中国边防

部队自卫还击，击毙了苏军边防部队总指挥列昂诺夫上校和杨辛中校，胜利地保卫了珍宝岛。苏联方面亡五十八人，伤九十四人。中国边防部队亡二十九人，伤六十二人，失踪一人。八月十三日，苏联军方经密谋在新疆铁克列提袭击我军三十余人的巡逻队，三十八名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仅一人生还。大规模流血冲突使中苏双方走到了战争边缘。

八月二十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试探美国：如果苏联打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如何反应？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因此准备把此消息透露出去，八月二十八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同时，苏联秘密通知东欧各国：苏将先发制人打击中国核设施。下旬，东欧国家泄露了苏联的意图。八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国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全国很快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

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

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席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八·二八命令”〕，指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越来越疯狂地在我边境进行武装挑衅”，要求全国人民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

八月下旬，美国还侦察到苏联空军在远东的一次停飞待命〔在整个九月份都继续保持着〕，这意味着所有飞机同时进入高度准备状态，往往是一次进攻的信号，至少也是对敌人的严酷警告。

九月十日，苏联塔斯社指责中国从一九六九年六月到八月中旬，蓄意侵犯苏联边境四百八十八次并且挑起武装冲突。

九月十六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单方面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文章还声称“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得知它”，并提到苏联对设在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的可能性。维克托·路易斯的真实身份令人怀疑。据熊向晖回忆，中方注意到此人经常向外界透露苏联重大决策。基辛格则认为“他很可能是苏联政府的一个代言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称他是间谍。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示警。受毛泽东委托研究国际形势的陈毅等四位老帅经过紧急讨论，次日即向中央提交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苏联方面蠢蠢欲动，而打击手段和打击对象都与核武器有关，核战争的阴影顿时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的考虑，美国尼克松总统决定，故意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向苏联本土一百三十四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发出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指令，以牵制苏联。

为了展示抵抗决心，九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九日，在毛泽东指示下，我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两万多吨当量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三百多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九月十一日，在北京机场，苏联会议部长主席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双方会谈似乎异常顺利，但柯西金并没有否认“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传闻，九月二十六日，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信中称，他建议自十月十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九月二十九日，中国建议将边界谈判改到十月二十日开始，十月十四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十月二十日前抵京，针对苏联突然的这种缓和姿态，中央认为，有一种极大的可能是，柯西金来华会谈，与日本特使来栖“珍珠港事变”前赴美一样，只是战争爆发前放的烟雾。且柯并未承诺不对中国发动核打击，苏联战略火箭部队也已做好随时打击中国的部署。由于苏军各师都配备有战术核武器，且受过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训练，确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中国绝大部分核武器和导弹基地、海空军基地和地面部队，占领大片中国领土，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到灭顶之灾。

为保证中国领导人安全，毛泽东主席做了这段指示。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十月二十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

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

其他人员疏散为：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何长工去江西峡江，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六人去湖南汉寿。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阮友寿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站在抗美斗争最前线的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九年来，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光荣的旗帜下，团结一心，不畏强暴，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使它陷入了孤立和困

难的境地。越南南方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为最后击败美帝国主义，完成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基础；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人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战争虽然遭到惨重的失败，但是，它还没有最后失败。尼克松〔1〕政府上台后，更加露骨地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它口头上侈谈“和平”，宣传要从越南南方逐步撤出美军，借以欺骗美国人民，实际上却在加紧强化侵越战争，企图用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即加强伪军和傀儡政权的办法，来挽救它必然失败的命运。事实证明，尼克松政府的侵越政策，和他的前任约翰逊〔2〕政府并无区别，而是一脉相承的。不论他们玩弄什么样的花招，他们是决不会放弃妄图永远霸占南越、分割越南的狂妄野心的。

我们相信，久经锻炼的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领导下，遵循胡志明〔3〕主席的遗训，发扬“决战决胜”的革命精神，坚持持久战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持久制胜，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阴谋诡计，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中越两国人民是亲密的兄弟和战友。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注释

〔1〕尼克松，时任美国总统。

〔2〕约翰逊，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任美国总统。

〔3〕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逝世。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

〔一九七〇年三月、四月、七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改变国家体制的重要批示

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1〕。

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2〕。

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3〕。

注释

〔1〕这是一九七〇年的三月七日，毛泽东为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宪法提出的建议。

〔2〕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林彪的建议上写的批示，林彪建议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3〕一九七〇年七月十八日，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针对有人提出“如果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就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批示。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与黎笋的谈话*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会见越共第一书记黎笋〔1〕时的主要谈话

毛泽东：我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你的？

黎笋：一九六四年。我们看到毛主席身体健康，感到很高兴。目前，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形势比较复杂，也存在一些困难。

毛泽东：困难哪一国都有，苏联也有，美国也有。

黎笋：我们很需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我们中央和政治局知道毛主席给我们的工作提意见的话，一定会非常高兴。

毛泽东：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你们是越做越好。

黎笋：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做工作。我们所以能把工作做好，也是按照毛主席以前对我们讲到的三点去做：第一，不怕，不怕敌人；第二，要各个击破；第三，要长期地打。

毛泽东：对，是持久战。你们要准备打持久战，但是如果打短一些不是更好吗？

究竟谁怕谁呢？是你们越南人、柬埔寨人以及东南亚人怕美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怕你们呢？这是个问题，值得考虑，值得研究。还是大国怕小国，风吹草动他都惊慌失措。一九六四年北部湾事件〔2〕你们是整了他一下，但也不是有意想打美国海军。实际上，你们并不是真的打他，但他们自己紧张起来了，说越南的鱼雷艇来了，开炮就打。后来美国人自己也讲不出来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肯定那是假的，是场虚惊。既然打起来了，那就只好打了。对军火商是有利的。〔从那时起〕美国的总统每天晚上睡觉很少。尼克松〔3〕自己讲，他的主要的精力是对付越南。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人，西哈努克〔4〕亲王，他也不好惹，你惹他，他就要跳出来骂娘。

我们有些大使馆，我看要整顿一下。我们中国一些大使馆有大国沙文主义，尽是把人家的缺点看得多，不顾大局。〔中国〕驻越南的上任大使是谁？

周恩来：朱其文。

毛泽东：朱其文跟你们搞得很僵。事实上朱其文是个国民党，他要跑到外国去。我们不知道他是国民党，你们跟国民党打交道，他为什么不捣你们的乱呀？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看到〔他发回的〕那些电报是不高兴的。

黎笋：我们越南人民心中牢记着毛主席的恩情。在九年的抗法战争中，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我们为什么能坚持打持久战，尤其是在南方坚持长期抗战？我们为什么敢于长期打下去？这主要因为我们依靠了毛主席的著作。

毛泽东：不一定。

黎笋：当然，这是事实。我们还要善于在越南的实际环境中运用。

毛泽东：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创造。怎么能说你们没有创造，没有经验呢？吴庭艳一杀十六万，我是听的报告，不晓得准不准确，但我知道杀死了十几万人就是了。

黎笋：是的，十六万人被杀害了，而且许多人被投入监狱。

毛泽东：我看这就好了。你来杀我，我不可以杀你呀？

黎笋：正是这样。单是在一九六九年我们就打死打伤敌人六十一万人，其中二十三万是美国人。

毛泽东：美国人的人力分配不够，因为他们在全世界铺的太广了。所以，当他们的人被杀死时，他们的心都碎了。死个几万人，对他是一件大事。你们越南人，不论北越、南越，我看死人是要死的。

黎笋：我们现在的打法死伤很少。不然，我们就不能长期坚持下去。

毛泽东：是啊。恐怕老挝困难一点。老挝族在中国有没有啊？

周恩来：有一些。

毛泽东：他们住在哪儿？

周恩来：在云南省，同老挝交界的地方。

毛泽东：在西双版纳吗？

黄永胜：西双版纳也有一些。

周恩来：我们的壮族跟他们非常相像。

毛泽东：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壮族人很能打。过去军阀白崇禧和李宗仁就是靠壮族人。壮族人现在有多少？八百万？

周恩来：现在多了，有一千多万人了。

毛泽东：这是韦国清〔5〕那一族，他自己不承认。我曾问过他，他是哪一族的？是少数民族吧？他说他是汉族。后来他才承认他是壮族人。

周恩来：太平天国的战士都很善战，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就是壮族人。

毛泽东：太平天国也有一部分军队是广西的。

黎笋：越南的侬族也很能打仗，他们和广西的壮族人都属于同一个民族。

毛泽东：东南亚是一个马蜂窝。东南亚的人民一天天在觉醒。有些和平主义者认为无非是公鸡好斗。哪有那么多公鸡呀！现在母鸡也好斗了嘛！

黎笋：不斗就没有出路。

毛泽东：是啊，不斗不行了。你逼得人家没有路走了嘛，欺负人嘛！

黎笋：柬埔寨人和老挝人本来都信佛教，不好斗。现在他们也好斗起来了。

毛泽东：就是呀，你也不要说信佛教的人就不好斗，中国也是信佛教的，辛亥革命打了十七年，后来是内部两派打，这样教育了人民。然后是北伐战争，然后就有红军了，然后日本人侵略中国，日本人投降以后就是蒋介石同我们打，打了不到四年，他就不干了，跑到台湾去了。他现在在联合国里说他代表整个中国。他跟我们几个人的关系可密切了。我跟蒋介石算是见过几次面，国民党在广州开中央全会的时候见过。我是一个国民党，是个跨党分子，我又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又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那个时候，我们几个人都参加了，我们的总理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的代理党代表。林彪同志就不用

说了，他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在黄埔读了九个月。在中国，老一辈的人没有跟他打过交道的很少。

〔二〕

黎笋：最近，尼克松宣称说，在过去一百九十年里美国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意思是他这次也不愿意被越南打败。

毛泽东：没有被打败过？

黎笋：实际上他被打败好几次了。在中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抗法战争中，他给法国人开支百分之八十的军费，结果他仍然被打败了。

毛泽东：就是呀！你刚才讲的第一点是不要怕帝国主义。究竟谁真怕谁？小国，部分小民族存在这个问题。他慢慢试，试几年就理解了。

〔三〕

毛泽东：……那时我还告诉你，如果美国人不到中国边境来，你们不请我们去，我们是不出兵的。

黎笋：我们也这样想。当我们还有能力打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大后方”更稳固一些。在我们越南人民打美国人的时候，中国是我们的“大后方”。因此，我们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命令，即使我们的飞机受到攻击，也不要到中国机场降落。

毛泽东：可以嘛，我们不怕。如果美国空军要来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就让他来嘛。

黎笋：虽然我们下了这样的命令，但我们仍然需要依靠你们的支持。那时，你们派来的几个师在越南同样打美国飞机。

毛泽东：就是嘛。美国人就是怕打，他们没勇气。你们可以谈判，我不是说你们不能谈判，但是你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打上。两次日内瓦会议是谁破坏的？你们和我们都是老老实实遵守〔会议协议〕，但是他们不干嘛！不干更好。

因此，甚至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他发表公开讲话时，也不得不说只要召开国际会议，就必须同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商量。他们现在的领导人好多我不熟悉，不认识。柯西金我认识，并且同他谈过话。西方报纸总是造他们的谣，说他们的领导层怎样不和。我也闹不清楚。听说老百姓对柯西金这位领导人比较感兴趣。

黎笋：我们也听说了。

毛泽东：你们也听说了？我看斯大林又活起来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包括整个世界。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主要是两个大国，现在都说三大国，中国不算。中国的原子武器还刚开始研究，还在研究阶段，这有什么可怕呀？中国人多，因此他们怕中国。但是我们也怕，因为人多要吃饭，要穿衣，那个问题可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也研究节制生育，使人口少一点。

〔四〕

黎笋：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战斗，是因为毛主席讲了，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美国害怕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侵略人家，我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你去几十万海、陆、空军欺负越南人民，中国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哪个法律上有这条规定？

黎笋：美国人说他可以动员一千二百万军队，可是他只能派五十万军队到越南，如果越过了这个界限，他们就害怕了。

周恩来：中国人多他也怕。

毛泽东：人多还有一个不怕，打就打。横竖我跟你没有关系。你占了我的台湾，我没有占领你的长岛〔6〕。

注释

〔1〕黎笋〔一九〇七年四月七日—一九八六年七月十日〕，越南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越南现代史上胡黎政权的不二接班人，胡志明衣钵最忠诚的继承者。在胡志明逝世后，黎笋取得了北越的领导权并随后统一了越南。时任越共第一书记。

〔2〕北部湾事件，也作东京湾事件，一九六四年七月底，美国军舰协同西贡海军执行“34A”行动计划，对越南北方进行海上袭击。八月一日，美第七舰队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为收集情报，侵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海，次日与越南海军交火，击沉越南鱼雷艇。美国政府迅即发表声明，宣称美海军遭到挑衅。四日，美国宣称美军舰只再次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击，即所谓“北部湾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五日出动空军轰炸越南北方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七日，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装力量。这一事件是美国在侵越战争中推行逐步升级战略，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的重要标志。

二○○五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表报告，承认一九六四年八月四日当夜越南人民军当夜对美军“沒有攻击”。北部湾事件是美国为入侵越南捏造的。

〔3〕尼克松，时任美国总统。

〔4〕西哈努克,柬埔寨国王，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开辟的通过柬埔寨到达南越的运输线，日夜抢运军援物资。越南抵抗部队并深入柬境内十余公里，从那里出发，频繁袭击南越军队和美军。美国对西哈努克亲王坚持和平、中立政策，反对美军入侵越南的态度深为不满，不断指使南越当局对柬埔寨实施战争威胁，向西哈努克施加压力，最终于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乘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之机，策动柬政府中的右翼势力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建立了以朗诺为首的政权。政变后，他长期寓居北京，一直受到元首待遇，并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并任主席，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领导民族解放斗争，五月在

北京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任阵线主席和国家元首。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金边解放后回国，担任民柬国家元首。

〔5〕韦国清,壮族，开国上将，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6〕长岛〔LongIsland〕是一位于北美洲大西洋岸的岛屿，行政上属于美国纽约州的一部份。长岛长一百九十公里，宽约二十到三十公里，它从纽约港伸入北大西洋。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所发表的声明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1〕，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2〕，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3〕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注释

〔1〕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原柬埔寨王国首相兼国防大臣、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朗诺和副首相施里玛达在美国的策动下，乘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国外的时机发动政变，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立郑兴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从而使柬埔寨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亲美派朗诺—施里玛达—郑兴集团手中。

〔2〕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在中国、老挝和越南边境地区举行，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国四方领导人各自率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扩大对越南和老挝的侵略战争，在柬埔寨发动政变，重申四方领导人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严正立场，号召印度支那人民团结起来，捍卫民族权利，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使印度支那成为真正符合三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愿望的独立和平地区。

〔3〕尼克松，时任美国总统。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马哈古卜〔1〕的谈话纪要

〔马哈古卜说，在英国还没有完全从苏丹撤走前，美国又进来了。但是由于人民的团结和斗争，英国的星辰已经落下去了，美国的星辰也要落下去。〕

这个世界上怕英国人、怕美国人的很多，这几年慢慢地都不大怕了，并敢于说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话。你们苏丹人民了不起啊！

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统治者是要分开来看待的。我对美国人民是寄予希望的，就是美国的工人以及其他穷苦的人。他们总有一天要站在你们和我们这个战线的。

美国独立时，只有三百多万人口。那时英国有近两千万人口，是全盛时代，可是打了败仗。打了八年啊。还不就是一些比你们现在还要差的武器。你们苏丹有一千四百多万人口。

〔马哈古卜说，人民已经起来，毛主席的教导在全世界已经传播开了。人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理解了毛主席的话，懂得真理应当属于自己，所以人民一定会起来。〕

中国的经验可以作参考，要结合各国自己的经验。我们也是找外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经验，譬如巴黎公社的经验，十月革命的经验，等等。

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可以进口外国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但是要自己搞。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

〔马哈古卜感谢中国向苏丹提供友好援助，特别是在谈判中贯穿的友好精神。〕

物质援助，要到了手，见了效，那才算数。不到手，工厂没有建立起来，那不能算数。你们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没有培养出来，中国人不撤走，也

还不能算数。那末，什么叫帝国主义呢？它就是不帮助人家建设的，它赖着不肯走，那没有办法，只好革命了。

非洲可沸腾起来了，闹起来了，大闹起来了！半个多世纪了，五十多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又培养了反对它的人，另外培养一批走狗拥护它自己。

美帝国主义、世界人民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这个美帝国主义专门团结那些各国人民认为是不好的人。它喜欢那类人作朋友，我们就喜欢我们这类人。

帝国主义是要对非洲各国人民的领袖和著名政治家进行暗害阴谋活动的，要提高警惕。

注释

〔1〕曼苏尔·马哈古卜，时任苏丹财政部长。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和赞比亚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英联邦像是个俱乐部，中国过去也是这个俱乐部的。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顾不了了，把中国让给了美国。所以，日本投降之后，美国帮助蒋介石打我们。而我们这些人就被叫做共产党“匪徒”，跟普通的土匪不同，是共产党“匪徒”。这样，我们就没有资格进那个联合国。哪有“匪徒”能够进联合国的？我们也想了一想，我们这个国家也算个联合国嘛！我不到你那个联合国去也可以嘛！我们这些人，帝国主义都是不高兴的。无论是你们的两位总统也好，还是我们这些人也好，都不大中它们的意。那有什么办法呢？你们到北京来也没有通知英国、美国吧？

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帝国主义的日子不大好过。它们怕第三世界，既怕你们这些人，也怕我们这些人。要破除迷信，不要迷信那个什么帝国主义。当然，我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要反对，也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不可以学习，而是说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的迷信，对它们那套欺骗，要破除。要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迷信不容易，它在一些人中根深蒂固。你看，帝国主义多了不起，它们有那么多原子弹、氢弹，飞机到处飞，海军到处跑，到处占领别人的国家，比如美国出兵柬埔寨〔1〕。但它们那个办法是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做法。英国不是到处占领吗？现在它比较乖乖的了。

注释

〔1〕一九七〇年三月，美国在柬埔寨策动军事政变，颠覆西哈努克政府，扶植以朗诺为首的右翼政府，四月三十日，美国政府以柬埔寨有越南南方人民武装的“庇护所”为借口，派遣美国军队和南越雇佣军入侵柬埔寨。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法国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大安宁。你热爱独立是一件事，别人总要干扰你又是一件事。上回我就跟你们讲过，世界上就有那么少数几个国家，喜欢干涉别国的独立。你们说希特勒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法国独立了，中国也解放了。但现在世界还是不安宁啊！当然，现在没有人侵犯你们法国；除了台湾以外，也还没有人侵犯中国。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要准备打仗，不是自己打出去，而是当别国打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消灭它。现在已不是几十年前那样，谁人都可以在中国头上拉屎拉尿。

我劝你们除了搞“马其诺防线”之类以外，搞原子弹以外，还要准备搞什么民防那一套。你晓得世界怎么变化？我们又不是那几个大国的参谋长。你们也是受别国的气的。

欧洲现在的形势，不仅你们，就是英国，要想打一场战争看来是困难的。所谓同盟国，现在也难说。它们在有一些问题上谈得来，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谈不来。我们之间谈就比较容易，跟美、苏它们谈就比较困难。你们法国没有占领我们中国什么地方，我们中国也没有占领法国的科西嘉岛。

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我的一点意见*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陈伯达一份报告〔1〕的批示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2〕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

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3〕，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4〕。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5〕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6〕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7〕，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

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8〕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9〕，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10〕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注释

〔1〕指陈伯达一九七〇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

〔2〕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原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九大后，中央文革就解散了。

〔3〕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写的序言中评价该书的一句话：“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4〕陈伯达摘录的这五条分别是：

1．“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对马克思对于各个作家的评论的评价〕

2．“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3．“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4．“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列宁《预言》中对恩格斯谈未来世界大战一段话的评价〕。

5．“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列宁《怎么办？》〕

〔5〕三次庐山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在庐山先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六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6〕彭德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揭发和批判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同志的错误。

〔7〕指《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共七十条，简称工业七十条。

〔8〕指唐代诗人李白。

〔9〕指陈伯达摘录的毛泽东《实践论》中的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10〕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与斯诺的谈话－关于文化大革命*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的谈话纪要

斯诺：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泽东：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civil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1〕的时候？

毛泽东：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 July 和八月 August 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2〕。

斯诺：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泽东：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3〕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诺：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泽东：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诺：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

毛泽东：可讨嫌了！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4〕，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5〕，他的书马克

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6〕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你说，我的政策正确，五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一百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7〕打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8〕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

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

斯诺：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泽东：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诺：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泽东：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诺：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

毛泽东：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诺：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泽东：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诺：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泽东：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诺：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泽东：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9〕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三十五年啊！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10〕路线被批判了。

斯诺：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泽东：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诺：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泽东：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美国大选〕是哪一年？

斯诺：一九七二年。

毛泽东：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11〕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12〕，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13〕。尼克松当过副总统〔14〕，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

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三亿人，都在那里造反。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

斯诺：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十五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末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

毛泽东：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15〕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三百万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嗵！嗵！嗵！从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一七七六年才开了一个十三个州的

会议，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16〕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

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的嘛，只有三万人不到，一块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17〕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两万多兵，保安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二百户人家。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

斯诺：你想到了。

毛泽东：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

斯诺：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

毛泽东：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蒋介石，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

斯诺：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18〕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泽东：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

斯诺：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泽东：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诺：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毛泽东：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19〕不好，勃兰特〔20〕也不算怎么好。

斯诺：我记得你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诺：我想向你简单地介绍我的经历，作为背景材料，可能你会感兴趣。……〔21〕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毛泽东：但是你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22〕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23〕一个，毛泽东一个。

斯诺：我认为，你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重要的。

毛泽东：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个讲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问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得很。如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五十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许记笔记。如果想睡觉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

毛泽东：你这个记者才不怎么样呢！何必当个记者呢？写个什么书，出个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还有一本什么人写的书可以和你那个《西行漫记》相比的，是一个海员写的，他那时候在广州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没有到解放区去，叫作什么 Belden〔贝尔登〕〔24〕。

斯诺：噢，对了，我知道那个人，他现在还在。

毛泽东：那个拉提摩尔〔25〕怎么样了？

斯诺：他现在也还在，他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在麦卡锡〔26〕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

斯诺：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27〕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毛泽东：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28〕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诺：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29〕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斯诺：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泽东：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30〕。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 LongIslang 长岛。

斯诺：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主席：那就早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31〕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32〕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诺：是新版吗？

毛泽东：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所以他是混进党内的反动分子。

斯诺：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泽东：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33〕搞出来了。

斯诺：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泽东：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诺：就是《炮打司令部》〔34〕那张大字报吗？

毛泽东：就是那张。

斯诺：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泽东：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诺：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泽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诺：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泽东：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诺：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35〕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泽东：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法律〕，是喜欢那个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诺：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泽东：新宪法要写上。

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斯诺：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泽东：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36〕，不行；树立瞿秋白〔37〕，不行；树立李立三〔38〕，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诺：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泽东：不怎么样。

斯诺：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泽东：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红军、人民解收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毛泽东：你回美国去，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研究。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个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去调查一个工厂，我是说中等工厂，千把人的，用一个星期够了吧？

斯诺：够了。

毛泽东：如果调查两个工厂也只有两个星期。调查一个农场，一个星期也够了吧？

斯诺：够了。

毛泽东：调查两个农场也是两个星期。加起来四个星期，也只有一个月嘛。再调查两个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半个月时间。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的。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好。这是我几十年搞调查研究的经验。当个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谈话很不容易。谁跟你谈啊？他们怕你调查他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不容易。

你们这些人跟知识分子、小官僚、小资产阶级交朋友比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试试看嘛！

毛泽东：你到处跑跑嘛，在美国、欧洲、中国之间到处跑跑。以后你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欧洲，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中国，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

斯诺：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泽东：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诺：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处在更大的动荡之中，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们的上一辈更为良好的教育，国家的科学也在发展，而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政策和他们的言谈之间的差距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以至于大多数公众对他们所认定的行政机构失去了信任。

毛泽东：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

斯诺：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泽东：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

斯诺：那是。

毛泽东：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诺：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泽东：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诺：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泽东：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

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主席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诺：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泽东：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末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39〕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40〕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斯诺：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41〕

毛泽东：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苏联开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

就提建议要派代表参加，修正主义是有国际性的。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联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不行。当然后头那个建议被我们打掉了。

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

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好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诺：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

斯诺：粮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毛泽东：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斯诺：我这次来，注意到有很大的变化。

毛泽东：就是这个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斯诺：有时候还要走0形，然后再设法冲破这个圈，重新开始。

毛泽东：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注释

〔1〕“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迅速影响了香港局势，一些香港的群众罢工、游行行动起来。

〔2〕“五·一六”，原是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动小组织。他们利用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反动传单。

〔3〕指斯诺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发表的《同周恩来的谈话》〔国际部分〕。

〔4〕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他在《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演变和人类的起源。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他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等著作中，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把太阳系的形成看成是物质按其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

〔5〕摩根，今译摩尔根，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他在《古代社会》中第一次论述了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存在与发展的规律以及婚姻、家庭形态的历史演变等，并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时代。马克思对该书作过详细摘录和批语。恩格斯也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用其大量资料，阐述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赞誉他“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6〕尼克松，美国共和党人。时任美国总统。一九七二年二月首次访问中国。访华期间就中美关系问题同中方举行谈判，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7〕麦克阿瑟，一九五〇年六月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侵朝战争，并极力主张进攻中国。一九五一年四月被解除一切军职，仅保留五星上将军衔。

〔8〕杜鲁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总统。

〔9〕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于八月一日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复会。迄至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10〕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期间，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这条王明路线，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在政治、军事以及城市和农村工作中实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在组织上以我为核心，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宗派主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11〕艾奇逊，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国务卿，和杜鲁门一起制订了不承认中国和援助台湾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

〔12〕指艾森豪威尔，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任美国总统。

〔13〕肯尼迪，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当选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遇刺身亡。

〔14〕尼克松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期间连任两届美国副总统。

〔15〕华盛顿，一七七五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被推选为大陆军总司令。一七八三年迫使英国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美国独立。一七八九年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16〕这里毛泽东记忆有误。一七七五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同年五月，北美十三个州参加的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对英国进行武装革命的“宣言”，把北美民兵整编为大陆军，六月即一致推选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

〔17〕马歇尔，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任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

〔18〕西哈努克，一九六〇年当选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一九七〇年朗诺发动政变后，西哈努克在北京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任民族统一阵线主席。

〔19〕勃列日涅夫，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20〕勃兰特，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联邦德国政府总理。

〔21〕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

〔22〕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党员只有五十多人。

〔23〕董必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24〕贝尔登，美国进步记者。一九三三年以海员的身分来到中国，九年后回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第二次访问中国，在华北解放区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后，写了《中国震撼世界》一书，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革命。

〔25〕拉提摩尔，又译拉铁摩尔，美国东方学家。一九四一年七月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名义被派驻中国。一九四二年被召回国，任美国新闻处中国部主任。后任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一九五二年遭参议员麦卡锡弹劾。一九六三年赴英国，任利兹大学汉文教授。

〔26〕麦卡锡，一九四六年起任美国参议员，以反共著名。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他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并利用其他机构，对许多人和组织机构进行所谓的"忠诚调查"，采取非法审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在美国国内制造恐怖。

〔27〕《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一九六〇年底完成，一九六一年初开始上演。

〔28〕指江青一九六五年初在上海同张春桥秘密策划，后由姚文元执笔写成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北京各大报纸开始都没有转载。这场政治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直接导火线。

〔29〕刘少奇，任国家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0〕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两国决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确定两国将在三月一日互派大使。

〔31〕指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中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印发了这个文件。

〔32〕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原载一九三九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八十一至八十四期，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一九四九年经作者校阅并作了若干修改后，由解放社〔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出修订第一版。一九六二年作者又校阅了一次，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将原来的两部分调整为九节，在《红旗》杂志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上重新发表，并由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第二版。

〔33〕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

〔34〕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35〕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36〕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

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死在四川江津。

〔37〕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38〕李立三，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

〔39〕柯西金，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0〕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41〕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对外宣传工作不可强加于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至一九七一年三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的一组批语

(一)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毛主席在一个拟在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二)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毛主席对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作了重要批改，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之后，增加了“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一句。

(三)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删去了我援外某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的一段话：“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x修建xxxx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并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四)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毛主席在关于答复新共威尔科克斯同志对我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此事我已说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

(五)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联络部起草的致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贺电，作了重要修改和批示。毛主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缅甸情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具有伟大的意义”，改为“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某一方面也将具有一定的意义。”

(六)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涉及在我报刊上发表兄弟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七)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主席在中央联络部、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中，将“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字删掉，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八)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九)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作了重要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十)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一个接待外宾的计划中，曾经规定过群众在同外宾接触时可“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批示：“不要”。

(十一) 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关于处理某兄弟党要求发表它的一篇文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删去几个字”，报告中两处提到希望该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解决党内分歧，毛主席都把“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删去了。

(十二) 一九六八年八月，毛主席在军委办事组《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和电报稿上的批示：“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此件缓发。”

(十三) 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起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的批示：“去掉第 11 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送审稿的第 11 条是：“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

(十四) 一九六八年九月，外交部《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来访接待计划的请示》原文中有“通过安排参观访问，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毛主席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一句删掉了，并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

（十五） 原文附的《欢迎〔送〕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的标语口号》十九条，毛主席批注：“去掉三条”〔即：17、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8、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19、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十六） 一九六九年一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上指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

（十七） 毛主席在声明稿的“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一句中的“日期”之后加了“和地点”三字。并在“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完全打错了算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一段中的“不是好惹的”改为“是不好欺负的”，还加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句。

（十八） 毛主席在社论的第二段“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毛主席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

（十九） 一九六九年九月，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给日中友协〔正统〕各地组织庆祝我国庆集会发感谢支持电》中的“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句中的“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为“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二十） 一九七〇年六月三日，中国红十字会《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五万元。

（二十一） 一九七〇年六月七日，毛主席口头指示，给秘鲁救济五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了一百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

（二十二） 一九七〇年六月，外交部在“关于我救济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的请示”中，建议我红十字会捐现款十五万元人民币。毛主席批示：“似太少，可赠五十万元，等于赠罗之一半。”

（二十三） 一九七〇年九月，毛主席在中联部起草的我党中央致朝鲜劳动党成立二十五周年贺电稿上，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里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圈去。

（二十四）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外交部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二百万人民币的物资。毛主席批示：“宜增至五百万。”

（二十五）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在中联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二十六）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周总理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

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毛主席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1〕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2〕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3〕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4〕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5〕。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6〕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7〕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8〕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

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9〕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10〕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11〕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12〕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斗争。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13〕。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14〕。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

天才？那几个副词〔15〕，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16〕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17〕，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18〕。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19〕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20〕，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21〕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22〕，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23〕，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24〕，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25〕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26〕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27〕，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28〕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29〕，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

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30〕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31〕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32〕，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注释

〔1〕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死在四川江津。

〔2〕“八七”会议，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3〕刘仁静，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参加托派。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党。建国后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从事翻译工作。一九八七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同年八月因车祸去世。

彭述之(1895-1983)，湖南邵阳人;1919 年入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五四运动;1921 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之一;回国后主编《向导》和《新青年》;在中共四大、五大相继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因不同意中央的路线于 1929 年 11 月被开除出党;1932 年 10 月被捕入狱，1937 年 8 月获释;1948 年，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并迁往香港;先后流亡越南与欧洲;1973 年移居美国;1983 年 11 月 28 日病逝。

〔4〕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5〕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毛泽东就曾在瞿秋白等主持的八七会议上讲过“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

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从而在中央领导机关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十四日印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湖南省委却把它“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并说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决定撤销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6〕李立三，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

〔7〕罗章龙(1896 年 11 月 30 日-1995 年 2 月 3 日)，原名罗璈阶，湖南浏阳人。杰出的政治活动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曾参加五四运动，是中共创建时的党员之一。在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期间，先后组织领导了陇海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及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上连续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是中共第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 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1931 年初，围绕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他策划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1934 年起，任河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建国后，先后在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任教。先后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 年起，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8〕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期间，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

的这条王明路线，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在政治、军事以及城市和农村工作中实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在组织上以我为核心，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宗派主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9〕张国焘，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危害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

〔10〕高岗，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原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五三年，他们结成反党联盟，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将他们开除出党。

〔11〕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

议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揭发和批判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同志的“错误”

〔12〕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3〕黄永胜，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吴法宪，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

叶群，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办公室主任。

李作鹏，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

邱会作，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李雪峰，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一政委。

郑维山，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

〔14〕三项议程，周恩来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1．讨论修改宪法问题；2．国民经济计划问题；3．战备问题。

〔15〕几个副词，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九大党章中没有采用。

〔16〕《我的一点意见》写在陈伯达一九七〇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上，批评了陈伯达鼓吹天才的论调。

〔17〕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继续鼓吹“天才论”，极力主张设“国家主席”。

〔18〕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发言的记录。

〔19〕陈伯达，时任政治局常委。

〔20〕指陈伯达等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毛泽东在会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予以批驳。

〔21〕指中共第三十八军委员会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给中央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

这次会议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有北京军区、华北各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及华北地区有关单位负责人共四百四十九人。从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起，出席中央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四十三人也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华北会议前期由他们共同主持。但李雪峰、郑维山主持华北会议，被毛泽东批评为“批陈不痛不痒”。会议的最后一天，即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他们被宣布“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

〔22〕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部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给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报告

〔23〕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关于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情况等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内容是：“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24〕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这期简报登载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讨论林彪讲话的情况。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宣讲了经林彪审定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简报称林彪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上，第二条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

〔25〕指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四十三人也出席了会议。

〔26〕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都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

〔27〕指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

〔28〕欧仁·鲍狄埃，法国无产阶级诗人，巴黎公社活动家，《国际歌》歌词作者。一八八七年十一月逝世。列宁一九一三年一月写了《欧仁·鲍狄埃》一文。

〔29〕即《我的一点意见》。

〔30〕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

〔31〕彭罗陆杨，彭，指彭真，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罗，指罗瑞卿，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指陆定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杨，指杨尚昆，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2〕指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一九四五年出生。一九六六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一九六七年三月，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一九六九年十月，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按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后吴法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私自交给林立果。林立果自小被娇生惯养，其人狂妄自大，充满幻想，野心勃勃，却被空军系统内部吹成是“超天才”。一九七〇年十月，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组成“联合舰队”。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私自秘密主持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起义”的谐音，即武装起义。“五七一工程”的名

称为林立果所确定〕。《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纪要》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毛泽东进行种种诋毁和攻击。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谋杀阴谋失败后，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也随之败露，九月十三日凌晨，林立果同林彪、叶群在山海关机场强行驾机外逃，飞机坠毁，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对有关同志的谈话

〔一〕〔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小唐〔1〕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周恩来：主席本来指示……〔2〕

毛泽东：那是老皇历喽，不做数喽。

周恩来：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3〕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泽东：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4〕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5〕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周恩来：就让黄华〔6〕作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毛泽东：黄华到加拿大当大使不到四个月，现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咧。

周恩来：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

毛泽东：好，那就这么办。

毛泽东：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7〕，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8〕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佛朗哥〔9〕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四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十九个，非洲国家二十六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七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一百三十一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七十六，十七票弃权，反对票只有三十五。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解释说：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

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0〕

一九五〇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11〕跟伍修权〔12〕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

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

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13〕谈公报〔14〕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战争，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一九四五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

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的许多话可以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

还要讲些什么，请总理考虑。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势如破竹”是晋主司马炎的“三军总司令”杜预讲的，此人号称“左传癖”。他带兵占领武昌，准备进攻东吴的首都建业。一个“二杆子”参谋向他建议，现在长江涨水，等明年再打。杜预说：“今兵威大振，如破竹之势，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有着手处也。”果然一举成功，“三分天下归一统”。做文章就要“势如破竹”，才能说服人。

曹操是大军事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称赞他：“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同时也批评他打过败仗。怎么批评的？请“参座”讲讲。

〔叶剑英：“困于南阳，险于乌巢，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

“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夏侯渊是曹操的一

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郃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郃，夏侯渊分兵一半亲自援助张郃，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15〕的拿手戏。你们看看《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二十三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五十四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十七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三十五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二〕〔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16〕

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针对教条主义者讲的，至今我认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要偏。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人的认识总是赶不上这种变化，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了解了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我一向反对下车伊始，哇哩哇啦的人，那样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光想当先生，不愿当学生。有的人打过仗，有点功劳，或者自以为有点功劳，吃饭、拉屎、睡觉、做梦，都念念不忘他那点功劳。说他没有什么功劳，他就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是低级趣味。这几年，部队有些人的思想被林彪搞乱了。济南军区提出“反骄破满”，提得好，我就让全军学习。我最近常讲，军队要谨慎，这是有的放矢。

今年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过去我们说以苏联为首，因为它是老大哥，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必要的时候让它牵个头，开会的时候让它当主席。但是它要掌握领导权，搞父子党，父子国，这就完全错误了。美国总是要别的国家听它的，这就是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应该被打倒。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在座的同志知道吗？

周恩来：还没有告诉他们，主席谈完后，我们就到大会堂把文件〔17〕读给他们听，并介绍有关情况。“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暗害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纲领。

毛泽东：等一会把这件东西念给他们听。要尽快全文印发到全国各个党支部。

周恩来：这里面尽是恶毒诽谤主席的谰言，怎么能印发？

毛泽东：怎么不能？一个字都不改，原原本本发下去，让所有的党员所有的群众都知道。

毛泽东：安全问题很重要，去了上上下下要住在一起。

毛泽东〔对周恩来〕：马上打电报给黄镇〔18〕的助手，让他转告基辛格，我们的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出了问题，唯美国政府是问。

注释

〔1〕小唐，唐闻生，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出生，唐闻生和王海容是毛泽东晚年的重要翻译。参加本次会见的还有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荣。

〔2〕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秘密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告诉周恩来：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简称安理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

在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时，毛泽东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3〕熊向晖，时任周恩来总理的助理。我党历史上著名的王牌间谍，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一九三七年，奉周恩来指示打入国民党胡宗南部，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一九四七年五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建国后从事外交工作。

〔4〕乔老爷，指乔冠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老爷”一号其源于六十年代喜剧影片《乔老爷上轿》。

〔5〕尼克松，时任美国总统。

〔6〕黄华，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

〔7〕林彪〔一九〇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并组织人企图压服中央，犯了错误，被毛泽东主席识破，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批评，并等待其认错达一年之久〔从一九七〇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不料，其子林立果狂妄自大，趁毛泽东南巡之时，妄图谋杀毛泽东主席，事情败露后，九月十三日夜，林立果挟制林彪和叶群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后，林立果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现，因此，中央认定，林彪叛国。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静火有言：林彪教子无方，最后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说冤也不冤。

〔8〕指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二十一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日夜坚守在护理毛泽东的第一线，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

〔9〕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四日 -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西班牙政治家，军事家，法西斯主义独裁者，西班牙大元帅，西班牙长枪党党魁。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佛朗哥军队占领马德里，推翻共和政府，对西班牙进行了长达三十六年的独裁统治。

〔10〕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十一月十五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11〕指乔冠华。

〔12〕伍修权，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会，在联合国讲台上慷慨陈词，严厉驳斥美国及其同伙对我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痛斥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

〔13〕基辛格，时任美国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七月十六日中美双方公布了基辛格访华的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密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公告发表后，在世界上引起了震动。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公开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工作，与中方共同草拟联合公报草案。

〔14〕公报，指后来尼克松访华时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简称《上海公报》。

〔15〕谭鑫培、谭富英，谭家是著名京剧世家，谭鑫培是谭富英的祖父，京剧史上第一个老生流派谭派创始人。谭富英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四大须生之一。

〔16〕这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晚八时，毛泽东主席约见周恩来总理、姬鹏飞、乔冠华、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唐闻生、章文晋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驻苏大使刘新权时的谈话。

〔17〕这个文件指《“五七一工程”纪要》，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林彪之子林立果连同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秘密所站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但是可能逐渐削弱。“文人力量”〔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在发展，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二是林彪“被人抢班”，三是林彪“提前抢班”。他们提出两个办法：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直接干掉毛泽东，但毛泽东影响大、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和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林立果确定计划名称为“五七一工程”计划。〔“五七一”为“武装起义”的谐音。〕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于新野执笔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原稿后来被缴获。分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根据“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等人共策划了八种手法杀死毛泽东，“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该纪要还恶毒地辱骂毛泽东是“暴君”“独裁者”，并提出“打着 B—52 旗号打击 B—52 力量”，并规定“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注：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专门以武士道精神训练日本死士〕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该纪要后来被原原本本地印发到县团级以上干部手中。

〔18〕黄镇，历任印度尼西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法国首任大使。自一九七一年起，黄镇奉命秘密同美国展开外交沟通，负责与美国代表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联络工作。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对反革命不要杀，保留活证据*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

红军的传统历来不能自己打自己。你〔1〕就是王佐〔2〕部队的一个兵。王佐这个人无论如何是有功劳的，而且还加入了党。就是舍不得那个山头，吃不了苦。王佐这个人被彭德怀杀了，这就不好了嘛！哪有共产党的部队打共产党的部队？五军团的季振同〔3〕也不该杀。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

你把解方〔4〕这样的人杀了干什么？

〔周恩来：那个王实味〔5〕也可以不杀。〕

不杀，现在多好。国民党抓刘少奇〔6〕、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活证据嘛。

注释

〔1〕指张国华，时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2〕王佐，与袁文才共同领导井冈山的绿林武装。

〔3〕季振同，原任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十四师师长、七十四旅旅长。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与赵博生、董振堂等发动了著名的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红军第五军团，任总指挥。一九三四年八月，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被误定为反革命分子，入狱监禁。十月，长征前夕，被杀于江西省瑞金县叶坪镇。

〔4〕解方，曾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参与第一至五次战役的指挥，并作为朝中方面代表之一参加开城停战谈判，回国后历任中央军委军训部副部长，越南停战谈判顾问，南京军事学院科学研究部部长、副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后勤学院副院长等职。早年留学日本，原为东北军部下，曾任张学良副官，在文革中被查出西安事变前后参加了张学良秘密组织的东北革命军人同志会，在一九四六年曾与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东北军旧部四十二人联名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张学良回东北，被定为“东北叛党集团”成员，几乎被判死刑，后被毛泽东和周恩来制止。

〔5〕王实味(1906-1947 年 7 月 1 日)，原名诗微，笔名实味、叔翰、实微。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1942 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

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1946 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 年 7 月，在战争环境中被杀害。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1991 年 2 月 7 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 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6〕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中国方面的声明*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定的中美上海公报的中国立场部分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

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1〕以及在今年二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2〕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3〕；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4〕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系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注释

〔1〕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在巴黎会议上提出七点和平倡议：

一、如果美国规定撤军的限期，双方的全部战俘就可释放。

二、成立三方民族团结政府。

三、由越南人自己解决南方的越南武装力量问题。

四、北越和南越逐步统一。

五、南越奉行和平和中立的外交政策。

六、美国政府必须对在北越和南越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承担全部责任。

七、国际上来保证所达成的协议。指出美国政府必须确定撤军的期限；如果美国政府规定在一九七一年内从越南南方撤走全部美军及其仆从军，各方就可以同时商定关于从越南南方安全撤走全部美军及其仆从军的事宜和关于释放在战争中被俘的各方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的事宜。美国政府还必须尊重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停止干涉越南南方内政，停止支持以阮文绍为首的傀儡政权。这个倡议，为和平解决越南问题提供了正确的途径。

〔2〕一九七二年二月初，北越就原来的“七点建议”通知美国，准备把释放全部战俘同美军和盟军从南越撤退这两件事协调一致起来，要求美军和盟军在一九七一年内全部撤退完毕，并形成了新的“九点建议”：

一、在一九七一年内全部撤退美国和盟国的军队。

二、在撤军的同时释放俘获的全部士兵与平民，并且在军队全部撤退时完成释放工作。

三、美国停止支持南越阮文绍总统的政权，用一个新的政府代替这个政权，南越临时革命政府可以就这个国家的问题同新政府举行会谈。

四、对在战争中造成的损失，美国向河内和临时革命政府偿付赔款。

五、停止美国的干涉，而且尊重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和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

六、印度支那各国之间的问题“将由印度支那各方在互相尊重、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七、在就上述各问题缔结协议后，所有各方将实行停火。

八、将实行国际监督。

九、为了确保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以及南越、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受到尊重，为了在这个地区确立持久和平，国际保证是必要的。

〔3〕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在中国、老挝和越南边境地区举行，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国四方领导人各自率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扩大对越南和老挝的侵略战争，在柬埔寨发动政变，重申四方领导人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严正立场，号召印度支那人民团结起来，捍卫民族权利，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使印度支那成为真正符合三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愿望的独立和平地区。

〔4〕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提出了《关于统一祖国的八项救国方案》。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美军撤出南朝鲜；

二、南北方军队均裁减至十万人以下；

三、废除韩美、韩日条约，确立民族自主权；

四、举行南北大选，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

五、保障政治活动自由；

六、作为过渡性措施，实施南北联邦制；

七、广泛进行南北经济、文化、人员交流；

八、召开南北政治协商会议。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党内的指示

我国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应当有大国霸权主义思想，而在国内建设中则要切实做好战备工作，要进一步挖深挖好防空掩体，加强粮食储蓄。

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祝贺越南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祝贺越南问题巴黎协定〔1〕正式签订的电报

河内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越南南方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阁下，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阁下：

值此《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在巴黎正式签订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向越南南北方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英雄的越南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高举胡志明〔2〕主席“决战决胜”的旗帜，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十余年浴血战斗，终于促使美国政府签订越南停战和平协定，同意限期撤出美国及其盟国的全部武装力量，并且确认越南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和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从而为越南人民在没有外来武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实现越南的和平、独立、统一、民主和繁荣开辟了前景。

巴黎协定的签订，是越南人民在军事、政治和外交战线上长期斗争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越南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印度支那〔3〕三国人民团结战斗的伟大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共同胜利。

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胜利就像自己的胜利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你们在长期抗战中表现出来的顽强革命精神和大无畏英雄气概，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钦佩和赞扬。你们的光辉榜样，证明了小国能够战胜大国，弱国能够战胜强国，有力地鼓舞着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你们的英勇斗争和伟大胜利，将作为当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辉典范而载入史册。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亲密邻邦。我们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斗争中，一贯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中国人民一向把你们的斗争当作自己的斗争，把支援你们的正义事业当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过去的抗美救国战争中，我们是这样做的，今后，我们仍将同兄弟的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同兄弟的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站在一起，给予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以坚决的支援。

我们衷心祝愿越南北方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北方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衷心祝愿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旗帜下，同其他两种政治力量，迅速成立各级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通过协商进行普选，决定南方的政治前途，在独立、民主和民族团结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深信，越南人民统一祖国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一定胜利。

注释

〔1〕指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西贡伪政权四方代表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简称《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

主要内容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尊重一九五四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所承认的越南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美国承担义务，在协定签字后六十天内从越南南方撤出全部美国及其同盟者的军队和军事人员，不继续其对越南南方的军事卷入，不干涉越南南方内政，保证尊重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越南南方人民将通过普选决定越南南方的政治前途；越南的统一将通过和平方法逐步实现。

〔2〕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一九六九年逝世。

〔3〕印度支那，英语 Indochina，是指中南半岛，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三个国家。越南战争，亦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指一九六一至一九七五年，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侵略、捍卫民族独立和争取社会进步的解放战争。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接见基辛格时的谈话*〔1〕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一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接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的谈话节选

基辛格：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

毛泽东：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转头朝洛德〔2〕说话〕你真年轻。

洛德：我渐渐老了。

毛泽东：在坐的要属我最老了。

周恩来：我是第二老的。

毛泽东：当年英军有人反对你们国家独立。蒙哥马利〔3〕元帅则是反对你们政策的人士之一。

基辛格：是的。

毛泽东：他也反对杜勒斯〔4〕的政策。不过，他大概不会再反对你们了。当时，你们也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我们彼此是敌人〔大笑〕。

基辛格：以前的敌人。

毛泽东：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做什么 Friendship〔友谊〕。

基辛格：这是我们的感想。

毛泽东：也正是我说的。

基辛格：我对周总理说过，我们还没跟其他国家会谈得像跟你们会谈时，这般的坦白和开放。

毛泽东：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到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我跟你们的一个记者 Edgarsnow〔埃德迦·斯诺〕〔5〕谈过，我说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大事也不行，不管用。

基辛格：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毛泽东：因为，当你们下令时，譬如说，你们的总统下令，你需要关于某些问题的信息，情报单位的报告却像雪片般飞来。我们也有情报局，情形也一样。他们做得不好〔周恩来在一旁笑了〕，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林彪〔6〕〔周继续笑着〕。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

毛泽东：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越南问题〔7〕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辛格：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毛泽东：对的。

基辛格：基本问题都解决了。

毛泽东：我们也需要嘛。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

基辛格：是的，我们都面对一样的危险。有时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是一样的。

毛泽东：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实际上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基辛格：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忠于各自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如果双方讲同样一个调子，只会使局势混乱。我对总理说过，在欧洲，你们出于自己的原则，可以讲得比我们更坚定。

毛泽东：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

基辛格：主席先生，从我们这方面说，你们和我们之间虽然有时要进行批评，但我们仍要同你们协调行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参与企图孤立你们的行动。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同意在一切实质问题上要同他们合作，但目前欧洲的领导很弱。

毛泽东：他们不团结。

基辛格：不团结，而且不象你们那样有远见。当他们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们总想不费力气就使危险消失。

周恩来〔对毛〕：帮助蓬皮杜〔8〕，他〔指基辛格〕同意。

基辛格：我们正在尽量这样做，回去后我们要争取做得更多。

毛泽东：现在蓬皮杜受到威胁，就是那个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顶他。

基辛格：两家联合。

毛泽东：两家联合，苏联想要共产党登台。那个共产党我不喜欢，就象你们的共产党我也不喜欢一样。我喜欢你们，不喜欢你们的共产党。〔基笑〕

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

基辛格：但是，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毛泽东：我正是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9〕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辛格：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毛泽东：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基辛格：我曾告诉过总理，你们的行动方式要比我们直截了当和英勇一些。我们有时要采用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

毛泽东：英文什么叫做行动方式啊？

沈若云：Modeofacton〔行动方式〕。

基辛格：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末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毛泽东：你说的这个是老实话。

基辛格：这是我们的立场。

〔〔毛泽东开始抽雪茄，并试着递雪茄给基辛格和洛德，洛德表示他不抽烟〕

基辛格：我们并未计划在未来四年大量裁减驻扎在欧洲的美军。

〔毛泽东望向周恩来〕

周恩来：说到裁军，你的意思是最多裁百分之十到十五。

基辛格：完全正确。

毛泽东：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有多少？他们大都是导弹部队吧。

周恩来：大概在三十至三十五万间，包括地中海的驻军。

毛泽东：这大概不包括海军在内。

基辛格：不包括海军。在欧洲中部约有二十七万五千人，但这不含部署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

毛泽东：你们部署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军队散布很广。你们在南朝鲜〔10〕有军队，我听说大约有三十万人。

基辛格：大约四万。

毛泽东：蒋介石那儿大约有八到九千人。

周恩来：在台湾吧。

毛泽东：听说日本还有两地驻军，四万人在琉球、二至三万人在日本本土。我不知道菲律宾有多少美军，但现在越南的美军只有一万多人。

基辛格：但他们很快都会撤回。

毛泽东：对，我听说你们在泰国有四万人。

基辛格：对的。但主席你刚才说的大都是空军部队，所以恐怕不能光以人数衡量。

毛泽东：你们也有地面部队，例如在南朝鲜。

基辛格：我们在南朝鲜确有地面部队。

毛泽东：你经过日本时，最好多花点时间和他们会谈。你只和他们谈一天，他们的面子很挂不住。

基辛格：主席，我们希望此行的重点是北京的会谈。稍后我会单独再去一趟东京。

毛泽东：很好。对他们说清楚些。你知道日本对苏联的感觉也不是很好。

基辛格：他们有点爱恨交加。

毛泽东：〔比手势〕一句话，这是日本田中首相告诉周总理的，苏联做的事就像看到有人要上吊，就立刻把人家脚下的椅子抽走。

基辛格：是的。

毛泽东：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未发一枪一弹就抢了一大片土地。〔周恩来轻轻的笑了〕他们抢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抢了一半的新疆和东北的满洲，还说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11〕

基辛格：他们还夺走当地所有的工业。

毛泽东：对呀。他们还抢走库页岛和千岛群岛〔12〕。

基辛格：日本被苏联的经济发展性所迷惑。

毛泽东：〔点头〕他们希望从苏联那儿拿回些什么。

基辛格：但我们将加强日本和美国关系，同时也希望和中国加强关系。

毛泽东：我们认为，要是日本和苏联加强关系，不如和美国加强关系，这样会比较好些。

基辛格：日本和苏联如果形成紧密政治关系是很危险的事。

毛泽东：这在现实上，似乎不可能成真。

周恩来：〔对毛泽东〕我们已经决定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以维持黄华〔13〕和白宫的联系。

毛泽东：〔对周恩来〕重要性何在？

周恩来：联络办事处将处理一般民众的交流事务。至于保密性强以及紧急事务则不包括在内，这将交由黄华大使的管道处理。

毛泽东：黄华命苦〔周大笑〕，他在你们那干得很好，现在赶回上海，背还扭伤。

基辛格：他返回任所时，我们会给他找个医生。

毛泽东：好啊。〔周大笑〕黄华好像在你们那比较安全，他一回到上海就摔跤。从你们总统观看中国杂技团演出开始，我想越南问题快解决了吧。还有谣传说，你也快摔跤了〔笑声〕，对这件事，在场女士们可不太满意〔笑声，尤其是女士们〕，有人说，如果博士垮了，我们也将没活干。

毛泽东：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

毛泽东：中国人排外得很。你们可以容纳很多民族。我们中国没有几个外国人。你们不同的民族有多少，你们美国有六十万中国人，而我们恐怕连六十个美国人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你们研究一下吧。从来就不喜欢外国人。包括日本人也很少。印度人一个都没有。

周恩来：非常少。

基辛格：这是因为历史上你们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幸运。

毛泽东：有这么点理由。恐怕过去一百年，主要是八国联军，后来日本人占领中国十三年，占领大部分领土。他们过去占领中国领土不算，占领了北京还要赔偿。

基辛格：是的，还有治外法权。

毛泽东：治外法权，多哩！现在我们对日本，不要它赔偿。没法算，谁也算不清。赔不起。

周恩来：一赔就要增加人民负担。

毛泽东：只有以这种方法我们才能消除敌意，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要化解中日人民间的敌意比化解你我之间的敌意困难。

基辛格：是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敌意，相反的，我们之间现在只有一个判断性问题。

毛泽东：对。

基辛格：未来几年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很快就会开始运作。

毛泽东：是吗？

基辛格：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毛泽东：你所谓的利益共同体是什么？是指台湾？

基辛格：是指其他有这种意向的国家。

周恩来：你是指苏联？

基辛格：我是指苏联。

周恩来：沈小姐了解你说的意思。

毛泽东：〔看着翻译沈若云〕这个人的英文能力很好。〔对周恩来说〕她是谁？

周恩来：她是沈若云。

毛泽东：我们的翻译实在太少了。

基辛格：不过，我们遇到的翻译，他们都做得很称职。

毛泽东：你遇到的翻译和我们现在的翻译现在只有二、三十岁，如果他们老了以后，就无法翻译像现在这么好了。

周恩来：我们应该送一些人出国。

毛泽东：我们应该送一些像这样高的小孩〔用手比了一下〕出国，年龄不要太大。

基辛格：我们准备设立一些人员交换计划，让你们送学生到美国。

毛泽东：一百个学生当中如果有十个人学好外语，那就非常成功，即使有十多个学生不想回国，例如一些女孩想留在美国，那也没关系，因为你们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么排外。过去，中国到外国却不肯学当地语言，〔看着翻译唐闻生〕她的祖父母就拒绝学英语。他们就是这么顽固。你知道中国人是非常顽固和保守。许多老一代华侨不肯说当地语言，但年轻一代好多了。

毛泽东：〔比个手势并指着他的书〕假如苏联丢了炸弹并杀死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将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像我一样的老人不会学英文，我们只会读中文，我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只有少数的字典是外文，其他大部分的书是中文。

基辛格：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

毛泽东：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

唐闻生：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毛泽东：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辞汇－纸老虎。

基辛格：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笑〕

毛泽东：假如俄国攻击中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将采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周恩来笑了〕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笑〕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

基辛格：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笑〕

毛泽东：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他们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也是社会主义者，那么苏联进攻中国就是社会主义者攻击社会主义者。

基辛格：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泽东：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将是一件好事。

基辛格：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的孤立。

毛泽东：〔笑〕那会怎样？因为自从深陷越南后，你们遭遇这么多的困难，你想如果苏联深陷在中国，他们会感到舒服吗？

基辛格：苏联？

唐闻生：苏联。

毛泽东：那时候你们可以让苏联深陷在中国，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或四年，戳苏联的背后，那时候你们的口号将是寻求和平，你们将以和平之名瓦解社

会主义帝国，也许你们将以作生意帮助他们，并向他们表示可以提供一切协助反对中国。

基辛格：主席先生，我们了解彼此的意图实在非常重要，我们绝对不会联手攻击中国。

毛泽东：〔打断基的谈话〕不，不是这样，你正在进行的目标是瓦解苏联。

基辛格：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笑〕

毛泽东：〔用两手作势〕苏联的目标是占领欧亚两个大陆。

基辛格：我们希望吓阻苏联的攻击，而不是击败他，我们希望阻止他。

〔周恩来看表〕

毛泽东：世事难料，我们宁愿事情如此发展，这样的发展对世界来说比较好。

基辛格：哪种方式？

毛泽东：那就是苏联进攻中国并且被击败，我们必须作最坏的考虑。

基辛格：那是你的必然性推论。

毛泽东：无论如何，老天已经送给我一封邀请函。

基辛格：我真的发现主席今年气色比去年好。

毛泽东：是的，我的情况比去年好。请代我向尼克松总统致意，同时也向尼克松夫人致意，很抱歉无法与她及罗杰国务卿见面。

基辛格：我一定会转达。

〔二〕〔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我们现在来讨论讨论台湾问题。美国跟我们的关系，应当和我们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分开来处理。

基辛格：原则上……

毛泽东：只要你们跟台湾切断外交关系，就可以来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这跟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就相当的复杂。我看没办法和平解决。

他们〔14〕都是一伙儿反革命分子，怎么会跟我们合作？我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过一百年再去管他。对世事不要太急。有什么好急的呢？那只不过是个千把万人口的小岛罢了。

周恩来：他们现在有一千六百万人。

毛泽东：至于你们跟我们的关系，我想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处理。

基辛格：我相信是这样。我们应该会快得多。

毛泽东：不过这是你们自己要决定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催你们。要是你们觉得有必要，我们就配合。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还不行，那我们也可以缓一点。

基辛格：在我们而言，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困难在于我们不能马上就切断与台湾的关系。有几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都跟我们的国内情势有关。我跟总理说过，我们希望在一九七六年之前，或者在一九七六年期间完成这个程序。所以，我们要找到某种方式，来建立外交关系，也可以当作贵我加强关系的象征，因为就技术层面来说，联络处〔15〕用处非常大。

毛泽东：这是可以的。

基辛格：什么可以？

毛泽东：可以照现在的办法来做，因为现在你们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这不是需不需要台湾的问题，而是实际上可不可行的问题。

毛泽东：都一样〔大笑〕。我们现在对香港也不急〔大笑〕。我们甚至不会碰澳门。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碰澳门，顶多也只碰一点点。因为葡萄牙从明朝就开始紧紧地掌控着澳门〔大笑〕。赫鲁晓夫也骂过我，说为什么我们连香港和澳门都不要〔16〕。而且我也跟日本说过，我们不只赞同他们〔日本〕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而且还包括历史上，苏联自中国割去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基辛格：主席，我觉得外交关系上的问题就是这个。在台湾问题上，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各自的立场。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而且联络处也发挥了应有的功能。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都认为，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认为，应该象征性地显示，中美关系在各方面说来都是正常的。果真如此，我们就应该想个办法来做，不过这不是非做不可。

毛泽东：我们也有和苏联与印度建交啊，不过关系也不怎么样。甚至还没有我们与你们的关系好。所以这不是很重要。整个国际情势才真的重要。

基辛格：我完全同意主席的说法，也同意我们必须彼此了解，我相信我们对彼此都有实质的了解。

毛泽东：我们联络处主任已经跟你们说过大原则，也提过当年乔治·华盛顿反抗英国的故事。

基辛格：对，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对我作过精彩的演说，我以前也从总理那里听过。

毛泽东：那套说法可以不用再提了。我们现在有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一直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建国运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美国在当地阻止苏联的做法表示欢迎，以免苏联控制中东地带。我们黄镇大使提过我们支持阿拉伯世界，不过他不了解阻止苏联势力扩张的重要性。

基辛格：嗯，我那时的说法让他很惊讶，而他也重述了联合国的官式立场〔大笑〕。而我了解你们必须公开地采取某些立场。这些并不违反我们的共同立场。不过，事实上，我们会进一步解决中东问题，但我们也想显示这不是因为苏联施压才使然。

所以，每当苏俄施压，我们必须抗拒，除了争执本身有其优点之外，我们可说是为了抗拒而抗拒。然后当我们击败他们时，我们甚至有可能朝同样的方向前进，我们不是反对阿拉伯国家的想法，我们只是反对借着苏联施压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毛泽东：没错。

基辛格：而且我们现在的策略正是如此。

毛泽东：下次你再到中国来，除了政治，还可以同我谈一点哲学。

基李格：我很乐意，主席先生。哲学研究是我的初恋。

毛泽东：或许当了国务卿后就比较难研究哲学了。

基辛格：是的。

毛泽东：赫鲁晓夫说我们像是好斗的公鸡。

基辛格：他一九五九年到这里访问时，不太成功。

毛泽东：我们在一九五八年决裂。他们一九五八年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中国军港时，我们开始失和。我和他们、他们的大使讨论的时候，我差一点拍桌子，我骂了他一顿。〔笑〕在莫斯科报告后，赫鲁晓夫就来了。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联合舰队的构想，就是苏联和中国共组一个联合海军舰队。那就是他说的。那时候，他口气还很大，因为他见过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沾了点所谓的“戴维营精神”。他在北京同我夸口，说他认识美国总统，讲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时还说了两个英文字，说他是“我的朋友”〔myfriend〕。〔问布鲁斯大使；你知道这回事吗？〕

布鲁斯：不，我从不知道这回事。

毛泽东：还有一些消息。从此以后，赫鲁晓夫没有再来过。但他曾到过海参崴，他是从中国到海参巍的。

周恩来：他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反中国的演讲。

毛泽东：现在的苏联领导人没有一个到过像海参崴那么远的东边。柯西金自己说过，他对西伯利亚的事情不太清楚。

〔中方查看时间〕

周恩来：已经两个半小时了。

毛泽东：我本来还想同你谈另外一个问题。不过今天我们好像谈得太久了。超过两个半钟头。我们占用了原本为别的活动安排的时间。我想讨论的是，我很怀疑，如果民主党掌权，他们会采用孤立主义。

基辛格：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主席先生。我认为目前的知识分子和一些民主党，可能会走向孤立主义。不过，现实状况会让他们了解，我们目前的政策就是唯一的选择。目前我还不知道，在他们了解这点以前会产生多大伤害，还有，他们是否将继续同样错综复杂的战术。但是我想，他们不会偏离现在的轨道。

毛泽东：那你和我似乎是同一类的。我们好像多少都有点疑神疑鬼的。

基辛格：我是怀疑，我对某些领袖也有些疑问。但是我想形势所需，使我们只有回到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政策。

不过，主席先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趁着大家都还在位，而且都了解这情势的时候，尽量加强关系，不要让其他政策有机可趁。

毛泽东：这个主要从一点上就可以证明，就是主张从欧洲撤军。

基辛格：是的。

毛泽东：这是帮苏联的大忙了。

基辛格：我们将不会在我们尼克松总统任内执行。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形：军队从欧洲撤退，如遇挑战，也不太愿意极为粗暴、极为迅速的解决。

毛泽东：你所说的“粗暴”意思是指可能开战。

基辛格：如果有必要，但……

毛泽东：我不喜欢你同我耍外交辞令。

基辛格：如果有必要，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只要他们知道我们将发动战争，他们就会松手。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很怕我们。

毛泽东：因为我也认为最好不要开战。我也不喜欢战争。虽然人家都说我是个好战分子。〔笑〕如果你们和苏联开战，我也觉得不要。如果你们真的打，最好只用传统武器，核武器只是备用，尽量不要碰。

基辛格：我们绝对不会发动战争。

毛泽东：那就好。我听说你们以前这个方法是为了争取时间。

毛泽东：我们是想争取时间，可是，我们还有另一个立场，如果苏联攻击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任何一个重要地区，我们要能反击。我们必须防患未然。

毛泽东：完全正确。至于苏联，他们欺弱怕强。

注释

〔1〕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星期六晚间十一点半至隔天凌晨一点二十分。毛泽东接见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座的有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翻译唐闻生、翻译沈若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洛德。

〔2〕洛德，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时年三十六岁。

〔3〕蒙哥马利〔一八八七——一九七六〕，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盟军指挥官之一。后曾任英军总参谋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最高副总司令。

〔4〕杜勒斯，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一九五零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一九五四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他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坚持不承认中国、非法排斥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明目张胆地进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

〔5〕斯诺，〔一九〇五——一九七二年〕美国新闻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美国进步作家、记者。一九二八年第一次到中国。一九三六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人，后写了《红星照耀中国》等书。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九六〇年、一九六四年、一九七〇年访问中国。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6〕林彪〔一九〇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四人帮之一。

〔7〕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西贡伪政权四方代表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简称《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根据规定，美国政府必须在六十天内撤走全部军队，从而为越南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基辛格对这份协定的贡献，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挪威议会选出的诺贝尔和平奖五人委员会宣布基辛格与黎德寿〔越方领导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8〕蓬皮杜，时任法国总统。

〔9〕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西德或联邦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为民主德国〔东德〕和联邦德国〔西德〕，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两德统一，称德国。

〔10〕南朝鲜，今大韩民国，简称韩国。

〔11〕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二十年间，苏联趁中国内乱无力北顾，逐渐蚕食中国领土，利用二战日本入侵中国、国共相争的时机，逼迫中国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并取得了在新疆和东北的一系列特权。

〔12〕一九四五年二月，苏美英关于战后日本问题的《雅尔塔协定》规定，整个千岛群岛，包括日本方面所说的“北方四岛”，择捉、国后、色丹和齿舞群岛，都划归苏联。

〔13〕黄华，时任常驻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代表。

〔14〕指台湾的蒋介石集团。

〔15〕一九七三年五月中美两国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资深外交家、原驻法大使黄镇任驻美联络处主任，美国资深外交家布鲁斯任驻华联络处主任。

〔16〕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提出：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收回由于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落入葡萄牙和英国帝国主义监督之下的澳门和香港不感兴趣，而却对与印度的边界怀有敌意呢？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启用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启用邓小平时的批示和部分谈话

一、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对邓小平来信〔1〕的批示

请总理〔2〕阅后，交汪主任〔3〕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4〕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5〕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6〕。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7〕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十四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部分谈话

我和剑英〔8〕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

三、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的相关谈话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四、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的相关谈话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对邓小平〕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注释

〔1〕邓小平，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污蔑被迫停止工作。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江西。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他给毛泽东写信，全文如下：

主席：

前天，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

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静火注，应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

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〇、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

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2〕总理，指周恩来。

〔3〕指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团长。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的责任。

〔4〕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5〕邓，指邓小平，一九三二年冬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毛，指毛泽覃，一九三一年六月任永〔丰〕、吉〔安〕、太〔和〕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指谢唯俊，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帅师长。古，指古柏，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团书记。他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从实际情况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意见，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作法。一九三三年三月起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遭受残酷斗争，受到撤职等处分。

〔6〕张闻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一九三三年一月随同临时中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7〕刘伯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委邓小平等一起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和冀南、太岳、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邓小平一起率领所属部队挺进大别山，参与指挥淮海、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

〔8〕剑英，指叶剑英，“九·一三”事件后，军委撤销军委办事组，重组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

〔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

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

慢慢来，就会顺手。

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我向基辛格〔5〕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6〕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注释

〔1〕八大军区对调，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签发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当时全国共有十一个大军区，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都任职时间不长，最长的也才四个月，他们都原封不动。其它八个军区司令员对调：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2〕叶剑英，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3〕总理，指周恩来。

〔4〕王洪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5〕基辛格，一九七三年二月和十一月两次访华，毛泽东都接见了他。就国际形势换了意见。

〔6〕北极熊，指苏联。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的谈话节选

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1〕，不仅要修到拉萨，而且还要与尼泊尔接轨，通到加德满都〔2〕去。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

注释

〔1〕青藏铁路，一九五八年，在毛泽东指示下，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格尔木段〕动工修建。从一九六一年三月开始，因连续三年困难时期，青藏铁路全线停建。一九七四年，为落实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的谈话精神，一九七四年三月和一九七五年三月，铁道兵第十师和第七师共六点二万人，奉中央军委命令先后开进青海，开始了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的建设。一九七九年铺轨到格尔木，一期工程完成，一九八四年通车。由于当时没有攻克高原冻土和高寒缺氧两大难题的把握,青藏铁路格尔木—拉萨段在一九七八年七月被叫停。直到一九九八年，高原冻土地区修筑铁路的技术问题获得了重大进展，青藏铁路再次提到日程上来，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江泽民批示修建青藏铁路十分必要，二〇〇一年六月二十九日，青藏铁路二期格拉段开工，二〇〇六年七月一日全线通车。

〔2〕加德满都，尼泊尔首都。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谈话*

〔一九七四年二月、三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卡翁达、布迈丁、尼雷尔〔1〕时的谈话内容纪要

〔一〕〔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

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你呢，我们希望也是要帮助人民。我劝你对人民要好啊！没有人民就会垮台。

〔当卡翁达谈到赞比亚支持世界的反帝反殖斗争和在国内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时〕,你现在不能当共产党，你当共产党，人家就都反对你，但是你可以看一点马克思的书。

〔当卡翁达赞扬我援赞工程人员时〕,我们是共产党啊，应该好一点！我们的人也犯了一些错误呢。要教育。共产党内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有一些人看不起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人民，所以应该教育。我委托你教育中国的工程人员，还有尼雷尔总统，也应该这样做。在你们那里工作的，世界上的人作了坏事，不管哪个国家的都应该教育、处分或者把他们赶回来。不然那些人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帮助你们修了铁路，了不起呀！

非洲最好统一起来。南部非洲难啊！中间和北方的慢慢地统一起来。你们应该发展人口。中国人口太多。非洲人还不够。

〔二〕〔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当布迈丁问到美苏是否达成某种协议和进一步问到战争问题时〕

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我看会打仗。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要打的。争夺的结果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暂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

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我们要打，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争，也不是这些富国的人民想要打世界大战，这种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想到希特勒几乎统一了欧洲，又失败了。谁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又产生了十月革命。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尾把日本、后来又把蒋介石赶走了。

至于打不打原子武器，可能打，也可能不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对日本打过，但是后头在朝鲜战争，就没有打。在越南战争，也没有打。在中东，以色列也好，埃及也好，美国人跟俄国人也没有援助他们原子武器。

〔布迈丁说，我们国家太小了，没有办法对付大国。〕

你们不小，你们把法国人赶走了，越南人也把美国问题解决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把美国军队赶到南边去了。现在美国到处霸了地方，它要保护这些地方，力量就分散。苏联要对付的地方也多，欧洲、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中东、南亚、中国、日本、美国，太平洋的美国。它的事情也不好办呢。

〔布迈丁问，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态度如何？〕

准备打仗！准备它们〔美苏〕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谈到中国的成就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时〕

中国成就有一点，但是不大。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有时候工作方法比较好，有时候不大好。如果片面地介绍中国，说怎么好，那是不妥的。当然，说中国是一片黑暗，也是不对的。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时候有黑暗这一面。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就爱吹他的成绩，而不爱把自己的错误讲出来，所以你们要注意。别国大体也是如此，总是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缺点。

地中海是密切关系欧洲的。欧洲安全，阿拉伯世界不安全，地中海问题不解决，那怎么行呢？几十个国家怎么能取得一致？单是欧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如果是听两个大国美国跟苏联，这也不行吧。

〔三〕〔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当尼雷尔提到美苏不是为和平而努力时〕，和平是暂时的，将来就难说了。

总而言之，所谓裁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说要裁军，结果谈出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后又说要裁军，又是几年了，没有一个裁的。但是他们双方都说他们要搞和平，而且是长久的和平，或者是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嘛，大概是半个世纪，五十年吧。何不讲两代人呢？因为这一讲，他的武器就没有销路了。大国都靠出卖武器赚钱。总而言之，我们对“持久和平”这样的口号要看

一看呢。大概一段时间可以，太长了不行，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总而言之，这个全世界是不安定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讲和平，就是因为这样讲对他们比较有利。他们又利用各国人民怕打核战争的心理状况，所以有许多人接受和平的口号。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都讲和平，结果讲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

他们〔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现在有点怕第三世界。

〔尼雷尔说，如果第三世界没有中国，他们就不会怕〕也怕呢。

〔尼雷尔说，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那不能这么讲！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

整个非洲的事情怎么样了？比过去都要好些。就是讲北部和中部非洲。

〔当尼雷尔谈及他们在南部非洲正在努力赢得独立时〕我跟你们意见一致，就是不喜欢南非白人政权控制非洲人民。并说，〔南部非洲〕将来总是要起变化的。非洲的变化已经够快的了。

〔尼雷尔说，中国现在对非洲的帮助是很多的〕，帮助很小。

〔当尼雷尔称赞中国医疗队时〕，应该主要是帮忙教会你们的医生。搞铁路的也应该主要是教会你们勘察、各种建设、修路、桥梁。各种技术人员都这样，我们将来一走，你们就完全可以自己管理了。如果不教，那就不好哩。

听说我们的人在你们那里做了一些坏事。给了赔偿没有啊？有些犯错误的也撤回了吧。人多了，我们教育又不严，势必将来也还要出一些问题。你们发现有什么错误，就告诉我们的大使。

〔尼雷尔称赞中国人员在坦桑人对他们不好时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从不发牢骚〕，不能怪你们。这个不能发牢骚，发牢骚是错误的。

〔尼雷尔谈及他的母亲向我人员送活羊和鸡蛋时〕，收人家礼物不大好吧。以后成为风气不大好。

注释

〔1〕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会见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二月二十五日，会见了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等外宾。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同英国前首相希思的谈话*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英国前首相希思〔1〕的谈话

爱德华·希思：早上好！

毛泽东：好！

希思：见到你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毛泽东：谢谢你，欢迎。

希思：机场的欢迎十分动人，色彩鲜艳，情绪活跃。

毛泽东：嗯。〔面向周恩来〕为什么没有仪仗队？

周恩来：因为照顾他不是现任首相，怕引起误会，使现任首相不高兴。

毛泽东：我看还是要有。

周恩来：走的时候加。

王海容〔2〕：不怕得罪威尔逊〔3〕啊？

毛泽东：不怕！〔面向希思〕我是投你的票的！

希思：我想苏联有很多困难，有经济困难、农业困难，领导内部也有分歧。但是他们领导内部的分歧是在策略和时机问题上，而不是在长期战略的问题上。

毛泽东：我看它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

希思：但是它的军事力量却在不断增长。虽然苏联在世界许多地方遇到了问题，但它的实力正在不断得到加强。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主要威胁。主席是否认为，苏联对中国不构成威胁？

毛泽东：我们准备它来。但是它来了，它就垮台了呢！它只有那么几个兵，你们欧洲人那么怕！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苏联这一股祸水引向中国。你们的老前辈张伯伦〔4〕，包括法国的达拉第〔5〕，就是推德国向东。

希思：我当时是反对张伯伦先生的。

毛泽东：我讲的主要是美国的舆论。你们英国舆论讲到苏联怎么样要进攻中国，我看到的不多，很少。

希思：如果欧洲是软弱的，苏联就有可能实现对中国的企图。因而一个强大的欧洲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苏联发愁。

毛泽东：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

希思：中苏的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主席如何判断苏联对中国的目的和动机？

毛泽东：中苏的分歧要从一九五四年开始算起。因为一九五五年阿登纳〔6〕到莫斯科，赫鲁晓夫〔7〕就对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阿登纳的回忆录上是这么写的。你见过阿登纳吗？

希思：见过，我见过他很多次。有一次他去意大利休假时，我和他谈了一整天。阿登纳总认为苏联会企图接管欧洲。

毛泽东：欧洲、亚洲、非洲，但是它力不从心。

希思：它在非洲很不成功。

毛泽东：丢了埃及。

希思：在阿拉伯世界中，它的影响很小。

毛泽东：在我们这里影响更小呢！

希思：我想在你们这里，毫无影响。

毛泽东：有些影响，林彪〔8〕就是它的人呢。

希思：我能否再问主席一个问题？中美关系今年将如何发展？自从尼克松〔9〕总统访华以来，中美关系似乎停滞了。

毛泽东：那不要紧，还是比较好的。你可不可以劝一下尼克松，帮他一个忙，叫他渡过水门〔10〕难关？

希思：如果他当时征求我的意见，我在十八个月以前就会劝他把这件事彻底压下去，但是他那时没有问我。

毛泽东：他也有缺点呢！

希思：我们都有缺点。

毛泽东：我的缺点更大呢！八亿人口要吃饭，工业又不发达。不能吹中国怎么样。你们英国还可以吹一下。你们算发达国家，我们是不发达的国家。要看他们年轻的这一辈怎么样。我已经接了上帝的请帖，要我去访问上帝。

希思：我希望主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要接受这个邀请。

毛泽东：还没答复呢！

希思：我对刚才主席所讲的很感兴趣。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了，你们的粮食几乎自给自足，工业正在开始发展，可能我们英国能在技术和技能方面向你们提供你们所需的帮助，但主席是如何鼓舞了七亿多人民团结一致这样工作的？

毛泽东：说来话长。但是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

希思：好。我们始终乐于帮助你们。

毛泽东：好，很好。你们的艾登〔11〕现在还在吗？

希思：在，他很好，现在七十六、七岁了。他至今仍对外交事务、国际问题极有兴趣。

毛泽东：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12〕上吃了亏。

希思：是的，吃了大亏。

毛泽东：美国人拆台。美国呢，就是手伸得太长了。你看，它伸到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东南亚、南亚、伊朗、土耳其、中东、地中海、欧洲。

希思：是的，这是美国当时遏制世界其他地区的意图的一部分。现在它已经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那么怕共产主义干什么呢？我看，欧洲、亚洲，包括日本，都不要吵架。要吵呢，可以，不要大吵。

希思：我完全同意。

毛泽东：美国人骂了我们二十多年。

希思：美国人和你们的关系是又爱又恨。现在他们害怕你们的心理减少了，也就更爱你们了。

毛泽东：怕得要死！基辛格〔13〕第一次到北京，好像中国人要吃他。他自己说，第一次很紧张，第二次也还有点紧张，第三次不紧张了。但是我们对美国人比较放心。

希思：我们欧洲对此很高兴。主席对日本比较放心吗？

毛泽东：对。

希思：你们是否相信日本人所说的和平意图？

毛泽东：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是信的。将来很难说。但是我们不怕你们欧洲。

希思：没有理由要怕欧洲。

毛泽东：过去怕呢！

希思：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毛泽东：没有冤仇。过去不仅英国，还有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匈帝国……，八国联军。

周恩来：还有俄国、日本、美国，八个国家代表十二国，那是一九〇〇年。

毛泽东：都成了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14〕。现在我想谈谈香港及其前途。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

希思：希望香港平稳交接。

毛泽东：这也是我想要的，而且一定要办到！我们现在也不谈〔交接细节〕。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转向总理〕九七年时你我都不在了，那是他们〔15〕的事了。

注释

〔1〕爱德华·希思〔一九一六年一二〇〇五年〕，曾于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九日至一九七四年三月四日任英国首相。在任期间，中英两国于一九七二年建交。

〔2〕王海容，一九四二年生，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

〔3〕威尔逊指詹姆斯·哈罗德·威尔逊，一九一六年生，工党领袖，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任英国首相。

〔4〕张伯伦，〔一八六九——九四〇〕，指亚瑟·涅维尔·张伯伦，英国保守党领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任英国首相。一九三八年九月，代表英国

政府同法国、德国、意大利政府首脑签订《慕尼黑协定》，采取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张伯伦下台。

〔5〕指爱德华·达拉第，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任法国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在此期间，执行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一九三八年九月，代表法国政府签订《慕尼黑协定》。一九四〇年德国侵占法国后被监禁，一九四五年获释。

〔6〕阿登纳，一九五五年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7〕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8〕林彪〔一九〇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9〕尼克松，时任美国总统。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同中国方面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10〕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美国共和党内为尼克松筹划竞选连任总统的一些成员，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置窃听器。尼克松连任总统后不久此事被揭发。一九七四年七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根据收集到的证据通过弹劾尼克松的条款。一九七四年八月尼克松被迫辞职。

〔11〕罗伯特·安东尼·艾登〔一八九七—一九七七〕,英国政治家、外交家，英国政治家、外交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英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陆军

大臣、外交大臣和副首相等职。但他在一九五六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企图再次强硬的对待埃及纳赛尔的时候，却招致世界一片反对，最终辞职下台。

〔12〕苏伊士运河问题，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全部财产移交埃及政府。英法为夺得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与以色列勾结，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对埃及发动了突然袭击，这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又称苏伊士运河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西奈战役或卡代什行动。英法和以色列的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苏联宣市：如英法不停火，苏将对英实施核攻击。美国为把英法势力挤出运河区，命令全球美军进入戒备状态，威胁英法。最终，苏伊士战争以英法侵略军的失败告终，其在中东地区数百年殖民统治的传统势力丧失殆尽。苏伊士运河危机不但导致了艾登政府的垮台，英法两国在全球的庞大帝国加速瓦解。此外，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成为真正主宰中东乃至全世界的力量。

〔13〕基辛格，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任美国国务卿。一九七一年七月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第一次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举行会谈，后曾多次来中国访问。

〔14〕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八四〇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一八五六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六〇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一八九八年英国又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

租期九十九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期满。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15〕指在座的年青同志，陪同会见的有周恩来〔七十六岁〕、王洪文〔三十八岁〕、邓小平〔七十岁〕、乔冠华〔六十一岁〕、唐闻生〔三十一岁〕、王海容〔三十六岁〕。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1〕后的谈话要点

关于理论问题，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2〕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3〕。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4〕。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5〕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注释

〔1〕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周恩来、王洪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与周恩来单独长谈，其中讲到理论问题。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周恩来将这次关于理论问题谈话要点整理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一月八日，周恩来将这个谈话要点送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传阅。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要点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要求“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摘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三十三条，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和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

〔2〕春桥，即张春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文元，即姚文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3〕《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全文如下：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张春桥〕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号召全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当前，全国人民斗志昂扬，下定决心，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现实的阶级斗争也要求我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少数人搞清楚不行，一定“要使全国知道”。搞好这次学习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意义，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

早在一九二〇年，列宁根据领导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经验，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

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指出，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特别是列宁自己加了着重号的那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

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们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

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还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

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过，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列宁说得完全对：“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

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三点，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达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

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

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象汪

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对几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几亿农民中，贫下中农占多数，他们从实践中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他们的光明大道。我们党依靠他们团结中农，一步一步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走到人民公社，我们也一定能够引导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曰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类作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亿万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正在迈动着前进的步伐。我们有了二十五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又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经验，只要我们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高级干部带头，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无限光明的远景必将继续鼓舞越来越多的觉悟的工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4〕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5〕《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全文如下：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姚文元〕

毛主席在讲到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林彪一类”的阶级本质是什么？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

复辟，对于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同一切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思潮一样，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基础。

林彪反党集团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诬蔑为“封建专制”，咒骂为“当代的秦始皇”。他们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上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这种疯狂性，反映了丧失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反动派，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剥削阶级的阵地，必然要用尽一切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我们看到了林彪在政治上、思想上破产以后，怎样象一个亡命的赌徒一样想把无产阶级“吃掉”，孤注一掷，直到叛国投敌，毛主席、党中央非常耐心的教育、等待、挽救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反革命本性。这都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但是，这样认识还不是事物的全部。

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正是这后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分析。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林彪反党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就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其中如林立果及其小“舰队”，就完全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及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

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 - - 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林彪反党集团如何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如何穷奢极欲地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为自己干种种见不得人的阴险丑恶的勾当，人们已揭发批判了很多。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反革命政变计划《“571 工程”纪要》，这个计划中，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者说，这个计划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除了老的资产阶级之外，正是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少数想得用资产阶级法权发展资本主义的人。因而它攻击的矛头便对准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而它特别仇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的某些限制。

对于机关干部参加五．七干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失业”；精简机构，接近群众，被他们攻击为打击干部。他们认为干部应当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所以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变成“失业”。这是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有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反对党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等于变相劳改”。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

差别、限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一切革命的人们都热情赞扬它，而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特别是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束缚的人则反对它。能不能支持知识青年同工农结合，直接联系到大学教育革命能不能坚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对此特别仇恨，不但表现了他们同劳动人民的对立，而且也暴露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党进攻，妄图煽动一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纲领是扩大城市同农村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把知识青年变成新的贵族阶层，想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

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受剥削”。林彪是“物质刺激”狂热的鼓吹者，他在黑笔记中就亲笔写下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唯物主义＝物质刺激”、“诱：以官，禄，德”之类的修正主义黑话。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也在黑笔记中写道：“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他们表面上是主张用钞票去“刺激”工人，实际上是想无限止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工人，又妄图把工人阶级中一小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作为支持他们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林彪一伙“特别”注意用“工资”来引诱“青年工人”，所谓“诱：以官，禄，德”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从反面告诉我们：青年工人特别是当了的干部的青年工人，必须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

场，要保持和发扬共产主义的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努力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切不可被商品、货币交换、庸俗的捧场、阿谀奉承、宗派主义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以致上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当。他们以“关心”为名，实则“刺激”青年工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教唆犯”。缺少经验的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前面违法乱纪，老奸巨猾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躲在后面出谋划策，这是今天社会阶级斗争中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处理被腐蚀的青少年罪犯时特别着重打击幕后教唆犯，这个方针要坚持下去。在现实斗争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同资产阶级腐蚀进行旗帜鲜明斗争的青年工人，应当支持他们，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

林彪反党集团还诬蔑农民“缺吃少穿”，诬蔑部队干部“生活水平下降”，诬蔑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那种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精神是“被利用”……这一切，无不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诬蔑农民“缺吃少穿”，其目的是煽动农民搞“吃光分光”，瓦解和取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果照这条路线去做，其结果，是少数人上升为新资产阶级，绝大多数人受资本主义剥削，这是地主、富农和农村中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所盼望的那样一种局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林彪所谓“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招牌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某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和集团，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相勾结，“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类人物则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林彪反党集团在《“571 工程”纪要》中提出的这些纲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们自封为“超天才”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确切地说，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他们反映了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要求，反映了少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的要求，而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然而他们本身反革命思想的形成却必须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说明。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林彪反党集团，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视各地的谈话中说过：“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列宁说过：“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列宁说的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毛主席说的是这种斗争反映在党内而形成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经过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行动，才能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而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要完成的伟大事业。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林彪反党集团即具有这种政治特点。“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是《红楼梦》刻画“应酬权变”而又野蛮毒辣的孙绍祖的两句诗，用来移赠林彪反党集团，是

颇为适合的。当林彪在“得志”即掌握一部分政治经济大权之前，他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欺骗党、欺骗群众，并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为此他可以打出革命的招牌或喊出革命的口号，同时又加以歪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写的一封信中分析林彪一伙的内心世界时指出：“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是很能说明这种现象的。“借助”，就是敲门砖，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后，便不要这个“借助”，而要反过头来恶狠狠地搞掉这个“借助”了。反革命两面派也好，或者用林彪反党集团自己招供的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也好，都是同一类做法的不同说法。等到林彪反党集团如他们自己刻画的那样，自以为“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时，他们就要猖狂起来了。他们在自己把持、控制的单位、部门，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林彪反党集团私有制，他们暴露出越来越露骨的政治野心，这种野心会随着他们“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时说过：“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林彪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的灵魂也只是已被打倒而梦想复辟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老的和新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从阶级分析出发，林彪一伙那些倒行逆施的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根源便很清楚了：他们鼓吹孔孟之道，他们背叛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靠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尊孔卖国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干过的勾当，而他们狂热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也不过重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过无数次并至今还在使用的手段罢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方而要逐步地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当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及时地识别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性就在这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不可能完成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而且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由于自己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分辨不清而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不然，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出来会有人跟着走呢？为什么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用唯心论加起哄来骗人呢？为什么林彪反党集团那些赤裸裸的分裂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会在少数干部中找到市场呢？为什么大、小“舰队”可以明目张胆地把请客送礼、封官许愿之类作为拉山头、搞宗派、耍阴谋的手段呢？为什么他们在黑笔记中要把“用技术掩盖政治”之类作为自己反革命活动的策略呢？这当中有深刻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强调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员，“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强调“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又再次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最近讲无产阶级专政时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条。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啊！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把这件事当作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对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和主要著作，首先要自己学好，搞清楚，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力求从思想和行动上打掉那些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善于分辨和敢于抵制资本主义的腐蚀。我们党几十

年来形成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发扬和继承下去。要了解情况，研究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行之有效，必须坚持。要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极少数坏人，对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影响，要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主要采取学习和提高觉悟的方法，支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的方法，回忆对比的方法，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形成舆论，争取多数，启发自觉，积极引导。对个别陷在资本主义泥坑里很深的人，要向他猛喝一声：“同志，赶快回头！”

我们在文章开头时曾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全国人民中是很孤立的。为了分析它产生的阶级根源，我们指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在讲了这一面之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本质上是很虚弱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纸老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只不过记录了它的失败和困境，而不是记录它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二十五年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坚持毛主席给我们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一步一步地减少这些痕迹，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我们今天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四分五裂、内外交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次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必将

从理论实践上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大大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促地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中国的共产党人是有信心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有信心的，他们正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是革命人民经过曲折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也是反动派经过反复较量走向灭亡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总结的那样：“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吧！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对在押国民党战犯、党政军特人员一律释放*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对在押国民党战犯、党政军特人员处理意见的批语

〔一〕〔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日〕〔1〕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2〕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

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3〕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二〕〔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4〕

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就业的，转别地就业。如何，请酌定。

注释

〔1〕本篇曾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印发，分送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意见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

议，并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华国锋所作的说明。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三月十八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在《人民日报》公布。十九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大会，宣布特赦释放的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人名单，并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至此，在押的战犯全部处理完毕。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后，有十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申请去台湾与家人团聚。他们的申请很快就得到了批准，政府有关部门还帮助他们办理赴港手续，发给他们适合香港情况的服装和足够的费用，并指定香港中国旅行社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但是，台湾当局却认为这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回台的十人是共党派去的“间谍”和“统战分子”，因而拒不接纳，并声明“绝不上当”。由于台湾当局的极端恐惧和百般阻挠，申请回台的这十个人终于没能与家人团聚，最后有四人去了美国，两人留在了香港，三人返回大陆，一人自杀身亡。

〔2〕这句话指解放战争中锦州战役、大虎山战役、沈阳战役、长春战役中还有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战犯没有列入当时送审的一份特赦释放在押战犯的名单。

〔3〕当时送审的一份有关释放在押战犯的报告中讲到，拟给释放的每位战犯发十五元零用钱，但不开欢送会。另有十三名罪大恶极的战犯拟继续关押，不予释放。

〔4〕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报送的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的《对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说，

我们对各地在押的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进行了调查摸底，并于最近召开了清理工作会议。现将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全国现押的这类人员有三百四十一名，刑满就业的有六百一十二名。

〔二〕在现押的这类人员中，拟对其中以历史罪或主要以历史罪判刑的二百三十二名予以清理释放。因现行罪逮捕判刑的一百零九人，这次不予清理。

〔三〕对清理释放人员，要给予妥善安置。

1、发给释放裁定书，同时宣布摘掉帽子，给公民权。

2、有家的回家，无家可归的、自愿留下的由原劳改单位安置。愿回台湾的可准予回去，并提供方便。

3、释放时发给衣被和零用钱，安置回家的发给路费，回家后生活有困难的酌情予以补助。

4、生活和教育问题由当地民政部门和基层组织负责，其中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的，由统战部门负责，并酌情安置工作。

〔四〕对刑满就业的人员，拟同时清理。除表现很坏的以外，均可摘掉帽子，给公民权。清理后的去路同对待在押犯的原则一样。

〔五〕对因历史罪判刑在押的三千三百多名和已刑满就业的一万名相当于县团级以上人员的清理，将经过调查研究，参照上述精神予以考虑。

毛泽东的批语，写在邓小平的送审报告上。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十五日至十八日，各地司法机关先后召开了宽大释放大会。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关于《水浒》的评论*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学习《水浒》〔1〕的谈话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2〕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3〕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

俅〔4〕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5〕。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6〕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

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注释

〔1〕《水浒》，即《水浒传》，又称《忠义水浒传》，明初小说家施耐庵根据《大宋宣和遗事》及有关话本与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加工整理而成。主要版本有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刻本《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本；明杨定见刻本《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清金圣叹评点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七十一回本。

这三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都出过重排本。

〔2〕晁盖，《水浒传》中梁山早期领袖。

〔3〕宋江，《水浒传》中为第一号人物，为梁山起义军领袖，力主接受招安，并最终导致了起义军和他自己的悲剧命运。

〔4〕高俅，《水浒传》中朝廷方代表，反面角色，贪官污吏。

〔5〕方腊，《水浒传》中另一支农民起义军。

〔6〕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反对招安。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中美关系会一点点好起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美国总统福特时的谈话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今天早上有一次很不错的讨论。

毛泽东：你们讨论什么？

福特：我们讨论了我们同苏联之间的问题，还有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对策，以及我的国家和你的国家有必要合作，去实现那些对我们两国都有利的目标。

毛泽东：我们没有这种本事，我们只能放放空炮。

福特：我不相信，主席先生。

毛泽东：如果说到骂人，这种本事我们倒是有一点。

福特：我们也能。

毛泽东：你们也能？那么我们应该达成一项协议。

福特：我们还可以使用武力，对付那些制造麻烦的国家。

毛泽东：这个不坏。那么我们可以达成另外一项协议。

福特：今天早上，我们讨论的时候，有很明确的讨论目标。

毛泽东：除了苏联帝国主义者，不可能是别人了。

福特：主席先生，今天早上，我们使用了一些很强硬的语言。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1〕〕：你们批评他了？

福特：我们强烈批评的是另外一个国家。

毛泽东：那个在北面的国家。

福特：对。

毛泽东〔对驻美大使黄镇〕：黄镇〔2〕同志，事情怎么样了？你还回美国吗？

黄镇：我听从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总统先生，你们要他吗？

福特：我们当然要他回去。我们的关系好极了。大使先生回美国是很重要的，就像〔驻华大使〕布什〔3〕先生要是留在北京一样。

毛泽东〔对布什〕：你留在北京吗？

布什：只有几天了。

毛泽东：你升职了。

福特：对，他升职了。我们将在一个月里，提名继任者。

毛泽东：我们不想让他走。

福特：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所以我要他回美国。但我们会找一个同样好的人来接替他。

毛泽东：那样挺好。我觉得，黄镇同志返回美国更有利。

黄镇：我将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我确实想回国，因为我驻外太久了。但是我将按照主席说的做。

毛泽东：你应该再在那里待一到二年。

黄镇：好的，我肯定会回去，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有一些年轻人批评他〔指黄镇〕。这两个年轻人〔指在场的两个翻译唐闻生、王海容〕对乔老爷〔4〕也有一些批评。不能忽视这些人啊，否则你会在他们身上吃苦头的。这是一场内战。现在外面有很多大字报出来。你不妨去清华和北大看看。

福特：我不太明白这些东西。主席先生，我希望，你让大使回美国再待两年，意味着我们还能继续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毛泽东：对，对，我们之间的关系还要继续发展。我觉得，现在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什么大问题，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今年、明年、后年，可能都不会有大问题发生在我们两国之间。以后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好一点吧。

福特：主席先生，我认为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应对来自诸如苏联那样国家的挑战。

毛泽东：对，我们对苏联一点信心也没有。邓小平同志也不喜欢苏联。

福特：我们也是这样。他们在全世界扩张，掠夺领土和经济资源。我们必须面对他们的挑战。

毛泽东：好。我们也要面对挑战。

福特：我们希望从明年开始，我们的双边关系可以得到改善。我们认为，现在正是我们两国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时候。

毛泽东：你是说我们两国之间？

福特：对。

毛泽东：那样很好。

福特：主席先生，如果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一起合作，应对来自苏联的挑战，那么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就会在我的国家得到支持。

毛泽东：很好。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是说说而已，苏联到底怎么行动，还需要观察。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必须让苏联对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作留下深刻印象，言辞是不起作用的，必须有实际行动。我们将不断对他们施加压力。我希望，来自您的压力，和我们的压力一样强大。

毛泽东：我们就是放放空炮，骂骂人而已。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将要做的就不止与此了，过去也是如此。美国人民希望他们的总统坚强有力。我们将来就会这样行动。而不是只说不做、放空炮。

毛泽东：你们有实心炮？

福特：对，我们将一直准备火药，如果他们来挑战我们，那么我们的火药就不会闲着。

毛泽东：很好，那样也不坏。不过，现在你们是和平共处。

福特：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会对任何扩张主义行为坐视不管。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应对这些挑战了，并将继续如此。

毛泽东：那样很好。我们需要签署协议吗？

福特：对，我们可以一起努力，达到同样的效果。你从东边施加压力，我从西边施加压力。

毛泽东：可以。这是君子协定。

福特：这是最好的取得成功的方法，对付那些不是君子的小人。

毛泽东：他们是小人。

福特：我们今天早上用的词，比这个还要强烈。

毛泽东：我非常感谢总统先生来看我。我希望未来我们两国能够更加友好。

福特：主席先生，这正是美国人民和我本人的真诚愿望。我希望你们清楚地了解，过去三年来，我们两国之间历史性的行动是得到美国人民全力支持的。美国人民像我们一样，认识到必须采取强力行动，阻止苏联那样的扩张主义国家。我们将维持我们的军事力量，并且准备使用它。在我们看来，这是让世界稳定和发展的最好方法。

毛泽东：好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福特：很正确。如果我们之间有矛盾，我们就会坐下来谈判，试图互相理解和消除矛盾。

毛泽东：很好。我们两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矛盾总是存在的。

福特：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之间的紧密合作，这对我们两国和所有人都是有利的。

毛泽东：举例来说，我们和苏联之间就没有我们和你们之间这样的谈话。我去过苏联两次，赫鲁晓夫〔5〕到过北京三次。没有一次谈话是真的令人满意的。

福特：主席先生，我与勃列日涅夫〔6〕先生见过两次。有时谈得很顺利，有时谈得不好。我想这正是我们坚定态度的一种外在表现，我们没法同意他们的有些提议，将来也不会同意。我们将保持坚定，维持军事力量。他们理解这一点，我想对我们两国最有利的方法就是，我们一起采取坚定立场。这正是我们打算要做的事。

毛泽东：好的。

毛泽东：你们现在同日本的关系怎么样？比以前好吗？

福特：对，比以前好。主席先生，正如你所知，我大约一年前访问了日本。这是美国在任总统第一次访问日本。大约一个月，日本天皇和皇后访问了美国，这也是他们的元首第一次来我们的国家。我们感到，美日关系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好时期。

毛泽东：日本也受到苏联的威胁。

福特：我同意这一点，因此，主席先生，我认为中日关系的不断改善很重要，就像美日关系在不断改善一样。事实上，美日关系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

毛泽东：对日本来说，同你们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同我们的关系是第二位的。

福特：你们同日本的关系好吗？

毛泽东：不算很糟，但也不是很好。

福特：你们希望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对吗？

毛泽东：对。他们国内有亲苏派，反对谈论霸权。

基辛格〔6〕：也可能是害怕谈论。

毛泽东：正是这样。

福特：你们同西欧国家的关系怎么样，主席先生？

毛泽东：比起我们同日本的关系，好太多、太多了。

福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同西欧、以及你们同西欧都保持良好关系，这样才能应对任何苏联在西欧的扩张。

毛泽东：对，对，这是我们同你们的一个共同点。我们同欧洲国家没有利益冲突。

福特：主席先生，事实上，我们中有些人相信，中国比有些欧洲国家更能使得欧洲保持团结，使得北约加强力量。

毛泽东：他们心不齐。

福特：有些欧洲国家不像表面上那样强大和坦率。

毛泽东：我觉得瑞典不坏，西德也不坏。南斯拉夫也很好。荷兰和比利时就稍微差一点。

福特：很正确。苏联正在设法利用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弱点。我们必须阻止它，我们打算这样做。

毛泽东：对，现在葡萄牙看上去更稳定一些了。形势好像在朝好的方面发展。〔8〕

福特：过去四十八小时里，形势发展很令人鼓舞。我们支持的一方正在得势，采取行动稳定局势。我们同意你的看法，南斯拉夫是重要的，在抵抗苏联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很关注，铁托〔9〕逝世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毛泽东：对。也许铁托之后会是卡德尔〔10〕。

基辛格：但是，我们关注的是国内外可能产生的反应。我们正在着手做这件事。不同的因素都会对外部集团产生影响。

毛泽东：对，南斯拉夫有许多省，它是由很多以前的小国家组成的。

福特：主席先生，今年夏天，我到罗马尼亚进行了一次有趣的旅行。我对齐奥赛斯库〔11〕总统的力量和独立性，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很好。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对西班牙的局势也很关注。我们支持西班牙国王。我们希望，他能够处理好那些破坏西班牙王国的因素。我们将和他一起工作，在这个转变时期，争取对局势最基本的控制。

毛泽东：如果欧洲共同体〔12〕吸纳西班牙，我们觉得，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件好事。欧洲共同体想要西班牙和葡萄牙吗？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正在敦促北约对西班牙更友好一些，哪怕法国反对这样。我们希望，在新国王的领导下，西班牙能够更容易被北约接受。此外，我们感到欧洲共同市场应该对西班牙政府有更多的回应，朝着西欧一体的目标努力。我们将在这两个方向上，尽我们所能。

基辛格：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不够激进。

毛泽东：是这样吗？对了，以前他们总是打来打去的。还有，以前你们不骂法国。

福特：对，我们支持西班牙新国王。因为西欧的南部必须保持强大，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南斯拉夫。如果我们要抵御苏联的扩张主义，这些国家都必须得到增强。

毛泽东：好的。我们认为希腊应该变得比现在好。

福特：对，他们经过了一段困难的日子，我们感到新政府正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我们会帮助他们的。我们希望最终他们会回到北约，成为一个成员国。

毛泽东：那样不错。

福特：当然，希腊有一些激进的想法，从我们的观点看，不是很好，会削弱北约，给苏联以可乘之机。

毛泽东：是吗？！

福特：让我们看看中东地区，主席先生。我们认为西奈协议〔13〕有助于减少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但是我们也认识到必须尽快实现该地区的广泛和平。等到下一次美国大选一结束，我们就将努力争取实现该地区广泛的和持久的和平。

毛泽东：持久和平很难做到。

福特：对，几百年来他们都无法实现和平。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实现它，一旦成功，就将消除苏联在该地区的大部分影响。如果局势保持停滞，那么苏联就有机会制造麻烦。因此，我们相信必须不断前进。西奈协议有助于我们同埃及实现良好关系。在下一次大选后，如果我们继续前进，争取更大范围的和平，这对将苏联的影响赶出该地区就会有重大影响。

毛泽东：我不反对那样做。

福特：关于南亚次大陆，我们希望通过在迪戈加西亚岛的基地保持我们的影响。当然，我们将不断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我们已经取消了对他们的武器禁运，所以他们自己可以想办法发展足够的军事力量，使得印度相信，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值得尝试。

毛泽东：那样很好。

福特：主席先生，你对孟加拉国的局势有何看法？

毛泽东：那里的情况正在变好，但还不稳定。我们准备派个大使过去。也许他需要不少时间才能到那里。

福特：你是否感到担忧，印度可能会插手，对孟加拉国采取军事行动，取得主导权？

毛泽东：有这种危险。我们必须警惕。

福特：主席先生，印度总是会做一些不明智的事情，反对其他国家。我希望他们不会在孟加拉国上面犯错误。

毛泽东：确实如此。如果他们在那里采取行动，我们将会反对他们。

福特：我们正在同巴基斯坦和伊朗合作，阻止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谴责任何印度的此类行动。

毛泽东：好，我们又达成了另一项协议。

福特：我肯定你同我们一样，很关心苏联在印度洋的存在，以及他们在东非的活动。这一类举动，我们都强烈反对。我在这里特别要说一下安哥拉〔14〕，我们正在那里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防止苏联在那里得到一个在非洲大陆上的据点。

毛泽东：你们看上去没什么办法，我们也没有。

福特：主席先生，我想我们双方都可以做得更好。

毛泽东：我赞同把苏联赶出去。

福特：如果我们一起好好努力，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

毛泽东：可以通过刚果和扎伊尔的金沙萨。

邓小平〔对毛泽东说〕：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南非，它会卷进来。这会触怒整个黑非洲。这使得整个事情都变复杂了。

毛泽东：南非名声〔15〕不好。

福特：但是他们正在阻止苏联扩张。我们觉得这是令人钦佩的。我们给了赞比亚和扎伊尔许多钱。我们想象，如果我们自己采取行动，并且中国和其他国家

也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防止苏联获得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防止他们控制安哥拉的主要资源。我们强烈反对古巴的介入。现在，他们在安哥拉有五六千人。我们觉得这不是好事。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苏联。

邓小平：你的意思是，你们钦佩南非？

福特：不。他们强烈反对苏联。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件事美国没有插手。

邓小平：在安哥拉。

福特：南非反对安哥拉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这个问题需要研究。

福特：刻不容缓。

毛泽东：我觉得安哥拉人民解放军不会成功。

福特：我们也希望他们不会成功。

基辛格：如果其他两个派别足够训练有素，我们就可以提供他们武器。这样我们就能防止安哥拉人民解放军获胜。那两个派别需要得到训练，需要理解游击战。我们可以提供他们武器，但是需要其他人训练他们。

毛泽东：过去，我们通过坦桑尼亚支持他们。但是坦桑尼亚会扣留某些东西。也许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扎伊尔。

邓小平：可能还是通过扎伊尔比较好。

基辛格：那就通过扎伊尔。中国方面也许可以使用它和莫桑比克的影响。对于非洲来说，如果莫桑比克反对苏联集团和安哥拉人民解放军，那么就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福特：但是，你知道，莫桑比克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军。这可能很难吧。

邓小平：不可能的事。

基辛格：我知道。不过他们可能不理解他们正在干什么，因为他们非常尊敬中国。

毛泽东：我们可以试一下。

基辛格：我不觉得莫桑比克理解安哥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需要有人给他们提建议，他们更愿意听中国的话，而不是我们的话。

毛泽东：我们可以试一下。

邓小平：我们可以试，但是不太可能成功。

基辛格：确实如此。

毛泽东：扎伊尔可能更可靠一些。

基辛格：扎伊尔应该成为一个提供支援的基地。我们从莫桑比克得不到帮助，但是也许他们会置身事外。我们不指望从莫桑比克得到帮助，但是可能他们至少会保持中立。

毛泽东：我们试一下。

福特：我要再说一次，刻不容缓。因为其他两个派别需要得到支援。直到不久前，他们都做得很好。目前，局势陷入僵局。如果在我们、你们和其他国家做出努力之后，安哥拉人民解放军依然占据优势，那将是一场悲剧。

毛泽东：这很难说。你觉得事情就是这样了？

福特：我可能会说，对于安哥拉就是这样。在动身离开华盛顿前，我刚刚批准对那两个派别提供三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将面对苏联的挑战，击败安哥拉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好的。

福特：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讨论世界局势，表达了我们发展双边关系、在许多问题上一起合作、解决许许多多世界冲突的愿望。

毛泽东：对，现在有一些记者说，我们两方的关系非常坏。也许你应该向他们透露一些消息，给他们一些内幕。

基辛格：这需要双方努力。他们在北京也打探到了一些消息。

毛泽东：但是这与我们无关，是一些外国人透露出去的。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不相信报纸上的话。我想，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两个国家要一起给全世界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我们的关系很好。当我返回美国的时

候，我就会说我们有很好的关系。我希望你的人也这样做。重要的不仅仅是我们两方关系好，而是还要让世界相信我们的关系好。

毛泽东：我们会一点点来的。

福特：我们也会努力的。

毛泽东：那就这样吧。

注释

〔1〕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黄镇，一九七三年五月中美两国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黄镇任驻美联络处主任。

〔3〕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又称老布什，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后在一九八九年一月至一九九三年一月期间，担任美国第四十一届总统。

〔4〕乔老爷，指乔冠华，时任外交部长。

〔5〕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九六四年下台。

〔6〕勃列日涅夫，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7〕基辛格，时任美国国务卿。

〔8〕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葡萄牙左派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持续四十二年的萨拉查法西斯专制统治，开始民主化进程。在政变期间，军人用康乃馨花来代替枪中子弹，又称“康乃馨革命”。一九七五年政府宣布放弃非洲殖民地

的管辖权，一九七六年举行第一次选举，选出了首相，实现了葡萄牙的自由民主化。

〔9〕铁托〔一八九二——一九八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者。他反对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为南斯拉夫赢得了国际尊重。一九九一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和马其顿四个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通过新宪法，宣布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联合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正式解体。

〔10〕爱德华·卡德尔，南斯拉夫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时任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副主席兼外交部长。一九七九年去世。

〔11〕齐奥赛斯库，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

〔12〕欧洲共同体，西欧国家推行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并具有一定超国家机制和职能的国际组织。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起来，称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欧共体向欧洲联盟的前身。

〔13〕一九六七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此后，美国为了排除苏联在中东的影响，致力于撮合埃及和以色列进行关于西奈半岛问题的和平谈判。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埃及和以色列关于西奈的协议签字。这是继一九七四年一月埃以达成两国军队脱离接触协议之后，关于西奈问题的第二项协议。在协议中，双方都作出了让步。以色列将从西奈部分领土上撤走并放弃了结束战争状态的要求。埃及则同意对以色列的非军事物资开放苏伊士运河。

〔14〕安哥拉，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安哥拉人民为反抗葡殖民统治，先后成立了三个民族解放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安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并于六十年代相继开展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葡萄牙爆发了“康乃馨革命”,推翻了萨拉查法西斯专制统治,新政府宣布放弃殖民主义政策。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五日，上述三个组织同葡政府达成关于安哥拉独立的《阿沃尔协议》，并于一月三十一日同葡当局共同组成过渡政府。不久，安人运、安盟和安解阵之间发生武装冲突，过渡政府解体。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安人运成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安解阵和安盟则成立了安哥拉人民民主共和国。同日，安两派三方武装冲突扩大为全面内战。安人运受苏联支持，另外两个派别受美国与南非支持，国内仍持续呈现战争状态，直到二〇〇二年四月四日签订停战协定，才结束了长达二十七年的内战。

〔15〕南非共和国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九〇年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这个制度对白人与非白人〔包括黑人、印度人、马来人、及其他混血门族〕进行分隔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给予歧别待遇。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不但引发国内的反弹与抗争，更引发国际社会的攻击与经济制裁；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宣布：种族隔离违反国际法原则，特

别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是危害人类的罪行。凡是有种族隔离行为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即为犯罪。缔约国承担义务，禁止、预防并惩治犯有这种罪行的人。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祝贺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救国战争取得胜利*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二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祝贺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救国战争〔1〕取得胜利的电报

〔一〕毛泽东等祝贺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完全解放金边的电报〔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

柬埔寨国家元首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

宾努亲王，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兼国防大臣

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

乔拉潘先生阁下：

在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的强大攻势下，金边已经完全解放。捷报传来，人心振奋。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英雄的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和全体柬埔寨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五年前，美帝国主义阴谋策划了朗诺叛国集团的反动政变，甚至悍然出兵柬埔寨，妄图把一个独立、和平、中立的柬埔寨变为它的殖民地。富有光荣反帝革命传统的柬埔寨人民不畏强暴，揭竿而起，团结在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周围，进行了整整五年英勇顽强的战斗，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柬埔寨人民通过武装斗争所取得的

这一伟大胜利，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只要坚持正确的道路，弱国就一定能够打败强国，小国就一定能够打败大国。

柬埔寨人民在长期武装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顽强革命精神和大无畏英雄气概，为世界革命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赢得了各国人民的钦佩和赞扬。柬埔寨人民的伟大胜利，不仅为印度支那人民的反帝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有力地鼓舞和推动着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柬两国人民是亲如手足的兄弟。我们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斗争中一贯互相同情、互相鼓舞、互相支持，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中国人民对柬埔寨人民的胜利就像对自己的胜利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可以相信，在今后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你们站在一起，共同前进。

金边的解放，标志着柬埔寨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深信，柬埔寨人民在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旗帜下，加强整个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大团结，继续英勇奋斗，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柬埔寨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于北京

〔二〕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军民彻底摧毁南越傀儡政权解放西贡的电报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

西贡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阁下，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阁下，

河内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越南南方军民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战，彻底摧毁了南越傀儡政权，终于解放了西贡。这是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坚持长期革命武装斗争的伟大胜利。喜讯传来，中国人民感到无比欢欣鼓舞。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向越南南、北方全体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英雄的越南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高举胡志明主席“决战决胜”的光辉旗帜，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进行了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和“越南化”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巴黎协定签订之后，越南人民在新的形势下，对于西贡傀儡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破坏巴黎协定、拒绝实现民族和睦、疯狂屠杀人民的罪行，进行了坚决的自卫反击战，终于以革命战争打败了反革命战争，取得了完全解放越南南方的辉煌胜利。你们的胜利，开创了越南解放新的时代，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你们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一切斗争中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为全世界人民的反帝革命事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越南人民的胜利，再次有力地证明，一个国家的人民，哪怕是一个小国的人民，在维护祖国独立、自由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中，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怕挫折，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打败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取得斗争的最终胜利。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两国人民是患难过去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在今后的岁月里，中国人民仍将坚定不移地同越南人民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衷心祝愿越南南方人民在继续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一个独立、自由、统一、繁荣的新越南一定实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于北京

〔三〕毛泽东等祝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电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

老挝最高人民议会主席

苏发努冯阁下，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

凯山·丰威汉阁下：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及你们荣任共和国主席、最高人民议会主席和政府总理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老挝人民革命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老挝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是老挝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光辉成果。几十年来，英雄的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不畏强敌，不怕困难，坚持武装斗争，经过艰苦曲折的道路，终于战胜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内极右反动势力，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老挝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你们的胜利，不仅对印度支那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有力地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

中老两国是亲密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革命斗争中同甘苦，共患难，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中国人民对老挝人民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看作是自己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相信，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必将把老挝建设成独立、民主和繁荣的国家。我们祝愿，中老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注释

〔1〕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救国战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维护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法斗争胜利不久，美国破坏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协议》，于一九五五年十月在越南南方策动亲美势力废黜亲法的保大皇帝，建立吴庭艳傀儡政权，制造了正式分裂越南的局面。一九五九年起南越人民开展武装斗争。一九六〇年上半年，南越西南部游击区已连成一片，农村建立起基层革命政权。同年十二月二十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美国为长期霸占南越，从一九六一年起发动由美国出钱、出枪，越南出人的“特种战争”。南越人民在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粉碎美伪军的“全面进攻”、“重点扫荡”。到一九六四年底，歼灭和击溃包括三千多名美军在内的几十万敌军，摧毁敌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战略村”，解放三分之二以上的南方地区。

美国发动的“特种战争”彻底失败后，于一九六四年八月初制造“北部湾事件”，以北越鱼雷艇袭击美舰为借口，对越南北方进行狂轰滥炸。翌年起大批美军直接参加侵越战争，将“特种战争”升级为“南打北炸”为特点的“局部战争”。越南北方军民边生产边战斗，全力支援南方同胞抗战。南方军民英勇战斗，连续粉碎敌人的旱季攻势。虽然美国派遣部队陆续增加到五十多万，仍无法取胜。

一九六八年三月，约翰逊政府被迫宣布部分停止对北越的轰炸。五月，越美在巴黎举行会谈。十一月，美国宣布完全停止对北越轰炸，“局部战争”失败。

一九六九年起，尼克松政府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为在欧洲和中东集中对付苏联，决定收缩力量，从南越逐步撤退，采取“以越南人打越南人”的“越南化”策略。美国侵略越南的同时，在老挝扶植亲美势力，把老挝划入“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的“保护”范围。老挝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在爱国战线党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屡次打败敌人武装进攻。一九六四年四月，美国策动右派政变。五月美国飞机轰炸解放区，直接进行武装干涉。一九六五年三月，爱国战线党和爱国中立力量举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至六十年代末，老挝人民解放军英勇抗战，解放区迅速扩大。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后，柬埔寨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坚持推行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开始轰炸柬埔寨，柬美断绝外交关系。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美国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乘西哈努克出国访问之际发动军事政变，颠覆王国政府。四月，派遣近十万名美军和西贡伪军入侵柬埔寨。柬埔寨人民立即拿起武器，奋勇抵抗。至此美国把侵略战火扩大到包括柬埔寨在内的整个印支三国。为了联合抗美，印度支那三国四方领导人于一九七〇年四月举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会议号召印支人民加强团结，英勇战斗，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同年五月，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成立。经过五年艰苦战斗，柬埔寨爱国军民消灭大量美国侵略军和伪军。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爱国武装力量解放金边，四月十九日宣告全国解放。柬埔寨抗美救国战争首先取得胜利。

在越南战场上遭到惨败的美国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签订《巴黎协定》，同意结束战争，撤出在越南的美军及其盟国全部军队。但美仍在南方支持阮文绍集团。一九七五年四月，南方军民发起总进攻，四月三十日解放西贡。五月一日，十七度线以南的国土全部解放。抗美战争胜利结束，越南举行全国普选，产生了统一的国会。一九七六年七月二日，越南正式宣布南北两方实现统一，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老挝爱国军民在坚持进行武装斗争同时，为寻求和平解决问题进行不懈努力。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老挝爱国力量代表和万象政府代表签订《万象协定》，老挝人民一面巩固发展解放区，一面打击右派势力军事冒险行动。一九七五年五月以后，老挝人民在越、柬人民胜利的鼓舞下，展开全国范围的夺权斗争。八月底斗争胜利完成。十二月一日，老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万象举行，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至此，印支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对天安门事件的指示*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听取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指示

毛远新〔1〕：我汇报了四月五日、六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性质变了，应还手，并配备了木棍。

毛泽东：谁人建议的？陈锡联〔2〕？

毛远新：好像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3〕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毛泽东：好。

毛远新：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都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毛泽东：〔点头〕嗯。

〔当我谈到政治局六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华国锋〔4〕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5〕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发个文件——〕

毛泽东：公开发表。

毛远新：登报？

毛泽东：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指了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份〕，吴德讲演〔6〕等。

毛远新：市委报告不发了？

毛泽东：不发。并据此开除邓〔7〕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毛远新：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毛泽东：〔点头〕嗯！

毛远新：由中央作决议，也公开发表？

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毛远新：好。上次会议，春桥〔8〕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9〕。

毛泽东：〔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用力挥手〕〔11〕

毛远新：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毛泽东：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要约苏振华〔10〕。

〔我把除邓、苏以外的政治局同志的名单列出，送主席看。〕

毛泽东：叶〔12〕不找。

〔我把叶剑英划掉。问：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毛泽东：好。华国锋任总理。

毛远新：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毛泽东：对。

毛远新：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毛泽东：〔挥手〕快，谈完就来。

〔下午〕

毛泽东：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13〕

注释

〔1〕毛远新，一九七五年九月后，毛泽东病重，他到中央担任联络员，负责与政治局的沟通。

〔2〕陈锡联，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3〕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卫戍区党委第一书记。

〔4〕华国锋，时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5〕北京发生的事，指天安门事件，“四五”事件，四月六日凌晨，毛远新给毛泽东写了如下的报告：

主席：

五日夜到六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同志首先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今天〔五日〕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二百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四千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他们早上六点就来了，提出 1.要花圈；2.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

总计：

伤：一百六十八人，其中：民兵六十一人。

战士：五十二人，公安人员五十五人。

重伤：十五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红楼。烧自行车一大堆。

查出一个地下"新造反委员会"。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的战士及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三十八个人，前天捉了三十九个，大部分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刘传新同志说：这次事件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小平〕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诵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青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里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够立案侦察的有三百多起，反动的东西共三百四十多件。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我们的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部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卫戍区司令吴忠同志说：

现在已准备了三万多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集结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历史博物馆两个营，

小红楼一个营，

中山公园一个营，

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个营，

市委机关一个营，

人大会堂一个营，

西单拘待所一个营，

市公安局一个营。

另外，还有三、四个师驻扎近郊待命。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上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没〔被〕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全烧死。楼上有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同志〔中央委员〕，有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他们从后门跳窗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还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

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

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的发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胜利。

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却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不行就动枪。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毛远新

四月六日三时

〔6〕吴德讲演，指一九七六年五日下午六时广播的《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全文如下：

“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予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请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

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晚十一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7〕邓，即邓小平。

〔8〕春桥，张春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9〕纳吉，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数十万人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匈牙利进行全面改革、纳吉重新出任政府总理和苏联驻军撤离匈牙利等要求。当晚，这场示威游行演变成群众武装暴动。深夜，匈牙利政府宣布改组，由纳吉出任总理。纳吉政府坚决要求苏联立即撤军和恢复多党制。苏军出兵镇压。匈牙利十月事件很快被全面镇压下去。纳吉被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罪”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被绞死。

〔10〕苏振华，时任海军第一政委、海军党委第一书记，上将，在解放战争中参与了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是邓小平的老部下。

〔11〕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通过错误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12〕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平反的倡议者，一九七五年积极配合邓小平的新政策。

〔13〕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通过决议《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后事交代*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部分政治局委员〔1〕的谈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2〕！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外交不成就动荡外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注释

〔1〕当时在场的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海容。

〔2〕以当年美国人的一个角度来为毛泽东时代做个注释，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旅行团成员、美国天主教《圣十字》季刊主编威廉·文·埃登·凯悉访华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毛的中国是个奇迹，但还不是天堂》，一九七六年九月五日出版，现摘要如下：

我作为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发起的由十二人组成的旅行团成员之一，在中国的广州、南京、杭州、上海、北京五大城市以及部分郊区，进行了为时三个星期的参观访问。这次访问虽不能使我取得象一个中国通或关于中国问题职业观察家的那种资格，但这次经历，可以帮助我更正确地观察和理解今天的中国。

在整个旅行过程中，我对新中国人民可贵的道德风尚感触最深。中国人热诚友好、勤劳、聪明和勇敢、有献身精神、有良好的纪律，他们可以信赖和靠得住。

在我的访问旅程中，我特别作过一番努力，想了解中国的宗教现状。我得以会见一些当地中国的宗教各教派的领导人：在杭州的一位伊斯兰教的阿訇，在上海的一位基督教牧师，在南京的一位圣公会退休主教以及在北京的天主教主教和神职人员。从我能够搜集到的每一项意见中，按我看，显而易见，全部宗教，特别是带有组织形式的宗教，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外国的还是本国的，已经几乎完全地从中国生活和思想中消失了。找不到地下宗教活动的任何证据，所以谁也不能讲那里是否具有任何重要意义的个人宗教信仰或活动。

过去二十五年来，由于反对共产党中国的美国院外活动集团无休止的宣传机器所助长的普遍看法，美国人曾经把中国宗教的衰亡归因于一个无神论者政府的无情的镇压。这种看法毫无事实根据。无人否认共产党领导人是无神论者，他们不把宗教置于重要地位，而且尽最大努力不让它扩大影响，特别在青年中间。但是他们的总的政策与其说是迫害宗教，毋宁说是忽视宗教。对他们来说，宗教不是那么重要。显然，对中国人来说，也不是那么重要。既然宗教今天在中国是无足轻重的，十分明显，它跟新中国人民发展固有道德风尚是毫无关系的。这一事实给神学家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怎样能够说明如此人数众多的一个国家会那样普遍地表现出这种道德风尚，而在西方，这种表现则总是被认为是同宗教信仰和宗教动机联系在一起的。

那些其创始与发展同宗教有密切关系，并直到今天仍在高唱宗教的重要性的西方国家，其公共道德水平有多低，如果中国人能够知道，他们无疑将会大吃一惊。这些有宗教的国家今天的暴行、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见、色情、犯

罪、吸毒和行凶泛滥成灾，但是没有宗教的中国却正在培育出一个健康和有道德风尚的人民。

当我在新中国各地旅行时，一个根本问题始终萦绕脑际：他是怎么完成这项工作的呢？毛主席怎样去说服那么多的人对他的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如此热情地给予合作呢？

也许美国对华院外活动集团最恶毒的谣传就是说，毛和共产党人，在他们内战获得胜利后，在一场残忍的血洗中巩固了他们的政权。我们从一些包括总统和国务卿们的歇斯底里的声音中听到过同样的而现在已证明为荒谬的预言，说什么随着共产党在南越的胜利而来的将是这种血洗。这种断言没有得到客观的证据。毛不是蒋介石。一九二七年蒋在上海背信弃义地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而这一事实有文件可以证明。

毛所以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改造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中取得他的令人震惊的成就，是因为他很了解他的人民。他了解他们的潜力和他们的固有财富，并动员他们为争取他认为能使他的人民确信是为了他们本身的最高利益而奋斗的目标。他的“为人民服务”的著作是基本的和革命的。他了解他们的道德品质，向他们呼吁，并把他们加以发展而赢得了他们的合作。

一九四九年当毛接管那个国家时，它是一片混乱。二十五年之后，他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和有良好秩序的国家，一个具有自尊心和道德风尚的八亿多人民，生活在迄今所建立的一个最不分阶级，正义的和公正的社会，在那里每个公民够吃够用而没有那一个人享受过多。世界上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它本来很容

易会给世界其它部分带来无法忍受的担子，而它现在却是一个保证人人在衣、食、住、行方面都照顾得象个样子的自给自足国家的典范。过去被称为一个不象样的国家，而今天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了。

如果说毛的中国现在是一个奇迹的话，它还没有变成一个人间天堂。他们强调一致、公民、小组和“我们”。而我们则强调能提出异议的权利、强调个人、人和“我”。毛认为个人存在于集体之中，并为集体而存在，而且个人是在集体中才能获得幸福和才华的发挥。而我们则认为集体是为个人而存在的，而且集体的福利和力量的发挥是为了个人的利益的。

有一样东西是毛的中国如此生气勃勃地向世界各国，甚至是最先进的国家提供的，那就是对人类的一个希望。中国一度是大国中间最病态的一个国家，而今天它是最健康的。我们环视全世界，到处看到象是走向死亡的重病，我们能从毛的中国的榜样提取希望。在那里，我们曾经学习到，有一个明智的和无私的领导，任何病态的国家也能够自行走上恢复健康之路。毛主席由于他为他的国家所作的一切将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个杰出的、创造性的领袖而载入史册。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附件（1）

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半个多世纪以来，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领导我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伟大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在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毛主席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出版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我国各族人民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一定要严肃认真地抓紧做好。中共中央决定：

〔一〕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陆续出版以后各卷。在出版选集的同时，积极地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二〕出版《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的工作，由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设一个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负责整理、编辑和出版的具体工作。

〔三〕毛主席著作的所有原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收集，保存。

中央责成各级党委将本地区、本单位保存的毛主席的一切手稿，包括文章、文件、电报、批示、书信、诗词、题词的原件，以及讲话的原始记录稿，尽快送交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应作出复制件，交提供原件的单位或个人保存。

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一个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并且大力帮助收集毛主席的著作原件。中共中央希望各国马列主义政党、组织和进步团体、友好人士协助做好毛主席著作原件的收集工作。

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中发［66］267号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 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第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第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 1959 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第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 1957 年 3 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

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第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 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第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

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第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第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第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

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第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第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 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

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

上海机床厂是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大厂。全厂拥有工程技术人员六百多人。这支技术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从工人中涌现的技术人员约占百分之四

十五；解放后大专院校输送进厂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其余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使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个伟大的革命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掌握了全厂的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过去控制工厂技术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革命的青年技术人员和革命干部，成了科学研究和技术设计的主人。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支过去受压抑的革命的技术队伍，不断显示出他们的创造智慧和技术才能。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在技术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仅今年上半年，他们就试制成功了十种新型精密磨床，其中四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这个工厂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第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技术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受到了深刻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技术“权威”，政治上臭了，技术上的纸老虎的原形，也暴露无遗。过去走资派竭力把反动“权威”捧为青年技术人员的学习“偶像”，要他们“向专家看齐”，“为当工程师而奋斗”。现在，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认识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资产阶级的头衔不能争。磨床研究所的不少研究人员，过去把技术资料记在本本上，作为个人的“小仓库”；现在都自觉拿出来，汇集成册，分发给大家参考。全厂技术人员纷纷主动下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研究和改进设计。老年技术人员下车间，也注意放下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

第三，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变了。过去，这个厂的几个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曾提出所谓“一对一”〔即一个工人为一个技术人员服务〕，他们的所谓“结合”是“工程师动嘴，工人动手”，“工程师出主意，工人照着干”，还是多少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那一套。他们还制造了“工人和技术人员必须互相制约”、“造成对立面”的反动理论，建立了管、卡、压工人的一套规章制度。一本《生产工人手册》，就规定了一百七十多条，要工人背熟牢记，条条照办。凡此种种，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鸿沟。文化大革命中，

这个厂实行了工人、革命技术人员、革命干部的“三结合”，普通的工人参加了设计，技术人员也在第一线参加了实际操作，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双方的关系有很大改善。

二、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上海机床厂青年技术员〔包括三十五岁左右的人〕来源于两方面：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约三百五十人，其中百分之十是研究生和留学生〕和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约二百五十人，其中少数中间曾派往中等专科学校进修几年〕。实践证明，后一部分比前一部分强。一般说，前者落后思想较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后者思想较前进，实际工作能力较强。目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工艺方面的技术骨干，约有十分之一的人能独立设计高、精、尖的新产品。在今年上半年试制成功的十种新型精密磨床中，有六种就是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担任主任设计师的。

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这是一条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从两个年龄相仿而经历不同的技术员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

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四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一九六二年开始到磨床研究所试验室担任技术员。象这样一个在学校里读了二十多年书的人，过去由于理论脱离实际，又没有很好地同工人结合，所以长时期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作出突出的成就。

一个是工人，他十四岁当学徒，十八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四年，一九五七年开始在磨床研究所担任技术员。今年四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床，填补了我国精密磨床方面的一个空白点。

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反动技术“权威”，对工人走上设计舞台进行疯狂的压制。一九五八年前后，有一批工人担任了技术员，但是，厂里的反动“权威”以各种借口，陆续地把不少人调离设计部门。尽管如此，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还是冲破层层阻力，表现了自己惊人的创造智慧。据统计：一九五八年以来，这个厂自行设计试制成功的新产品中，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以及青

年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试制成功的，在一九五八年约占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九年约占百分之七十，一九六〇年约占百分之八十，一九六〇年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所有新产品都是他们设计试制成功的。其中不少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如镜面磨削万能外圆磨床，高中心外圆磨床等重点产品，都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设计试制成功的。

有些大专院校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逐步摆脱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放下架子和工人结合，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在设计和新产品试制上也作出了比较显著的贡献。比如一个一九六四年的大学毕业生，刚进厂时，成天捧着一本外国螺纹磨床的书〔不是说不要读外国书〕，从理论到理论，几年来，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创造。文化大革命中，他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坚决走和工人结合的道路，今年初，就和两个工人技术人员和一个老师傅一起，试制成功了一种磨床的重要电器设备。

三、为什么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成长快、贡献大呢？

最重要的一条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对毛主席、对党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在向科学技术进军的道路上，不为名，不为利，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时刻想到与帝修反争速度，争质量，并且处处考虑为国家节约，为工人操作方便。可是，有些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青年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工人，追求资产阶级名利，结果一事无成。有一个技术人员，想成名成家，一鸣惊人，十多年来先后提出六十多个课题，搞一个丢一个，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一个也没有搞成。一个一九五六年的大学毕业生，起初为了自己出名，关门搞磨头试验，先后报废了三十多个“磨头”，后来向有经验的老工人请教，在老工人的帮助下终于搞成功了。他深有体会地说：“闭门搞磨头，吃尽了苦头；同工人结合搞磨头，尝到了甜头；磨头磨头，归根结底，先要磨炼自己的脑头。”

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同名利思想极为严重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比，就更加鲜明了。有一个资产阶级“专家”设计一台磨床，前后搞了八年，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始终没有搞成功，而他自己却捞到了不少所谓“数据”，作为他争夺名利的资本。工人们说：这种人对我们的新社会那里有一点感情呢？

毛主席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在长期的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经过几年业余学校的学习，或者读了几年业余技术专科学校，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出现了一个飞跃，很快就能胜任科学研究和独立设计的任务。这是他们能够迅速成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们参加学习，叫作“带着问题读书”，因此学得进，懂得快，用得上。有一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运用丰富的实践经验，解决了一个产品的复杂的加工工艺问题，他一边实践，一边学习金属切削的原理，很快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他在金属切削加工工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当他们未和工人结合之前，缺乏实践经验，书本知识往往和实际脱节，因此很难作出什么成就来。有一次，有几个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因为缺乏实践经验，设计了一台内螺纹磨床，工人们按照图纸的零件加工，结果根本无法装配。后来还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把某些零件进行了再加工，才装配了起来。

敢想、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是工程技术人员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和人的世界观和实践经验息息相关的。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由于没有个人名利的精神枷锁的束缚，加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敢于破除迷信，破除不适用的框框，最少保守思想。以最近试制成功的具有国际水平的一台精密磨床为例，由于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大胆突破了沿袭已久的框框，试制周期从一年半缩短为半年，精度提高四级，零件和重量分别减少三分之一，造价相当于进口的百分之十五点五。而有些学校出来的技术人员，不注意思想改造，往往容易考虑个人得失，怕丢面子，失架子，同时，他们条条框框也比较多，因而不容易破除迷信，创造出新技术来。他们自己也说，“书读得越多，束缚得越紧，结果就没有闯劲了。”

在上海机床厂，如果以大学生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相比较，工人们还比较地欢迎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因为中专生书本知识虽然少一些，但他们的架子小些，实践经验多些，洋框框少些。不少中专生进步比大学生快得多。比如正在进行的两条高级的自动流水线的设计，就是由两个一九五六年毕业的中专生负责的。

四、从工厂看教育革命的方向

分析一下上海机床厂不同类型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状况和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

这个工厂的老工人和许多青年技术人员从实践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教导无比英明正确。他们感到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已经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现在，是坚定不移地、老老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问题。

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工厂的实际情况，对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第一，学校培养的必须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决不能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样，培养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的“精神贵族”。这是关系到出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认为，过去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工厂、农村，就当干部，是不合理的。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和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建议，大学毕业生应当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工人、农民那里取得“合格证书”，然后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有些可以参加技术工作，但也还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劳动。有的则继续当工人、农民。

第二，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主席教导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从上海机床厂有些技术人员的情况看，旧教育制度的一个严重弊病，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大搞烦琐哲学，学生钻到书堆里，越读越蠢。只有接触实践，对于理论才能掌握得快，理解得深，运用得活。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提出：学校要由有经验的工人去当教师，让工人登上讲台。有些课程就可以在车间里由工人讲授。有一个青年技术人员，大学一毕业就进了研究所的门，整天啃书本，钻理论，学外文，脱离实际，自己也感到越来越空虚。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到机床厂拜了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工人师傅，自己参加了技术操

作实践，情况就变了。最近他和工人一起，在镜面磨削方面，作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他对于必须有工人做自己的教师这一点，感受特别深切。

第三，关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来源问题。他们认为，除了继续从工人队伍中提拔技术人员外，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这样做，现在是完全有条件的。以上海机床厂为例，大部分工人都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挑选这样的青年进入大专院校的好处是：第一，他们政治思想基础比较好。第二，是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生产劳动的经验。第三，一个初、高中毕业生，经过几年劳动，大约在二十岁左右，再经过几年学习，二十三四岁毕业就能独立工作，而目前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一般要经过二三年实践，才逐步能独立工作，因此选拔有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到大学培养，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的。

第四，关于改造和提高工厂现有的技术队伍的问题。他们指出：从学校出来的大量技术人员，长期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毒害。还有一批过去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但他们在世界观和作风上，存在很多问题。工厂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规定的政策，组织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等谬论和“爬行哲学”、“洋奴哲学”，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同时，还应该组织他们分期分批去当工人，或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到车间去劳动，帮助他们走上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走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2〕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两段是毛泽东在审阅时修改的文字。

〔3〕这是毛泽东为准备发表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语。

〔4〕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八日的《红旗》杂志上一份调研报告上的按语，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继八月二十九日上送调查报告

《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之后，又上送一个调查报告，说上海机械学院的前身，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创办时，第一届招收的二千余名学生全是从工人、农民和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中选拔的。这批有实践经验的学生，学习目的性明确，阶级觉悟高，学以致用，冲击了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最近部分当年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上海机床厂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这个学校附属工厂的工人和广大师生总结建校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后，对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一、理工科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必须解决由哪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

二、理工科大学的学制以两至三年为宜。

三、理工科大学还要担负起办好业余技术教育的任务。

四、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

今后的教师队伍，应当采取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工农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形式。社会上一大批在实践有发明创造的工人、技术人员，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深入学校讲课。学生们也都有实践经验，可以走上讲台，互相交流。现有的教师应该分期分批地到工农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所谓“571”工程纪要

目录(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一) 可能性

(二) 必要性

(三) 基本条件

(四) 时机

(五) 力量

(六) 口号和纲领

(七) 实施要点

(八) 政策和策略

(九) 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

∆9.2 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

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

众叛亲离

(1)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2) 夺权正在进行。

(3) 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 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 他们“故计(伎)重演”。

(7) 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 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

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附件（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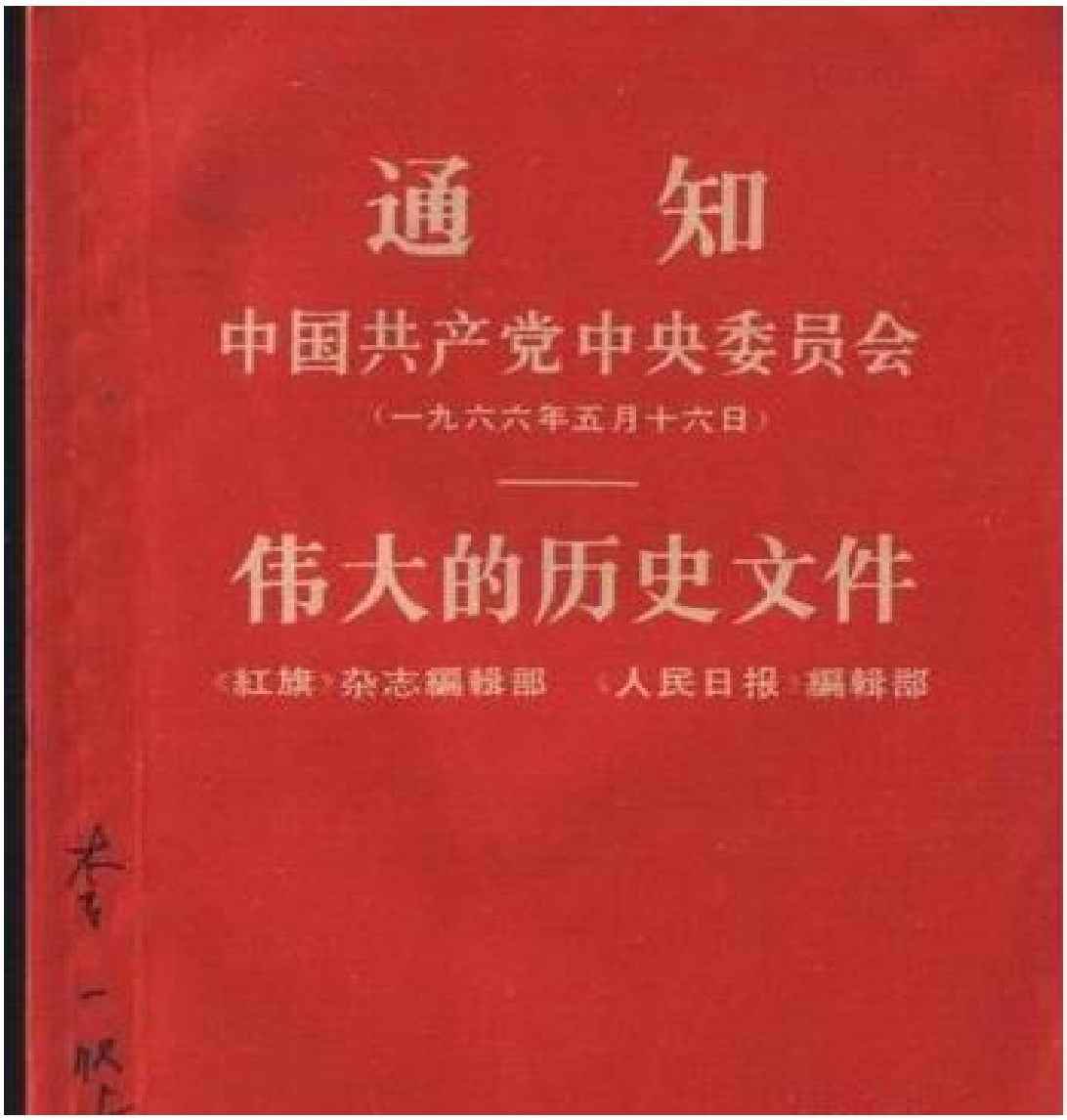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

大叛徒
陶卓新

李彪

“文革”游行

彭德怀元帅被污蔑为“三反头子”



五・一六通知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革”导火索

“四五”运动

四五运动，即"四五天安门事件"，是指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 1976 年 4 月 5 日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反对"四人帮"、否定文革的全国性的群众性非暴力反抗的抗议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正义的非暴力反抗的革命运动。该事件在当时被错误的定为反革命性质，两年半后被予以平

反。四五运动成为了该年全民反抗四人帮的一次具有历史里程碑的重要意义和象征性意义的历史事件，直接带动了半年后四人帮的被粉碎。是一次正义的活动。

对四人帮庄严地审判

毛 泽 东 选 集

第 七 卷

1976

毛泽东 著

LFX 编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ISBN 978-205-02389-0